



大会

Distr.: General
13 July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十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64

社会发展，包括有关世界社会状况和有关青年、
老龄、残疾人和家庭的问题

2005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 A/60/50 和 Corr. 1。



序言

《世界社会状况报告》自 1952 年创刊以来，一直是政府间讨论社会经济问题并进行有关政策分析的基础。这一丛刊有助于弄清国际上关心的社会新趋势，有助于分析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主要发展问题间的关系。

2005 年报告保持这一传统，探讨不平等问题。报告特别着重探讨一些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达到千年发展目标极为艰巨，同时也更有必要。报告表明，不处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之间的断层、以及在保健、教育及社会和政治参与机会上越来越大的差距—我们就无法推进发展纲领。

报告列明了四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处理全球化引起的全球不对称；将减少不平等明确纳入减贫政策和方案；扩大就业机会，特别注重改善非正规经济的状况；以及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凝聚力，视其为实现发展、和平与安全的关键。

报告详述了影响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有助于指导采取决定性行动，建设一个人民能更好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克服不平等困境，是这项努力的一个必要因素。

目录

	页次
序言	2
解释性说明	6
执行摘要	10
导言	15
一. 为什么要重点解决不平等问题	18
A. 消除贫穷的斗争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19
B. 结构性改革、公营部门与不平等	23
C. 结论	29
二. 聚焦不平等问题：非正规经济	30
A. 非正规经济简述	30
B. 非正规经济的吸引力	34
C. 非正规经济增长的原因	35
D. 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联系	37
E. 结论	39
三. 不平等的趋势和类型	41
A. 不平等的经济方面	41
B. 不平等现象的非经济层面	52
C. 结论	70
四. 不平等与社会融合	73
A. 代间不平等现象	74
B. 消费、不平等与社会融合	75
C. 暴力与不平等	78
D. 培育民主和社会融合	87
E. 结论	89

五.	发展与不平等的不断变化的背景	91
A.	全球化：不对称与政策空间的丧失	91
B.	自由化和稳定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	93
C.	为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筹资	97
D.	国家和民间社会的作用	106
E.	结论	108
六.	前进之路：减少不平等的政策	110
A.	纠正全球不对称情况	110
B.	加强消灭贫穷的综合战略与政策	111
C.	确保人人都有就业机会	112
D.	推动社会融合与凝聚	113
附件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十项承诺	116
表		
二.1	部分国家非正规部门 a 的规模及增长情况（按性别分列）	31
三.1	各区域的人均收入在经合组织各国人均收入平均值中所占比率	44
三.2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间接关于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趋势分列的各国分类状况	45
三.3	世界各主要区域，以及中国和印度的贫穷人口比率	48
三.4	世界和主要区域的失业率、劳动力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51
三.5	某些国家五岁以下死亡率和国家间差距指数	58
三.6	1995、2000 和 2002 年五岁以下死亡率最高和最低国家的死亡率	59
三.7	按国家和某些背景特点分列的 12-23 个月儿童的免疫率	61
三.8	调查前三年某些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国内新生儿获得专门医疗服务的机会方面的差别 ...	62
三.9	2004 年全世界和各大区域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成人和儿童	63
三.10	2004 年全世界和各大区域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	64
三.11	按性别分列的所有家庭及城市和农村家庭未受教育人口所占百分率	67
三.12	1998 和 2001 年全世界和各大区域小学入学方面的不平等情况	68

三.13 1998 和 2001 年全世界和各大区域中学入学方面的不平等情况	70
图	
一.1 政策框架：以公平和平等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三个主要支柱	18
一.2 出生时预期寿命与公共和私营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 2002 年	28
三.1 各国间收入不平等的演变	42
三.2 1960-1962 年和 2000-2002 年最穷和最富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3
三.3 世界各主要区域预期寿命的差距：1990 和 2005 年各区域出生时预期寿命 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的差异	54
三.4 1990 和 2000 年所有国家根据预期寿命低于日本的幅度的标准分布的情况	56
五.1 发展援助委员会所有捐助国的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至 2004 年的长期趋势	98
五.2 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捐助国援助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99
五.3 按收入分类的各国家组社会部门支出	104
五.4 国防开支最高国家的国防和社会部门支出	105
五.5 社会部门开支最高国家的国防和社会支出	106
文献目录	118

解释性说明

报告各表采用了下列符号：

两点（..）表示数据不详和未单独报告。

横线（—）表示该项为零或可忽略不计。

连接线（-）表示该项不适用。

减号（-）表示短缺或减少，另有说明者除外。

圆点（.）表示小数点。

年份之间的斜线（/）表示统计年度，如 1990/91。

年份之间的（-），如 1990-1991，表示所涉的整个期间，包括年初和年末。

年增长率和变动率，是指复合年增长率和复合年变动率。

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表内细目和百分比未必与总数相符。

文内采用了下列缩写：

艾滋病毒/艾滋病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独联体	独立国家联合体
发援会	发展援助委员会
拉加经委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欧盟	欧洲联盟
粮农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关贸总协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国内总产值	国内生产总值
国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7 国集团	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集团
艾滋病毒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
劳工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合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减贫贷款机制	减少贫穷促进增长贷款机制
贸发会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发展经济学所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不平等数据库	世界不平等数据基地
世贸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本出版物所用的名称和材料的编列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本报告所用的“国家”一词视情况也指领土或地区。

提及公司名称和商品并不意味着联合国予以认可。

提及的元（\$）是指美元，另有说明的除外。

如果资料来源有印本，则印本为权威版本。网上复制的联合国文件，只有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刊登后，才可视为正式文件。从联合国其他来源或非联合国来源获得的联合国文件仅供参考。联合国不对这种材料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任何担保或表示意见。

除另有说明外，本报告采用下列国家分类和小分类：

发达市场经济体：

北美（墨西哥除外）、南欧和西欧（塞浦路斯、马耳他及塞尔维亚和黑山除外）、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

转型经济体：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以及前苏联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各成员国。

发展中国家（49个）：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非洲、亚洲和太平洋（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塞浦路斯、马耳他及塞尔维亚和黑山。

就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据而言，采用了下列区域分类：

阿拉伯国家和北非：阿尔及利亚、巴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中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中欧和东欧：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及塞尔维亚和黑山。

东亚和太平洋：澳大利亚、柬埔寨、中国、库克群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斐济、印度尼西亚、日本、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绍尔群岛、缅甸、瑙鲁、纽埃、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泰国、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和越南。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百慕大、玻利维亚、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开曼群岛、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蒙特塞拉特、荷属安的列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北美和西欧：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挪威、葡萄牙、圣马力诺、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南亚和西亚：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特迪瓦、科摩罗、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乌干达、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索马里、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最不发达国家：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不丹、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原扎伊尔）、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东帝汶、多哥、图瓦卢、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瓦努阿图、也门和赞比亚。

文内和表内国家分类的名称只是为了统计或分析上的便利，未必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进程中所达到阶段的判断。

执行摘要

1. 全球对克服不平等或处理贫富不均问题的决心，是 1995 年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的，并得到了《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认可。这种决心正在消退。世界 8% 的国内总产值属于生活在发达世界的 10 亿人；其余 20% 的国内总产值属于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 50 亿人。不处理这种不平等困境，全体人民必然仍无法实现社会正义，改善生活条件，社区、国家和区域必然仍极易受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的影响。
2. 本《世界社会状况报告》阐述不平等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趋势和形态，并探讨其根源和后果。报告重点探讨不平等的传统方面，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保健、教育及社会政治参与的机会等。报告还分析结构调整、市场改革、全球化和私有化对经济和社会指标的影响。
3. 在发展过程中忽略不平等问题是危险的。只注重经济增长和创收，以此作为发展战略，是不会有效果的。这会导致少数人集聚财富而加深众人的贫穷；此种做法没有认识到贫穷世代相传的问题。比较全面的减贫办法，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融合保健、教育、经济发展领域的进展，以及对立法和司法过程的参与。这些领域各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使穷人能充分实现生产潜力。处理贫穷问题的所有方面，后代就比较有可能收获当今各项政策的惠益，而不再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
4. 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获取生产资源、基本社会服务、机会、市场和信息机会的不平等，可以造成并加剧贫穷。如社会发展世界问题首脑会议的建议所强调，减贫政策和方案必须纳入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社会经济战略。
5. 处理不平等問題，需要努力在许多复杂、相互矛盾的社会经济力量之间求得平衡。虽然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经济增长不是减贫的充分条件。需要在若干不同领域进行改革，增加穷人的机会，增强穷人的能力，以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增长和发展，从而减少不平等现象。
6. 公民身体健康、受过良好教育、充分就业、有社会保障，就有助于社会融合。改善穷人利用（尤其是教育和保健领域）公共资产和公共服务、以及为维持最贫穷家庭生活的收入转移方案的机会，对于改变各种机会的分配结构极为重要，是减少贫穷和不平等世代相传情况的关键。打破贫穷世代相传的恶性循环，是协调一致、公平的减贫战略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部分。
7.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强调，必须确保提供普遍、公平的接受教育和初级保健服务的机会。确认文化和容忍的重要性，奉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实现人力资源的全面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8. 尽管处理不平等理由充足，但在世界许多地区，经济和非经济不平等现象实际上有增无减，而且过去几十年，许多形式的不平等更为严重，复杂。

9. 不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高收入国家之间收入差异已缩小，但少数实行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政策的国家不在此列；自 1980 年代以来，对于其他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已恶化，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已扩大。

10. 在世界许多地区，居高不下的穷人比率至少是收入不足的一个原因。生活极端贫穷的世界人口比率，1981 年至 2001 年期间从 40% 降至 21%。但许多国家继续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合计占世界人口近 40% 的中国和印度，对贫穷情况总体改观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其他地方，贫穷程度和贫穷的顽固性比较突出。

11. 世界许多地区正规与非正规经济之间本已巨大且日益扩大的鸿沟，突出了减少不平等现象的必要性。跻身正规经济的人一般来说属于社会的“富人”，因为这些人比较可能赚取体面的工资，获得与工作有关的各种福利，有稳定的就业合同，并受到劳动法和劳动条例的保护。相比之下，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一般属于“穷人”；他们往往得不到各种法律保护，无法获得基本的福利，无法享有给予从事正规经济活动者的各种基本权利。由于多数穷人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最近许多国家非正规经济的扩大，对减少贫穷和不平等现象有严重影响。

12. 获得就业机会对于克服不平等现象和减贫至关重要。无法获得适当工作机会的人，就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以支付本人和家人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需要的费用，也无法积蓄资金保护家庭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失业者是社会中最弱势的人，因此很容易陷入贫穷。

13. 全球就业状况的特点是极端的不平等。2003 年，约 1.86 亿人失业，占就业适龄人口总数的 6.2%，而 10 年前失业人口为 1.40 亿。在发达国家，近年来失业人口总的来说已减少；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甚至呈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不断加剧的问题有几个根源，包括劳动力增长快，以及继续依赖只注重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

14. 实行自由化政策，就需要改革劳动法和体制，劳动力市场将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一般来说工资灵活度扩大，最低工资受侵蚀，就业法和就业条例削弱。发展中国家渴望吸引外国投资和扩大出口，而这种情况往往导致“向谷底冲刺”，劳动保护和环境标准往往被无视或牺牲，目的显然是提高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外部竞争压力制约了发展中国家推行关键社会政策的能力。

15. 在许多国家，不将处理穷人的需要列为一项促进持续增长的战略，这是减贫的一大障碍。高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大批非熟练劳动力、以及肆虐的艾滋病毒/艾滋病，也是贫穷问题长期存在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非洲。国内和国际移徙也与贫穷有密切关系；始发地社区越来越穷，因为他们丧失的往往是经济上最活跃的

成员，而在接受地社区，移民很可能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容易陷入极端贫穷。有的人时而陷入贫穷，时而摆脱贫穷，说明在某个时期不视为贫穷的人，可能被社会援助方案忽略。农村贫穷现象日益严重，加之贫穷问题城市化，也对发展构成了新的威胁。

16. 各种非经济不平等现象，也制约了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譬如，虽然多数国家成功地扩大了教育机会，但接受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仍存在巨大差异。儿童保健和儿童死亡率方面的差异极为明显，说明利用优质母子保健的机会存在根本的不平等。一个关切领域是接受免疫接种的机会，尽管最近几十年来覆盖面已明显扩大，但仍因母亲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存在巨大差距。

17. 肆虐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加深了经济和非经济不平等。这种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令人震惊。该区域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冲击最严重，经济和非经济指标方面的情况都很差。区域内许多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扩大。特别令人担心的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导致这些国家与世界其他区域在预期寿命方面的差距扩大。

18. 可以看到的不平等现象，都根深蒂固地打下了性别不平等的烙印。在受教育、体面的就业机会、薪酬公平等方面，都长期存在性别差异。在多数国家，过去二十年就业妇女人数增加，掩盖了就业条件恶化的事实，因为妇女找到的工作工资往往比较低。妇女获得的经济和非经济机会少，往往是她们在许多社会中地位低下的根源；结果，妇女容易受到虐待和性剥削，并且在关乎自己福利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19. 过去十年，提高各种社会群体地位问题已受到更多的重视。譬如，为确保土著人民和残疾人权利，为处理老年贫穷和青年失业问题，已作出大量努力。但对于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问题，重视却不够。

20. 向社会老年成员提供社会保护特别重要。给予老年人的福利往往惠及整个家庭，因为他们拥有的钱财和其他资源往往与子孙后代分享，这就增强了家庭的资源基础，并有利于今世后代的福利。因此各国政府应确定可能必要的政策改革，以维持和支助老年人的生活，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削减有关开支。

21. 制度化的不平等使边缘化群体无法成功融入社会，而民主和法治对于消除这种不平等极为重要。虽然二十世纪全球民主政府数目增多，但民主化的步伐和落实情况参差不齐。民主的巩固是一个过程，而民主要扎根需要许多年。在过渡期间，主权国家有必要通过国内行动和机构，强化民主原则，促进人权，鼓励所有群体的政治参与。民主自由原则必须载入立法，并以政治意愿为后盾。许多政策药方在设计时没有适当分析可能对穷人和最易受伤害者（特别是妇女）产生何种影响；因此，在许多国家，这些群体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发展进程要取得成功并

有持续力，就需要所有群体参与，以确保所有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从而最终促进平等。

22. 最近国际移徙人数迅猛增加，这是在他们看来始发国与接受国机会不平等所致。移徙浪潮高涨造成并加剧不平等。许多移徙者在目的地国的境遇，使他们容易遭受剥削。在移徙者成为廉价劳动力时，他们与当地居民间的不平等就会更大。移徙者的收入在不断增加的汇款，特别是以穷国为目的地的汇款中占很大一部分。这些汇款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二大资金来源，规模仅次于外国直接投资，就全球而言，数额已超过官方发展援助。

23. 国际发展纲领所缺失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国际劳工流动、汇款便利化、对资金流动的国际征税、应付边缘化国家和社会群体特殊需要的融资机制、以及确保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机制等。这一点很引人注目。

24. 全球化不对称，是不平等现象增加的一个重要根源。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迅速发展，而国际社会议程相比之下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在国际社会议程方面，问责制和实施机制极其薄弱。迫切需要在国际体系中创造必要的空间，以便在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提供“全球公益服务”。由于公共监督不力，目前出现了各国和各国人民并非平等分担全球化成本、分享全球化惠益的局面。

25. 即便在建有适当机构的地方，缺乏资金也会削弱社会发展努力。关于如何筹措社会发展资金，已进行很多讨论，许多国家承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数量，并提高其质量。高额的军事开支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因为将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国防部门的国家，其社会部门预算所占的份额也往往最低。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增加，导致全球不安全，而全球不安全促使许多国家增加国家安全支出，致使资源进一步从社会发展领域流失。与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暴力，应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瓦解的角度加以考察。在不平等现象极为严重、为争夺稀有资源而存在竞争的地方，社会瓦解和发生暴力的可能性就大。在不平等现象比较多的地方，暴力就比较普遍。从趋势看，在贫穷中成长的人，往往会遭受社会排斥，而社会排斥会导致犯罪。贫穷人口多、不平等现象普遍的国家，一般来说社会支助和安全网就比较薄弱，受教育机会就比较不平等，而年轻人的机会也比较少。在这种不利的社会环境下，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前进的道路：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政策

26. 不平等现象显然损害实现社会公正和发展的努力。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达成的社会发展全面愿景，应当主导和影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议程，这样千年发展目标中确定的战略基准以及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目标就可以实现。

27. 要为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就迫切需要重视四个特别重要的领域。首先，全球范围内因全球化造成的不对称现象需要加以处理。第二，减少不平等现象的目标必须明确纳入减贫政策和方案。特别应制定具体措施，保障边缘化群体获得资产和机会。在这方面，千年发展目标不应视为联合国总体发展纲领的替代物，因为联合国发展纲领提供的发展框架要广得多。第三，必须优先重视扩大和改善就业机会。很重要的一点是，就业战略不仅应处理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还应促进注重平等、安全和尊严的体面工作条件。最后，社会融合和凝聚力必须作为发展、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加以促进。社会融合需要所有群体充分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容易受歧视的群体，包括土著人民和残疾人，需要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予以特别重视。

28. 世界上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持续存在，甚至继续恶化的问题，不应若无其事地加以接受。当今世界具有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资源、技术专才、以及科学和医学知识，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不能继续这样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宏观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变化，不能与实现社会发展、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努力脱钩。无法以全面、统筹的方式对待发展，不平等的困境就会持续存在，人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导言

29. 狭隘的经济利益凌驾于人民的需要和最要紧的问题之上而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历史上这种警世醒人的事例举不胜举。历史上开辟一条有远见的道路而社会因此向前发展的开创性时刻，也不胜枚举。60 年前联合国的成立，就是这样的时刻。联合国成立不久，会员国便开创了一条有远见的道路，确认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是人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¹

30. 2005 年纪念了其他一些开创性时刻，包括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五周年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十周年。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等前所未有的聚会，都强有力地重申了《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促进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的必要性。²

31.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时机富有意义。种族隔离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为粗暴的制度化不公正和不平等，而种族隔离的历史性瓦解重新唤醒了公众对“人人机会均等”理想的向往。这次首脑会议首先以其独特的条件，替长期处于发展阶梯底端的人发出统一的号召：各级每个领域的政策都必须维护社会公正的标准。这些理想的合力，不仅能结束国家制度化的压迫统治，而且标志着全球争取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的大规模斗争的开端。

32. 这场在历史征程中激发许多辩论和政治行动的斗争，仍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导特征。没有任何人幻想不平等会完全彻底地消除，但哪怕是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也越来越难，因为对一项最基本的平等原则（最富者与最穷者之间，应有比较好的均衡）的承诺看来是在消退。

33. 在当今世界，财富、技术知识、科学和医学知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在经济繁荣期间社会中最弱势者的处境一直每况愈下，令人深感忧虑。全球化最为引人注目的副产品是取得新型财富的机会以及这种机会加剧不平等的倾向。世界上 20% 最富裕的人占私人消费总量的 86%，最贫穷的人所占的比率仅略高于 1%，而全球化对这种趋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非在重新确定经济政策重心，帮助落后者方面取得某种进展，减贫工作能否向前推进仍无把握。

34. 本《世界社会状况报告》阐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现象的变化和扩大，不仅探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情况，而且探讨各种机会、以及政治参与和影响，因为这些都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本报告认为，不平等现象的增加，不应孤立地加以讨论，也不应若无其事地予以接受。报告认为，宏观经济和贸易自由化政策、金融全球化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变化，不应与实现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斗争相脱离。

35. 报告内重点阐述的趋势说明，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不断恶化的不平等现象，显然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引人注目的表现。承认或确认这种趋势后，并非总是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制止或扭转这种趋势。关注当前发展问题讨论的人

深知，当前有的经济增长政策已牢固确立，并受到有力支持，但产生或加剧不平等；他们也深知，为保护穷人所作的努力，经常被描绘成增加社会负担。

36. 如报告所示，平等问题全球损益表存在严重赤字。不平等问题一个比较不好的方面是世代相传的特点，或者说下辈承继上辈贫穷的问题。每个社会都依赖知识和责任的一代代传承；但是，不平等、贫穷、失业和排斥有可能改变乃至截断这种自然进程。继续奉行维持社会断层的政策的各国政府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使社区、国家和区域陷入各种社会动荡，可能使数十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投资收益烟消云散。

37. 虽然在每个领域，每个社会都存在不平等，但在长期繁荣和稳定所需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比较薄弱的社会中，不平等留下的痕迹特别令人担忧。在稀缺的资源 and 权力分配不平等的地方，就会比较频繁地发生暴力。如果社会对灭绝种族、奴役和在战争中使用儿童兵的暴行视而不见，则上述暴力造成的破坏就会更严重。如果社会容许贫穷、失业和排斥等现象继续破坏社会结构，致使长期存在不平等，那么社会很可能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种族隔离遗留的问题就是这样。

38. 尽管存在各种障碍和挫折，但最近为实现平等而作出的努力比比皆是。这一领域的某些活动以财富和收入均等为目标，但许多活动涉及各种群体，它们为提高自己的地位、赢得接纳、争取其他群体享有的特权和利益而努力。这一点在社会性别领域最为明显。妇女运动为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争取发言权。妇女的机会历来比男性少，而面临的障碍比男性多，但许多妇女正在实现社会提出的目标方面获得了一些支持。

39. 多数工人深深陷于非正规经济；但没有任何有鼓动力的声音为他们说话。非正规工人一般没有任何福利、社会保护或安全感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加强投票传统、工会和游说工作的努力，缺乏广泛的政治支持。非正规工人与穷人和遭排斥者一样，仍不得参与争取平等的大型政治运动，而且脱离为争取实现比较包容的全球化而作出的参与性努力。非正规工人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但很少有声音的群落；虽然他们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占很大比例，但多数人处于分散和边缘化状态。

40. 对许多国家来说，自由化政策往往加剧不对称的全球化 and 不平等，国家政策空间因此日益缩小。治理方面的公开程度逐步降低，妨碍了一般公民将公共政策与不平等现象联系起来的能力。社会不平等以及收入和财富差距达到了触发社会动荡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不平等的这些政策不大可能得到应有的检视。遗憾的是，社会适应了这种新现实，造成一种困境，其中实现社会公正的障碍极为强大，处于不平等等式不幸一侧的人只能绝望，放弃。

41. 当今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要推进共同未来的愿景，世界领导人必须抓住每个机会，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扭转不利趋势。如果人类仍致力于促进社会融合，并预防四分五裂的社会凝固定型，就必须确定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满足于

只是貌似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四分五裂社会的凝固定型，必将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联合国的整个发展纲领应成为这种努力的指南，其中应特别重视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产生的决定和建议。

42.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曾发出以下呼吁：“通过我们的科学才智，我们已经使世人互为邻居；现在通过我们的道德和精神才智，我们必须使世人互为兄弟。”³ 人类显然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政策可以也应当处理道德上不能接受、政治和经济上站不住脚的趋势。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及有关政策和战略，不仅为减少不平等提供了机制，而且为纠正短视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宜之计造成的不公正提供了途径。本报告提出的证据毫不含糊地确认，必须再次从基本的博爱，而不是仅仅从经济利益定义这个世界。

注

¹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大会 1948 年 12 月 10 日第 217 A (III) 号决议 (DPI/511)。

² 《联合国宪章》序言 (194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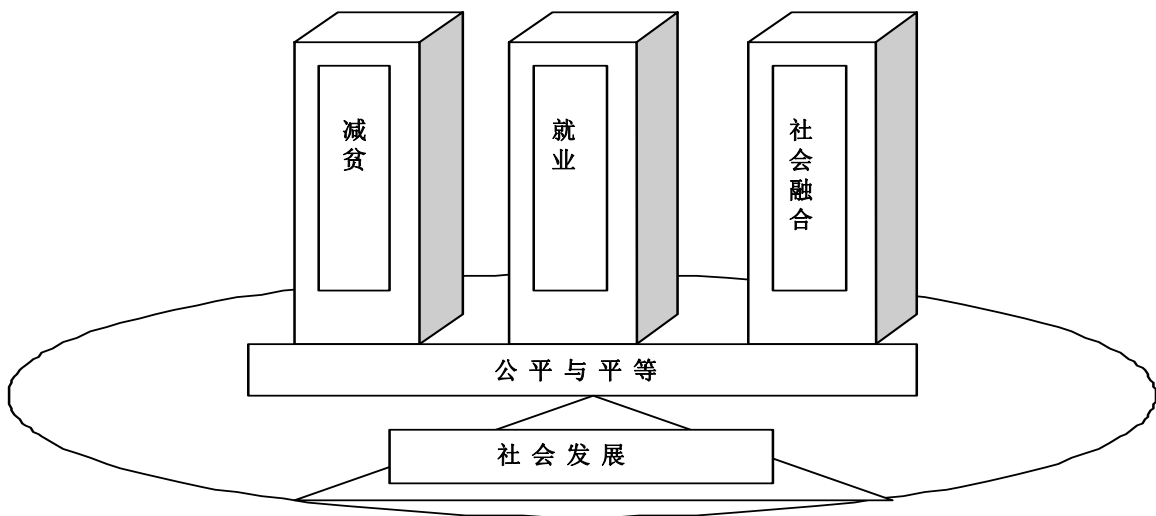
³ 小马丁·路德·金，“面对新时代的挑战”，1956 年 12 月 3 日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演讲。

一. 为什么要重点解决不平等问题

43. 如果不重点解决不平等问题，能不能实现社会发展？如果有人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¹ 答案会是坚决的“不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倡以人为本促进发展，而这个方式必须像图一.1 鲜明地显示的那样，把公平与平等作为核心，使所有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不受妨碍地获取资源和机会。然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显示，当今的世界远非平等。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和资产方面，而且表现在教育、保健和就业机会的质量和数量、人权的保护、以及获得政治权力和代表的机会方面。

图一.1

政策框架：以公平和平等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三个主要支柱



资料来源：以 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确定的社会发展概念为基础。

44. 本章从经济和社会-政治层面分析了贫穷问题，并探讨了结构调整、市场改革措施、针对性办法和私有化对受教育机会、保健和社会保护方案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了为追求社会发展而消除不平等的强有力理由。第二章进一步阐述了把不平等作为重点的理由，其中突出讨论了正式经济和非正式经济之间的鸿沟；着重指出了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税负和法律保护方面的差距，并说明全球化和追求国际竞争的努力如何使这一差距更为扩大。

A. 消除贫穷的斗争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45. 不平等在消除贫穷的斗争中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意识到贫穷的不同表现形式。贫穷尽管有很多层面，但其中两个层面是最基本的，这就是：收入低和资产少导致的经济权力缺乏；社会政治权利缺乏，其表现形式是在获得社会服务、机会和信息方面受到限制，另一个经常的表现形式则是人权被剥夺和遭受歧视。本节将集中讨论贫穷的这两个关键层面及其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不贬低贫穷问题的其他因素的重要性。

1. 不平等与贫穷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

46. 人们通常从经济角度为贫穷定义，例如非常低的人均或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因此，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一观点体现了所采用的传统办法：贫穷基本上是一个仅通过提高收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处理贫穷问题时把力量集中于提高收入的最近一个例子，是千年发展目标当中的一项目标，即，承诺把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减少一半，以消除赤贫。与此不同的是相对贫穷概念，其中强调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由于过份强调一味追求迅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这个概念受到忽视。

47. 结构调整方案的后果和对市场经济的过分依赖致使不平等现象更趋严重，由于因此引起的不满，关于减少贫穷的动力来自经济增长的长期信念越来越受到质疑。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如果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与不平等日趋缓和的情况相比，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要大大降低。

48. 此外，如果经济增长使不平等更为加剧，那么贫穷状况就会恶化，即使不是绝对恶化，也至少是相对恶化，因为穷人会发现，自己的处境相对而言比以前更糟。例如，如果实行低工资政策，同时向大企业提供税务减免，会通过增加投资导致经济迅速增长；然而，由于工人收入的降低对个人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造成不利影响，不平等状况会更加恶化。相反的例子是，如果选择的经济增长战略符合减少不平等的目标，则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的程度都倾向于降低。例如，东亚的情况表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低与经济增长迅速有关系，促进基本教育和加强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贫穷和不平等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Birdsall, Ross and Sabot, 1995）。

49. 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同样不利于增长和减贫。如果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没有土地，则农村经济一般会面临磨洋工和监督管理引起的非常高昂的成本，从而妨碍增长（Cornia and Court, 2001）。不仅如此，土地分配如果高度不平等，今后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很大的不利影响（Deininger and Squire, 1998）。

50. 资产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也会损害经济增长，因为这种不平等会限制在促进教育和积累人力资本（这是两个促使生产率提高，最终导致减少贫穷的因素）方面取得的进展。此外，财富和收入的悬殊导致的社会紧张关系会“损害财产权得到的保障，增加没收财产的威胁，造成国内和外国投资的流失，并增加商业保障与合同执行的成本”（Cornia and Court, p. 23）。

51. 然而，应该承认，如果生产效率和创造性得不到奖励，平等会妨碍经济增长。如果不平等程度非常低（例如在 1980 年代的各社会主义经济体），“由于工资差幅不足以奖励不同的能力和努力，从而可能导致磨洋工和不劳而获的行为，经济增长一般受到妨碍”（Cornia and Court, p. 23）。因此，一个有用的办法是区分“建设性”不平等和“破坏性”不平等，其中前者发挥了必要的奖惩作用，促使资源流往使用效率最高的地方，后者则导致嫉妒和对社会有害的再分配（Timmer and Timmer, 2004, p. 3）。我们必须在平等与竞争力之间达成正确的平衡。

52. 获得生产投入和生产资料方面的不平等也对减贫努力造成影响，因为这种不平等提高了穷人的生产成本和产品销售成本，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竞争力，削弱了他们提高收入的能力。穷人利用土地、信贷、信息和市场的机会都有限。土地对于农村穷人的生产活动来说是一项关键投入，因此，土地所有权的形态和穷人被驱往较贫瘠土地的情况损害了他们的生产能力。获得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的机会使穷人能够建立自己的小企业或微型企业，因此至关重要。微额信贷方案最近在帮助穷人开办新企业方面取得一些成功，显示如果使进入某些市场和获得某些服务的机会较为平等，会有助于减贫。随着因特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获得信息和较先进通信手段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很多，并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仅增加了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和加强了对权利的保护，而且还使穷人能够根据更加公平的条件在全球市场竞争。当前，由于运输和通信基础机构的组成要素分配不均，穷人的产品没有平等的机会进入本地和全国市场。由于大多数穷人居住在农村地区，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使不平等状况更趋恶化，并使贫穷长期化。

2. 不平等与贫穷的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

53. 如果纯粹通过经济方式来减少贫穷，仅注重提高个人的当前收入，那么，除非出现财富或资产的积累，否则不会形成减少跨代贫穷的进程。如果采用更广泛和更全面的减贫方式，在其中还纳入社会-政治层面的内容，包括改进保健和教育以及增加在立法过程中的政治代表权，将使人们以动态和跨代的观点来理解贫穷。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使得穷人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充分实现自己的生产潜

力。如果从这些其他的层面处理贫穷问题，将不仅改善这一代人的状况，而且还会增加子孙后代继续受惠的机会，从而打破贫穷的循环。然而，这些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尽管对于减贫具有核心意义，但经常被贬低或被忽视。

54. 除非保证机会平等和享受基本社会服务的平等，否则持续减贫的目标无法实现。机会平等指的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和帮助改善自己的生活和改善社会：“获得资源的公平渠道是机会平等的关键所在，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是如此，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上也是如此”（Ocampo, 2002b, p. 402）。能否增加人们的机会和能力取决于能否消除压迫并提供像基础教育、保健和社会安全网这样的服务和福利（Sen, 1999）。

55. 关于不平等问题最新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直接助长了健康状况的恶劣和全面教育水平的低下。例如，在拉丁美洲进行的一次这样的研究显示，公共社会支出水平虽然很高，但由于大量低收入人口被排除在许多方面的公共福利之外，没有给穷人带来好处。由于在提供本应该是普及的服务和这些服务的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该区域的应享福利所受限制产生的影响更为恶化（Lloyd-Sherlock, 2000）。类似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些非洲国家，像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支出一般不是以最贫穷的家庭为对象（Castro-Leal and others, 1999; Sahn and Younger, 1999）。支持这些研究结果的证据是，穷人往往只能得到最差的住房和生活条件，不成比例地过度暴露于污染和环境恶化，并经常处于在暴力和迫害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境地。这些社会—政治条件结合在一起，助长了人力资本的贬值并有可能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问题，从而促成并维持贫穷和绝望的恶性循环。这些条件还会削弱在收入和减贫方面取得的任何成就。

56.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发现，较为公平的公营部门投资有效地增加了接受教育、享受保健和得到其他社会服务的机会。例如，证据显示，在印度的喀拉拉邦，通过提高教育水平，特别是妇女的教育水平，可以促成脱贫，帮助降低生殖率，延长预期寿命。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仅相当于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但两国的预期寿命不相上下，其主要原因是前者实行了切实有效的基础教育、公共保健和医疗照顾政策（Sen, 1995）。

57. 各种研究表明，对人力资源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帮助减少了贫穷，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在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帮助形成了教育水平很高的劳动力。教育的普及帮助产生了掌握为工业升级所必需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源，并增加了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包括提高技能和增加工资（Jomo, 2003）。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不平等程度长期以来不断降低，这可以归功于政府为再分配和创造就业所进行的努力（Jomo, 2004）。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很多国家经验中的少数几个，显示通过消除在获取基本社会服务，特别是接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可以导致贫穷的减少。

58. 如果不同时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特别注意像歧视和代表权这样的问题，减贫措施还不全面。正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有些时候，造成贫穷的原因是人们由于自身特性、信仰或居住的地方而无法得到现有资源。正如贫穷可以造成歧视一样，歧视也会导致贫穷”（United Nations, 2001, para. 11）。

59. 歧视有很多形式，包括执法不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法律是公正的也无济于事。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揭示出来的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警察和官方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袒护富人，迫害穷人，使穷人更加不安全、恐惧和贫困”（Narayan and others, 2000, p. 163）。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如果不一视同仁，所产生的后果是针对社会贫困阶层的性别、种族和族裔歧视（横向不平等的表现形式）。由此受损害的通常是劳工法和消费者法，例如禁止掠夺性定价的法律；由于这些法律执行不力，出现了从穷人向富人的“再分配”。在另一些情况下，法律本身可能也不公平。掠夺土地使得穷人流离失所或背井离乡，通常是对这个脆弱群体的歧视造成的，其形式可能是合法的土地征用。

60. 代表权使穷人能够参加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决策。显示代表权不平等的最好例子，也许是法规制定过程中的穷人无权地位和精英阶层的主导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这样一个制度经常产生对穷人不利的法律；土地改革法和一般的产权法，特别是其中的知识产权法，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考虑到涉及的利益，传统的精英阶层很可能抵制穷人在决策过程中的积极和知情的参与（United Nations, 2004a）。考虑到已经掌握权力者的根深蒂固的利益，并考虑到那些因为收入不平等而受影响最大的人经常缺乏能力，无法对自己所在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施加影响，较为平衡的代表权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不大可能出现。穷人只有能够参加有关法律和习惯做法的决策过程，才得以改变使其长期贫穷的种种条件，因此，收入的不足和代表权的不足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火上浇油。

61. 正如《报告》随后阐明的那样，由于民间社会的法律地位和体制化程度日益提高，并由于政府越来越承认民间社会在全球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弱势群体为自身发展出力的机会大大增加。尽管如此，穷人、少数群体、土著民族、农村居民、妇女和其他具有特别需要的阶层经常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即使在与自己直接有关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况使得当前在利用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不平等更趋严重。

62. 即使穷人有一些发言权，但为了捍卫或保护他们的权利，需要一定的费用，这会严重消耗他们的有限资源。可以把这种情况视为“逆向鼓励”，与给予大型商业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的投资鼓励截然相反。最后，如果存在高度歧视，不利于穷人的社会和经济抑制因素和惩罚因素也很强，从而使贫穷问题进一步恶化。

63. 收入分配和代表权的不平等以及在获取生产资料、享受基本社会服务、获得机会、进入市场和得到信息方面的不平等，再加上歧视，可以使贫穷状况恶化，

甚至导致贫穷。正如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建议所确认的那样，减贫政策和方案必须纳入含有再分配内容，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战略。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平衡兼顾很多对不平等程度、经济增长率和减贫努力的作用产生影响的复杂和相互抵触的社会—经济动因。尽管经济增长非常必要，但仅仅依靠增长来减少贫穷显然不够；还必须认真注意许多助长不平等的其他因素。

B. 结构改革、公营部门与不平等

64. 为了消除不平等，需要采取改革措施来增加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机会和能力，以促进把所有阶层都包括在内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如果全体国民身心健康、受过良好教育、就业充分和享有适当的社会保护，社会的凝聚力将得到提高。因此，保健、教育和社会保护政策的再分配潜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应该增加穷人获得公共服务和资产的机会（特别是保健和教育部门的这些机会），并举办收入转移方案来支援最贫穷的家庭，这两项工作对于改变机会结构来说必不可少，是减少跨代贫穷和不平等的关键。对于一项通盘和公平的减贫战略而言，打破跨代贫穷的循环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65. 自 1980 年代以来，若干国家的政府相继采取措施来减少社会服务支出，提高成本效益，推行私有化，并在向穷人提供公共服务时更有针对性。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某些成员国实行的政策是减少面向全民的社会方案的支出，例如减少失业补助和养老金支出，从而减少了向低收入家庭的公共转移支付（Weeks, 2004）。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获得公共服务的渠道对不同的人群区别对待；这些变化非但没有造福于最贫穷的人，而且实际上妨碍实现平等目标（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0b）。

66. 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期实行结构调整方案时，人们的期望是，进行结构调整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有所提高，而财政失衡问题一旦解决，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将足以产生社会效益。但是，实际情况表明事与愿违，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很多地区尤其如此，决策者们因此逐渐意识到，如果以牺牲社会政策为代价来奉行经济稳定政策，会产生长期的不利后果。

67. 过去二十年的这些结构改革措施造成的积累后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都更为严重。像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由于意识到这种有害的影响，已开始支持社会发展，将此作为其全面减贫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见 World Bank, 2004c）。这一转变的明显迹象出现在 1999 年 12 月，当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董会批准采用新的方式来执行在低收入国家减少贫穷的困难任务，这个方式的主要内容是制定由各国自己当家作主的战略来解决贫穷问题，这些战略将载于国家减贫战略文件。另一个明显迹象，是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援助方案的名称从优惠结构调整贷款机制（ESAF）改为减少贫穷促进增长贷款机制（PRGF）。截至 2005 年 4 月，总共有 45 个国家拟就了本国的第一份正式减贫文件，其中 24 个国家编写出了本国的第一次年度执行进度报告；另有 12 个

国家拟就了本国的临时减贫战略文件（World Bank, 2005）。这些措施的推广反映出，为保持在更广泛的全面发展范畴内取得的进展，社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68. 世界银行确认了贫穷问题的某些多层面因素，其中包括对脆弱性和风险的暴露、低水平的教育和保健以及无权的地位（World Bank, 2000）。除这些因素外，还必须注意像土地、资本、技术和教育这样的资产的分配不平等，以及参与决策过程方面的机会不平等。虽然各项减贫战略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呼吁，把社会发展纳入结构调整方案（United Nations, 1995），但这些文件尚未充分体现贫穷问题的多层面性质。

69. 结构改革促使各国开展努力来消除不平等，这些努力包括彻底改造社会保障体系和关键社会部门发挥的作用，同时特别强调通过效率更高的管理做法来扩大福利的覆盖面和提高福利质量。各国政府还推行了体制改革，以提供更好的服务，改进确定帮助对象的工作，并使资源与服务挂钩。

70. 同样，各国当前正在努力加强社会方案与促进生产活动的工作之间的联系，例如与培训之间的联系。例如，某些国家把传统福利制度的重点从应享福利转向为最弱势的群体创造就业和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此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改革，把具有针对性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一项标准。这些举措进而在资源分配格局和干预措施、社会方案的规模以及传统安全网的管理方面导致变化（Morales-Gomez, 1999）。最后，现在有很多国家的政策议程列入了适当结合利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从事公益活动的问题，以及确保管理和补贴制度的公平问题。

1. 教育、保健和社会保护的普及

71. 受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健康状况、就业机会、社会保护以及其他层面的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广泛存在于很多国家，并且正在恶化。人们通常把教育视为实现机会平等的一个强有力因素，因为教育为个人提供了达到较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能力，并使那些生活在受污染环境的人能够克服主要的健康威胁。人们通过学会阅读和写字并掌握技术或专业技能，将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像样的和收入较高的工作。此外，大量证据显示，即使在环境卫生设施很差，没有自来水的地方，如果母亲受过教育，子女的存活机会大大超过那些母亲没有受过教育的儿童。这些事实显示，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教育制度内受教育的平等机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份。

72. 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继续存在教育质量和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差别。受教育机会的差别很普遍，一般取决于社会—经济背景和家庭背景。由于这样的差别通常是世代相传，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的，人口中的某些阶层被系统地排斥在外。

73. 研究显示,随着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在这方面,中学教育产生的效益最大,对于妇女尤其如此(Cornia and Court, 2001)。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意识到这些深远的影响,已把保证普及初级教育,特别是女童的初级教育,和保证初级教育的覆盖面以及推广中学教育作为国家议程的重点(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5)。各国还把取消学费,以及提供特别鼓励措施来促使最弱势的群体让子女上学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手段,用以促进教育的平等。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向贫穷家庭提供现金和免费学校伙食这样的实物补贴,以争取提高入学率(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Project, 2005)。在教育资源充裕而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平等程度较为容易提高,因此,很多国家开始改变教育融资和资源分配制度,并正在扩大私人投入的范围(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04)。

74. 其他教育改革措施侧重于纠正与课堂教学的质量和实用性有关的不足。某些这样的改革措施是根据劳动力市场中不断变化的需求来实现质的变化。新技术和竞争的加剧对劳动力提出更多的要求,因此亟需普及符合实际需要的基础教育,调整教学内容,以保证使学生获得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技能的差距助长了收入差别的扩大。几乎毫无例外,熟练和非熟练劳工之间的工资差别,特别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作人员和劳动力其他成员之间的差别,已经扩大(Ocampo, 2002b)。总而言之,必须更加注意保证普及高质量和符合实际需要的教育,并普及培训和提高技能的机会,以减少不平等和促进劳动力市场内的更广泛竞争力。

75. 保健是公平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投入;健康状况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决定机会的多寡和生产率的高低。保健不平等的普遍特点是,社会中较为弱势的阶层得不到医疗卫生服务,被排斥在保健系统之外。最近在医疗卫生部门实行的某些改革措施是为了保证普及初级保健,其他一些措施则是为了提高保健质量,并提高保健系统向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效率。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创新和有针对性的办法,例如,为那些无力支付的人免除保健费用和收费,以及向贫穷家庭直接提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以奖励把子女带到保健中心做定期检查这样的家庭行为(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76. 改善妇幼健康的工作得到特别强调,这是为了使每年1 000 万以上的儿童死亡数字和50 万的母亲死亡数字有所下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b)。这方面的举措经常集中于提高妇女在社区内的地位,鼓励预防疾病,并传授更好的子女养育办法。这些努力的核心是一个综合的家庭保健办法,这种保健服务从怀孕开始,再经过分娩,一直延续到童年。由于能够享受延续不断的保健服务,而不是通常的那种支离破碎和断断续续的保健,母亲和儿童都得到很大好处。注重妇幼保健问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减贫办法,贫穷既是病痛的原因,也是其后果。

77. 经过改进的社会保护机制，包括失业补助、残疾保险、退休金、社会保障金和其他形式的收入补助，也是减少不平等和贫穷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保护，个人和家庭，特别是较弱势群体的个人和家庭，就有更大的可能由于失业和变故而蒙受巨大的困苦。当前，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护体系和制度都很薄弱，资金严重不足，世界上几乎 80% 的人口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护 (Garcia and Cruat, 2003)。

78. 在拉丁美洲，社会保障制度的共同特点是“区别对待”，为正式经济部门的城市地区中等收入雇员提供保障，但很少向穷人提供，各种福利方案没有把后者充分包括在内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0a)。同样，某些非洲国家为城市医疗设施和大学建立了有利于富人，但是以牺牲穷人为代价的补贴制度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9)。那些推行宏观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预算绩效条件，通常牺牲社会保护制度，表现为削减现有的方案，或者推迟执行或推迟扩展新的社会保护举措 (United Nations, 2004c)。

79. 即使在某些发达国家，社会保护也远非普及，通常没有提供足够的福利。此外，一些高收入国家中的趋势是实际削减福利和其他收入补助。另一些正在实行的措施是推行某些社会保险计划的私有化，例如退休金和医疗计划的私有化。各国之所以推行这些改革，其动机至少部分来自越来越大的费用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于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以及失业率的高居不下。然而，由于为了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效率而采用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式，并扩大私营部门在提供退休金和保健服务方面的作用，社会互助受到损害。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在私营系统内，由于缺乏社会互助精神和性别之间的转移支付，退休金缴款水平的不平衡没有得到纠正，从而使性别歧视造成的不平等更趋严重 (Mesa-Lago, 2004)。从整体来看，上述改革措施对人和对经济造成了有好有坏的影响，但一般是坏的影响更多一些，从而支持了这一观点：国家应继续在社会保护中发挥主要作用。

2. 干预情况

80. 各国尝试了不同的方式来以更高的效率帮助受益群体，这方面的抉择经常可以归纳为是采用全民方式，还是采用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全民方式指的是，保证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某些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保护和福利。这一方式与社会互助原则有着密切联系，要求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分担提供服务的费用，主要是通过征税来实现这种分担。采用全民方式提供社会福利时遇到的重大障碍包括资源短缺、在优先次序问题上缺乏共识、以及执行问题。针对性方式指的是根据实际需要或认定的需要，或作为获得政治支持的手段，向一些选定的群体提供保护和福利。鉴于公共资源的稀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经济调整时期和危机时期，人们通常把针对性方式视为较好的选择，因为这个方式具有

较高的成本效益，并使那些最需要社会服务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这些服务，尽量减少了意外流往非穷人的福利。针对性方案的例子之一，是以子女保持入学并接受基本保健服务为附加条件的收入转移支付方案；这样的措施是为了提高终生的收入能力，可以在实现较为公平的国家福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world Bank, 200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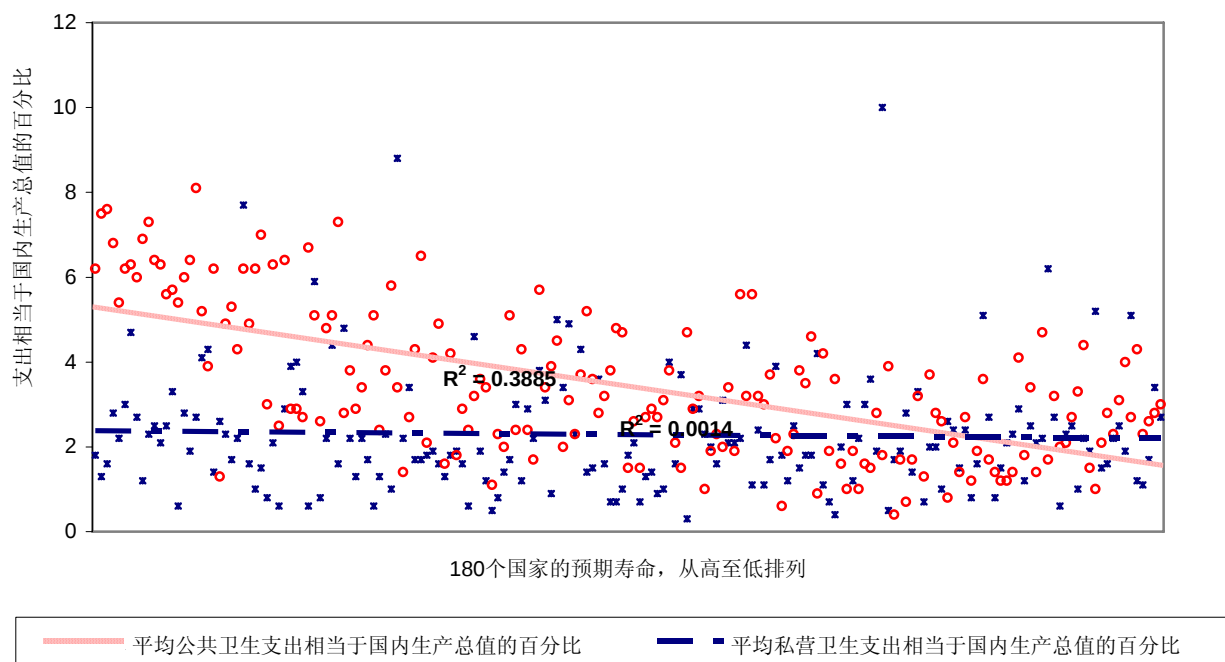
81. 很多国家除了针对性方式之外，还尝试了其他干预办法，包括扩大私营部门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重点从公营机构到私营机构的转移是若干因素共同发挥的影响导致的，这些因素包括使经济自由化的压力、公营部门资源的相对稀缺、以及公营部门所提供服务的低质量。很多国家已使公共社会服务私有化，或把这些服务外包给私人承包商。在另一些国家，教育、保健和其他服务仍然是由公营部门提供，但是已开始收取使用费。社会保护服务也出现把职责从公营部门转移给私营部门的情况，这种转移经常是在私有化方案下进行，并往往导致社会援助的减少和公共保健方案的缩减，从而削弱了社会保护制度。

82. 各国制定了各种方式来结合运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与，以帮助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例如，在教育券制度下，政府使用公共资金来使贫穷家庭的子女得到私营教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3)。如果私营部门的参与已成为提供社会服务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目标是实现全民普及和向弱势群体提供福利，那么，就必须保证防止排斥现象。经验表明，如果公营和私营两个部门联合参与的体系设计和监督不当，获得服务和福利的机会将受到严重限制，某些人会被排除在外。因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框架，以保证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并建立法律机制来防止或制止排斥或歧视某些群体的做法。私营部门虽然可以参与社会服务和福利体系的管理和操作，但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参与也不能取代公营部门提供这些服务的职责。

83. 尽管为争取私营部门的参与所进行的努力，国家和公营部门继续在提供大多数社会服务方面，并在保证使这些服务面向全民，特别是面向人口中最贫穷的阶层方面担负着首要责任。图一.2 显示了公营部门保健支出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强有力关系，这个关系清楚表明了公营体系的功效。凡那些在增加预期寿命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日本、西班牙和瑞典），都保持了高水平的公共保健支出，使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5%至 8%，而私营部门保健支出的水平则要低很多。在所有国家，预期寿命与私营部门保健支出之间的关系都很薄弱，但有几个离群值除外（柬埔寨、黎巴嫩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保健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特别高。对比之下，公共保健支出和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很强，国与国之间预期寿命差别的接近 40%归因于公营部门保健支出的水平。应该重视这些证据，现在尤其如此，因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正受到巨大压力来减少公共部门的社会服务支出，改为由私营部门负责这些支出。

图一. 2

出生时预期寿命与公共和私营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 2002 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http://hdr.undp.org/statistics/data>; 2005年5月23日查询)

84. 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应在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与之间达成适当平衡，以保证维护全民、互助和社会包容原则。为了提高平等程度，服务的公共管理应该以高效率和高透明度为特点。非政府组织常常在达到这些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这些组织帮助填补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空白，而且是促进社区关注，特别是促进关注穷人方面的一支重要力量。

C. 结论

85. 为了持续减贫，特别是为了在减贫当中促进社会公正，关键在于集中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增长并不是万灵丹，不平等水平可以成为一个决定因素，左右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为了克服不平等，需要投资于人，重点是增进教育成就、技能培训、保健服务和全民福利，并增加和改善获得高质量就业的机会。还必须同样注意贫穷问题的社会-政治因素，并作出严肃的承诺，来保证消除歧视，解决歧视造成的问题，保证平等地保护人权，并更加平衡地在所有利益有关者之间分配政治权力和代表权。因此，必须给予人民权力，使其能够说出自己关注的问题，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决策过程。

86. 尽管进行了改革努力，把举办社会方案的职责转交私营部门，但国家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仍然是关键的。为了减少贫穷和不平等的跨代延续，根本的一条是保证所有人都有平等机会获得公共服务，特别是旨在增加机会和能力的教育和保健服务。因此，应该继续用全民、互助和社会包容的原则来指导提供社会服务的工作。

87.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为社会政策改革进程确定了一个共同依据，各方面在其指导下开展了努力，来克服由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执行的结构调整方案而变得更加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趋势。《哥本哈根宣言》强调，必须向全民公平地提供教育和初级保健。在强调这些消除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和原则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有关机会平等的普遍价值观、文化和容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以及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

88. 应该把平等原则作为社会和经济决策的核心，以保证使经济增长有助于社会发展、稳定、公平竞争和道德操守 (United Nations, 1995, chap. I, para. 12b)。当前世界上的普遍社会状况是以猖獗的不平等为特点，有鉴于此，决策者必须注意到不平等引起的困境所构成的挑战。正如本项分析至此所显示的那样，如果不这样做，将带来很大损害，以下各章将非常明确地对此加以阐述。

注

¹ 见本文附件，其中载有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作出的 10 项承诺。

二. 聚焦不平等问题：非正规经济

89. 非正规经济是同正规经济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通过对非正规经济的考察发现，集中力量解决不平等问题，对实现更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事正规经济的人通常都属于社会的“富人”阶层，因为他们更容易得到体面的工资、享受工作福利、就业有保障、并受有关法规保护。而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通常是“穷人”；他们往往被排除在各种法律保护之外，并且无法享受正规经济给予的基本福利或基本权利。由于大多数穷人从事的都是非正规工作，在许多国家出现且近来日益扩大的非正规经济对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具有重大影响。

90. 从事正规经济既意味着享有权利（保护），也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而从事非正规经济则两者皆缺。由此产生的不平衡会导致不平等。从权利和保护方面来看，国家的劳动法、包括安全和健康法规，对非正规经济劳动者普遍未加规定，他们无法享有社会保障、养老金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保护。另外，非正规经济劳动者和雇主通常也无权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

91. 从责任方面来看，非正规经济劳动者和雇主通常不缴纳所得税及营业许可费等费用，因为他们的活动是未受管控，也没有记录。税务负担方面的分配不平衡也导致另一种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正规经济劳动者和雇主因此成为主要纳税人，而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基本上逃避了税务责任。相对于从事正规经济的人来说，那些从事非正规经济并有能力纳税但却未交税的人便享有竞争优势。而未缴税收有可能导致面向穷人和脆弱群体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下降，因而进一步造成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92. 通过对正规和非正规经济的客观比较，可以发现许多不平等现象，包括薪给、福利和男女不平等，以及税务负担方面的明显不平衡。除上述显而易见的差别之外，非正规经济受到更大重视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非正规经济占据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全部经济活动的相当大甚至绝大部分。因此，如果不对非正规经济加以足够的重视，就很难纠正全世界不平等和不公正造成的种种情况。

A. 非正规经济简述

93. 尽管多年来很多人都试图给“非正规经济”下一个可行的定义，但很难找到准确的定义。然而，在没有通用定义的情况下必须牢记，定义不同，计量方法也会不同。从本质上说，非正规经济可以根据从事者（就业状况）或所发生的活动（经济活动类型）来加以定义。¹

94. 用这两种不同的评估办法，就会产生不同的计量结果。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可按就业人数来计量；而采用更广泛的确定经济活动类型的办法，便可计量出非正

规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这两种评估办法都表明，过去几十年来，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当中都迅速增长，为大多数国家的总体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表二.1 显示了非正规经济在若干国家的迅速扩增情况。由于有关数据依据的是各国自己的定义，因此这些数据仅可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比较。

表二.1

部分国家非正规部门^a的规模及增长情况（按性别分列）

国家	年份	共计	人数(千)		每100名 男子中的 妇女人数	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的百分比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吉尔吉斯斯坦	1994	140.0	..	..	..	8.2	..	..
	1999	194.1	118.8	75.3	63	24.9	28.5	20.8
立陶宛	1998	154.2	86.1	68.1	79	48.5	46.9	50.7
	2000	201.6	116.6	85.0	73	72.0	71.9	72.2
马里	1989	383.0	176.8	206.1	117	78.6	67.6	91.5
	1996	1 176.1	485.6	690.2	142	94.1	91.0	96.4
墨西哥	1991	6 328.4	3 750.0	2 578.4	69	30.9	29.5	33.1
	1999	9 141.6	5 693.8	3 447.7	61	31.9	32.7	30.7
斯洛文尼亚	1994	362.0	276.3	85.7	31	17.6	23.2	9.9
	1999	450.0	343.5	106.5	31	23.0	30.5	12.9
	1998	1 431.0	1 001.0	430.0	43	9.2	11.6	6.2
南非	1999	2 705.0	1 162.0	1 544.0	133	26.1	19.3	35.5
	2001	3 319.0	1 572.0	1 746.0	111	31.0	25.7	38.2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参照各国出版的数据。

^a 采用本国的定义。

95.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中，非正规就业占非农业就业的 $\frac{1}{2}$ 到 $\frac{3}{4}$ 。非正规劳动者占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在北非是 4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1%，亚洲 65%，撒南非洲 78%¹¹（国际劳工组织, 2002b）。

96. 非农业经济部门往往是非正规劳动者的主要雇佣者，其主要原因是，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移徙人口造成了大量缺乏正规经济就业所需技能的劳动者。低技能的人是正规经济劳动者中最脆弱的人群，因为他们更可能被迫在非人道的条件下工作，并接受低工资。尽管非正规经济从事者中有不少人实现了完全就业，但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许多是在正规经济中未充分就业或者不能保住工作的人。尽管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在某些领域有所重叠，但双方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深，这种界限进一步分化社会，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阻碍穷人参与发展进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2005b）。非正规贸易，主要是街头的摊点买卖，占城市非正规就业的 30%至 50%（Charmes, 1998）。

97. 非正规经济劳动者包括各行各业，其中有街头摊贩、人力车夫、以家为作坊的制衣工、以及每天的临时工。他们的就业状况各不相同；在非正规经济中存在不按工资计酬的劳动者（独立劳动者），包括非正规企业业主和个体户，也存在按工资计酬的劳动者（非独立劳动者），包括帮佣、在家上班者和非正规企业的雇员。在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之外，个体劳动者占非正规就业的 60%至 70%，按工资计酬的就业只占 30%至 40%（国际劳工组织, 2002b）。所有这些劳动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就业合同没有保障，没有工作福利及社会保护，以及缺少“声音”（代表权）。

98.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提供的资料估计，2003 年全世界有 13.9 亿人，即 49.7%的劳动者无法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超越每天两美元的贫困线。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将近 $\frac{1}{4}$ （23.3%）的劳动者每天的生活费不到 1 美元（国际劳工组织, 2005c）。极低收入的劳动者大部分从事非正规经济，因为非正规经济的平均工资较低。当然，并不是所有非正规经济劳动者都属于贫穷的劳动者；但是，贫穷的劳动者几乎可以等同于非正规经济中收入极低的劳动者（国际劳工组织, 2005c）。也可以说，由于非正规经济劳动者缺乏权利、保护及代表权，他们更容易陷入贫困。

99. 除平均工资较低外，非正规劳动者极少能够享有雇主或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或其他形式的社会保护。由于缺少社会保护（包括各种机会、资源及服务，如保健、养老金、教育、技能发展、培训和子女照料），这些劳动者进一步遭受社会排挤。而之所以很难向非正规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其中一个原因是，很难征收税收和向达到最低收入水平的劳动者收取有关费用；而雇主和雇员之间普遍没有建立直接关系，也是一个因素。然而，向非正规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努力正在得到加强；例如，印度实施了一项举措，对一些行业的总产出征税，然后用作这些行业的所有劳动者的福利经费（Chen, Jhabvala and Lund, 2002）。

100.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非正规经济的工资和福利通常比正规经济低，但非正规经济内部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各种就业活动的工资总体呈下降趋势；雇主占有大部分收入，而个体和临时短工的待遇不断下降，分包劳动者的待遇不断下降。妇女一般属于后三类，而且分包劳动者大部分是妇女，妇女成为雇主的较少（*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2004c）。另外，妇女比男子更可能从事非正规劳动，男女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程度更加显著。

101. 总体而言，在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之外，妇女大约有 60% 从事非正规就业（国际劳工组织, 2002b）。在家工作和街头摆摊是非正规就业妇女的常见工作。在家工作的人面临许多问题，如工时长但报酬低，工作条件差；被排除在国家劳动法规之外；工作不稳定；无权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缺少工作福利，如养老金、保险、安全 and 健康保护及带薪假等；由于这些情况，非正规劳动者的子女往往也必须参加劳动，以补充家庭收入（*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2004b）。

102. 妇女很少成为雇主，而男子很少成为企业的打杂工人或在家上班者。在同一行业中，男女差别也很大。例如，男商贩通常规模较大，多经营耐用品，而女商贩通常规模较小，多经营食品（Chen, Jhabvala and Lund, 2002）。由此可见，妇女从事非正规经济，比男子更容易陷入贫穷，这些因素是“贫穷妇女人数日增”的原因之一。加剧这一状况的是，妇女经常被剥夺拥有或持有土地的法律权利，即使是在承认该权利的地方，法律上的承认和土地实际获取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2005）。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妇女失业率、就业不足率和非正规低工资就业率高于男子。

103. 非正规经济活动种类繁多，有的是为了生存被迫从事的工作，有的是较为稳定且适应性强的生意，有的则是富有活力、效率并不断增长的企业。非正规经济在几乎所有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中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根据一项对 110 个国家非正规经济的研究，2000 年非正规经济的平均规模在官方发表的国民总收入（GNI）中所占的份额在经合组织国家是 18%，转型国家 38%，发展中国家 41%。就具体地区而言，1999 至 2000 年度，非正规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非洲是 42%，亚洲 26%，拉丁美洲 41%（Schneider, 2002）。

104. 同一份研究还表明，非正规经济在此次分析所包括的经合组织国家中正在扩大；这些国家非正规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份额从 1989-1990 年度的 13% 增长到 1999-2000 年度的 17%（采用未加权平均数），后半期的增长速度有下降的迹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非正规就业主要包括非标准的工种，包括非全时和临时工作、个体户、以及各种临时工和合同工，所有这些工种给予的工作福利和社会保护都是有限的。

105. 2002 年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评估了非正规企业对 26 个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 各地区之间差别较大, 北非的平均比率为 27%, 拉丁美洲 29%, 亚洲 31%, 而撒南非洲是 41%。在调查报告覆盖的国家当中, 墨西哥的相对比率最低 (13%), 加纳最高 (58%)。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各国在编写关于非正规经济的估计数时采用的方法不同 (国际劳工组织, 2002b)。

B. 非正规经济的吸引力

106. 非正规经济有诸多缺点, 但为什么它仍成为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一个重要且不断增长的部分?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别无选择。随着在业人口增多, 正规经济无法吸纳所有寻找工作的人, 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许多人转向非正规经济, 因为他们不能在正规经济中找到工作或自行创业。对于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处于就业年龄的人来说, 加入非正规经济并不是一个选择, 而是一条活路。对于那些被迫寻找活路的人来说, 非正规经济提供了一个方便之门。参与者可以利用当地资源, 其业务通常规模较小, 因此也便于经营, 所需投资也很少。另外, 也不需要多少的教育、技能和技术, 因而教育程度低和未受训练的劳动者可以踏足劳力市场。

107. 必须认识到, 不是所有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对那些自行创业的人来说, 非正规经济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不纳税和不受管理的致富之路。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 非正规经济的吸引力则在于它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包括非全时和临时工作机会 (Chen, Jhabvala and Lund, 2002)。另外, 非正规经济还帮助许多人树立创业精神, 培养商业才识、创新能力和重要工作技能。

108. 在各国,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 非正规经济的吸引力在于它使企业能够避免缴纳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及其他同工资有关的税。雇主也通过绕开健康、安全及环境方面的规定和不遵守知识产权, 而节省经费。通过对经合组织各国的比较发现, 一国的税务和有关法规造成的费用越昂贵, 越复杂, 该国的非正规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越大 (The Economist, 2004)。

109. 综上所述, 可得出以下结论: (a) 税务和社安费用负担越重的地方, 非正规经济越大; 而国家管控力度越大的地方, 非正规经济规模也就越大; (b) 劳动力总成本和税后工资的差额越大, 从事非正规经济的动力也就越大 (Schneider, 2002)。

110. 然而, 在有的情况下, 非正规企业者必须纳税。甚至比规模更大的正规经营者处境更不利。例如, 当政府降低公司税来鼓励商业发展时, 正规经济中规模较大的公司就能享受减税, 而非正规企业者不能。在一些地方, 市议会还派遣收税官, 确保街头商贩缴纳日常的市场费, 不管这些商贩是否在当地有关部门登记

过。而市议会还有可能通过罚款或收取贿赂的形式，向商贩征收间接税，因此让非正规企业保持非正规的身份，对市政府来说也有益处(Chen, Jhabvala and Lund, 2002)。

111. 除非正规经济在纳税方面的利弊之外，它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也应加以考虑。随着非正规经济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增长，国家税收必然会减少，公共事业及服务的质和量因此都会降低。为弥补税收的减少，各国政府可增加正规经济的税率，但这会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非正规经济；也可减少公共服务。二者都会造成不平衡，加剧不平等，长期而言对脆弱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

112. 不可思议的是，劳动法也在增加非正规经济对许多人的吸引力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劳动法的基本逻辑和宗旨是减少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固有的不平衡，调节各方利益，在不扼杀企业发展动力的同时为劳动者家庭提供保障(Trebilcock, 2004)。问题是，劳动法没有跟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没有有效应对全球化，而且各项法律和行政规定也提高了进入正规经济的门槛，令许多人望而止步(国际劳工组织, 2003)。雇主和企业者在正规经济中雇佣人员或办企业的法律障碍过多，就会转向非正规经济。修改劳动法，使其更符合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会有利于减缓非正规就业增长的势头，进而恢复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更好平衡。

C. 非正规经济增长的原因

113. 多年来，发展问题专家认为，强调经济增长，有利于总体发展，包括有利于非正规经济的自然削减，最终也可起到减贫作用。然而，过去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经济不但没有随整体经济的增长和工业发展减退，反而迅速扩大。通过对非正规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经济增长、竞争力及自由化政策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114. 正如前文所述，非正规经济尽管存在固有的缺点，但仍有很强的和不断增加的吸引力。虽然近年来的非正规经济扩张有很多原因，但推动大多数国家非正规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模式、经济调整和经济危机、以及为应对全球竞争而对生产链进行的调整(Carr and Chen, 2002)。

115. **经济增长模式。**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幅度很小，或没有增长，有的国家出现了“无就业型增长”，即资本密集型增长。当正规经济不能产生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所有求职者时，一些人就会被迫在非正规经济中寻找就业。劳动力市场经常受到技能要求变化的影响。例如，随着高科技部门相对快速的增长，许多经济体中的高技能工作机会就多于低技能工作机会，而对那些在新兴劳动力市场上参与竞争却没有相应技能的人来说，非正规经济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116. 在增长模式当中有一个更积极的有利于非正规经济扩大的因素，这就是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广泛兴起。这一类企业经常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往往比正规的

规模更大的企业更具灵活性，因而能够成为一些行业、地区以及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动力源。

117. **经济调整和经济危机。**有证据表明，非正规经济规模的扩大会出现在经济调整期或转型期当中，如前苏联国家便属于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经济危机当中，如 1990 年代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情况。在经济调整期当中，被裁减的劳动者为寻求生计，进入非正规经济。随着公共部门的裁减及公有制企业的关闭，特别是结构调整方案造成的裁减和关闭，下岗工人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出路。由于许多国家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案不够充分，甚至根本不存在，劳动者无法保持完全的失业状态。许多人转向了非正规经济，以便养活自己和家庭；因此，非正规经济实际上成为一个安全保护网。也有人进入非正规经济，是因为他们需要补充家庭收入，应对通货膨胀或公共服务的缩减(国际劳工组织, 2002b)。甚至在经济调整期之后的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阶段，非正规经济仍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增长，在缺乏适当机构或者政策阻止非正规经济扩大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Johnson, Kaufmann and Schleifler, 1997)。

118. **为应对全球竞争而对生产链进行的调整。**为增强全球竞争力而进行的一些根本改革，在非正规经济的扩张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通常有利于资本，特别是能随意运动资本和货物进出边界的大型跨国公司，而不利于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因为他们很难或不可能移徙。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一直得到鼓励，但在促进劳动力跨界自由流动方面所做的工作却很少。实际上，许多国家反而正在试图加强边境控制，限制移徙工人的进入。因此，由于技能差别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一个世界现象 (Ocampo, 2002b)。

119. 为提高全球竞争力，投资者正在将生产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因而越来越依赖于更非正规的就业安排，包括“灵活的专业化”。而在灵活安排当中，就业标准通常会下降，劳动者既得不到最低工资水平的保障，也得不到维持一份工作的保证，而且很少能够享有有关福利。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安排无异于按件计酬或者零工。为降低成本，许多大行业对生产和分售进行重新调整，改为通过全球商品链外包或者分包。商品链第一环节是大公司，它们往往仅仅专门进行产品的设计和营销，而将所有的制造和生产责任分包给低工资国家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再同小型非正规的生产单位签订合同，这些生产单位又将生产订单分包给单个的非正规工人。这些工人处于商品链的末端，他们的工资都极低，而且许多人，如以家为作坊的工人，还承担了非工资生产成本。由于在许多地方就业形势非常不稳定，因此许多非正规工人，特别是贫穷和弱势工人被迫接受任何条件。例如，在服装行业当中，服装公司不向工人提供有保障的雇佣合同，而仅将他们当成在家中作业的分包者 (Chen, Jhabvala and Lund, 2002)。在这种情况下，正规经济中的公司不仅无法吸收劳动力，而且也不愿意吸收。

120. 全球化也有利于那些大型公司，因为它们能够很快占有新的市场并轻而易举胜过小型和微型企业，而后者在把握和进入新兴市场方面困难较大。个体经营情况也变得更不稳定，因为个体生产者和贩卖者更易失去他们所占有的那一块市场。在全球化形势下，低技能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失去了他们大部分讨价还价的力量，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处境更加不利。

121. 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然而，许多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难以获得这些机遇，因为他们无法享受正规经济参与者通常享有的福利，包括获得贷款和关于商品价格、质量和来源以及潜在市场和顾客的信息(Chen, Jhabvala and Lund, 2002)。个体经营者（及广大妇女）往往很难得到贷款、培训、技术以及市场信息。这些人还面临着在国内市场上的进口产品经销商以及（出口市场）规模更大的正规单位的竞争，往往被迫转入其他赢利较少的非正规经济领域，有可能成为小商小贩，或在家或在工资低条件差的工厂工作，按件计酬(Carr and Chen, 2002)。

122. 除上述困难外，非正规经济持续扩大最终会导致劳动力过于集中，从而加剧内部竞争。而竞争的加剧又会产生一种降低非正规经济部门劳动者收入的压力，使人们更难以挣钱糊口，不管他们如何拼命工作或有多少家庭成员帮助干活。

D. 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联系

123. 虽然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作，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存在许多的密切联系。二者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和就业的统一体，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加，不再界限分明。问题在于，这种关系是良性的，剥削性的，还是互利的(Carr and Chen, 2002)。在对这一关系进行更准确的定义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二者之间的正面关系，以便确保增加两种经济中体面就业的机会。

124. 一些主要出口行业（服装、皮革、纺织、运动鞋、地毯和电子产品生产商）的经验可用来说明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联系。上述行业中相当部分的劳动力在非正规安排下就业，许多人在出口加工区、血汗工厂、或自己家里工作。而将它们同正规经济联为一体的是一个全球的商品链，即一个将劳动者、生产和分销过程联系起来，为一项商品或产品的制造和营销服务的网络。从一种产品的概念设计到最终使用及此后各阶段发生的一系列活动，可体现于全球价值链，这种价值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买主驱动的链条，如制鞋业和服装行业，在这一链条当中，零售商主宰着生产。另一种是生产者驱动的链条，如汽车和电子行业，大型生产厂家主宰着整个过程。从投入生产到最终产品的销售，每一个环节都由实力雄厚的买主和生产者掌控。而处于链条底部的是那些以家为作坊的非正规经

济劳动者，他们从这样的安排中一般获利最少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2004a)。

125. 全球生产和分销出现的一个变化是，及时存货管理和控制系统或“精益零售”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也就是不再有大量的存货和待发订货。例如，在服装行业中，供应周转期很短，如果要在收到订单后尽快交货，制造货物的分包者就必须离欧洲和北美的主要市场相对较近。为满足这些市场的需求，目前，在距这些市场较近的国家中以家为作坊的工作有所增加，这导致了亚洲大型服装行业的衰退。随着这一行业更加分散和不稳定，在家工作的劳动者就更难以得到应有报酬，也得不到合同结束的及时通知，因此使他们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恶化。由于这些趋势日积月累，尽管非正规经济被认为是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不可兼容的，但非正规经济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明显扩大 (Carr and Chen, 2002)。

126. 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迫使公司和雇主寻求更加灵活的工作安排，以便降低成本。因此，他们对分包的依赖性增加，而以家为作坊的就业形式便成为特别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信息技术，包括因特网的普遍使用也推动了在家里从事的工作，因为大量的办公、技术和专业工作者能够在家中工作，而不需要在一工作地点上班。由于这种变化，雇主们能够节约租金、水电费、以及其他办公费用。

127. 在家的个体经营活动也出现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正规经济的收缩，许多人被迫自行寻找非正规的工作机会。虽然有些人认为在家中工作有好处，但是对于那些以家为工作地点的个体经营者来说，却有一些明显的不利之处；特别是，这些人往往始终处于信息圈之外，无法进入金融市场，也没有能力在产品市场上竞争。

128. 比较常见的在家里从事的工作活动包括卷烟；缝纫；洗衣和照顾孩子；组装插头或电子零部件；输入、处理或分析数据；向个人或企业提供专业或技术服务 (国际劳工组织, 2002b)。在这一类型当中没有列入那些从事无报酬家务活动或者有酬帮佣工作的人。家庭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千差万别，这取决于从事活动的类型及特定国家非正规经济的特点。

129. 一般而言，家庭产业工人是在家工作的劳动者中报酬最低，经济待遇最差的，这些人为一些企业生产服装，大多按件计价。此类劳动者的数量很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家庭产业工人目前占服装，纺织和制鞋行业劳动力的 30% 至 60% (Chen, Sebstad and O'Connell, 1999)。改善他们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一大障碍是，很难确定谁是雇主。究竟是直接提出工作订单的中介，是与中介订立合同的供货人，是从供货人那里获得商品的生产者，还是制成品的零售商？在无法明确谁是雇主的情况下，也就不清楚谁应为保护这些工人的权益负责。

130. 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联系还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随着正规经济当中的竞争加剧，更多的公司倾向于进入非正规或“灰色”经济。“灰色”公司一般规模较小，这有利于他们逃避税务部门的监管，他们喜欢保持这种地位，以便继续避税。保持非正规经济的性质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蓄意小规模经营的企业一般效率较低，这有损于生产力的增长，最终不利于一个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尽管如此，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零售业倾向于保持分散的和低效率的状况，因为非正规经营者认为，规模扩大带来的生产力增长会被在正规经济中增加的税额抵消。最近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并加大执法力度可能会让更多的企业进入正规经济，从而间接地提高生产力(Farrell, 2004)。

131. 有人主张，创造就业实际上会阻碍生产力增长。如果创造的就业是不体面的工作，生产率较低而且也不能提供充分的收入，那么对于经济的需求方不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国际劳工组织, 2005c)。为实现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要为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创造一个国内市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国内生产的货物和服务，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注定会陷入停滞。因此，也有人主张，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体面的就业和生产力的增长必须并驾齐驱，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经济增长就最终能够起到减贫的作用。

E. 结论

132. 对于非正规经济中的大多数劳动者和许多雇主来说，参与非正规经济的不利方面（不能依照劳动法获得承认、登记、管理或保护以及不能纳入社会保护计划）远远超过任何表面的利益。国际劳工组织所谓的“体面工作赤字”在非正规经济中更加突出。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往往意味着不安全和不健康的工作条件、工时长而得不到充分或稳定的补偿、工作技能低下、生产力不高、普遍缺乏信息、市场、资金、培训和技术(国际劳工组织, 2002a)。

133. 导致不平等状况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经常没有产权保障，这限制或阻碍了他们获得资本和贷款，进而限制了他们扩大经营规模或增长的能力。非正规劳动者和雇主一般也难以寻求司法系统的帮助来执行合同，因此他们上诉无门，更易遭受侵扰、剥削、虐待，以及腐败和贿赂带来的苦痛。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一贯的法律和司法框架，确保产权得到保障和尊重，使资产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

134. 应当在努力解决非正规工作的不利方面或减少体面工作赤字的同时，避免破坏非正规经济提供生计或发展创业潜力的能力。不应将所有的非正规工作视为消极事物，而应将其看作是“体面工作的延续体”。一边是为了生存而从事的无保护无管控工作，另一边是体面受保护有管控工作。最终目标是要加强非正规经济和正规经济之间的联系，确保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中都有体面工作（工人享

有权利，得到保护并有自己的声音)，而不必纠缠于“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理想的情况是，整个经济体出现改善的局面，不仅出现就业增长，而且就业的质量也有所提高(Trebilcock, 2004)。减少非正规经济中的体面工作赤字并确保人民的力量得到增强和保护，这同时也会有利于减少贫困。

135. 传统上，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和雇主很难参加大规模的雇主或劳动者组织，因此也无法享受这些组织提供的服务，对自己的工作权利得到认可和尊重，他们抱有渺茫的希望。妇女和青少年占据了非正规经济劳动者的大多数，他们尤其脆弱，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或代表权；家庭劳动者处境一样，由于同其他劳动者相隔绝，相对于雇主和其他工人来说，他们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然而，在这方面仍有一些改善的迹象。为帮助那些非正规经济劳动者而兴起的国际运动正在不断壮大，其中的重要分子包括以下机构：非正规就业妇女：全球化和组织化（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2004c），即对非正规经济妇女进行研究和政策分析的一个全球网络；StreetNet，即街头商贩国际联盟；以及 HomeNet，即家庭工作者世界联盟。这些团体以及类似团体的出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为那些受排斥或经常受剥削的劳动者提供了代表权和声音。

136. 全球化所涉社会问题世界委员会的报告强调，必须推动大量存在的非正规经济迈向体面工作，并强调这是为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报告建议，为了实现这一点，要确保劳动者权利（包括产权）得到明确规定和一贯尊重，并要提高非正规生产者的生产力和改善其进入市场的能力(国际劳工组织, 2004)。如果能够采取步骤确保非正规经济成为一个不断扩大、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的有机部分，即一个能够提供体面就业、收入和保护并带来国际体系内公平竞争贸易机会的经济体的有机部分，那么就能在解决不平等困境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

注

¹ 关于非正规经济的各种定义，请参阅：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 (Geneva, 1993)；ILO, “Conclusions concerning decent work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ninetieth session, Geneva, 3-20 June 2002 (见 the ILC Provisional Record, No. 25, para. 3)；和Friedrich Schneider, “Size and measurement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11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July 2002), p. 3, 其中参照 Feige (1989, 1994), Schneider(1994), 和 Frey and Pommerehne(1984)的定义。

² 不包括南非。

三. 不平等的趋势和类型

137. 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和推动其演变的基本经济力量是近年来经济活动最具有争议的方面之一。直到最近，关于全球不平等的讨论大多以经济指标为主，反映了人们优先注重采取政策，推动以经济增长作为包治发展弊病的妙方。不过，现在正更多地注意非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指标。与关于贫穷的辩论发生的转变相类似，关于不平等的辩论也逐渐反映了这项议题范围更广的概念，其中不再专注于可衡量的经济指标。

138. 随着不平等的非经济方面得到更广泛确认，不可避免地要把经济不平等同非经济不平等区分开来，这会把存在错综复杂联系的现象不正确地一分为二。不平等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社区、国家和全球各层面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一个层面缺乏机会的个人、群体和国家，通常在其他层面也会缺乏机会。例如，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资源的控制者往往也控制着政治制度，而无从控制两者中任何一项者常常就会受到忽略。同样，全球市场的运作对富国有利；穷国就比较不太可能从全球化中获益，但却更容易受全球化的风险和失败之害（Birdsall, 2002）。

139.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家之间，相互依赖都是经济不平等和非经济不平等之间复杂的结构关系的一个方面，千丝万缕的不同联系是无法隔离开来的，使订立解决办法的努力变得更为复杂。经济不平等与非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结构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两者的特点往往均为法律下的不平等，均为机会和条件的不平等——这些是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已着重强调的问题。

140. 本章说明了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经济不平等和非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并概述了其一些方面的趋势和模式。本章首先回顾了以收入分配、金钱上的贫穷和就业来衡量的经济不平等趋势，接着概述了与不平等的某些非经济方面有关的各种趋势，这些方面包括健康、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教育。

141. 从一开始就必须指出，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国家和国际层面存在不平等趋势，但数据仍然不全。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适用，而且不平等的经济和非经济两方面的指标都是如此。在对下文各节所述程度和趋势（尤其是短期趋势）进行解读时，都应考虑到数据上的这些局限。

A. 不平等的经济方面

1. 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

142. 最近对全球不平等模式的分析表明，在过去 50 年，国家间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相对较为稳定（Berry and Serieux, 2002）。不过，总起来说，对经济增长的计量显示，自 1980 年代以来，全球收入有所扩展。推动出现这一总体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印度持续不断的、但较为温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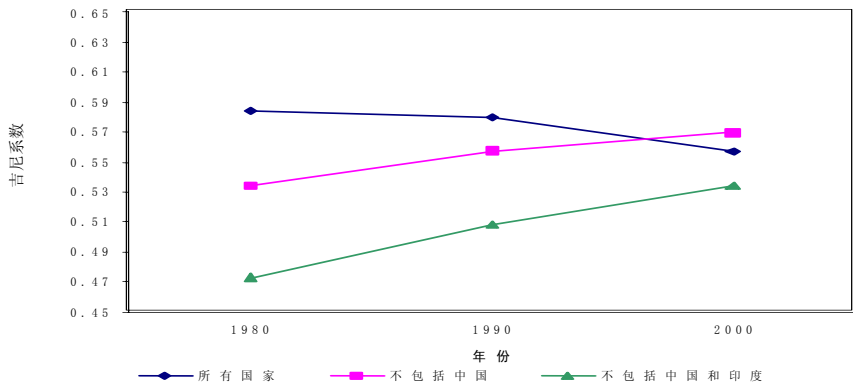
经济增长；这两个国家在过去 20 年的世界经济扩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两个国家以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当快，北美和西欧则仅出现了有限的经济增长。东欧经济在 1980 年代放缓，并且在 1990 年代初发生衰退，此后在 1990 年代中恢复了增长。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中东的许多国家在 1980 年代出现了经济负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呈负增长（Berry and Serieux, 2002）。

143. 尽管对这个问题还会进行很多辩论，但过去 20 年全球总的收入分配状况可能已略有好转（Berry and Serieux, 2004; Sala-i-Martin, 2002）。不过，若如果进行进一步分析，所呈现的状况并非如此正面。第一，全球收入分配有所改观，大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及印度略低的增长（见图三.1），改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个国家社会较贫穷阶层得益、而中等收入群体受损害的情况。第二，全世界人口最富的 10% 在全球收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 51.6% 增至 53.4%（Bourguignon and Morrison, 2002）。第三，分析中不计入中国和印度的话，由于国内收入差别更为悬殊的综合效应以及穷国人口增长更快这一不利的分配效应，现有的数据显示收入不平等加剧。第四，如图三.2 所示，最近几十年来，最富的国家与最穷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大（Berry and Serieux, 2002）。

图三.1

各国间收入不平等的演变

（基尼系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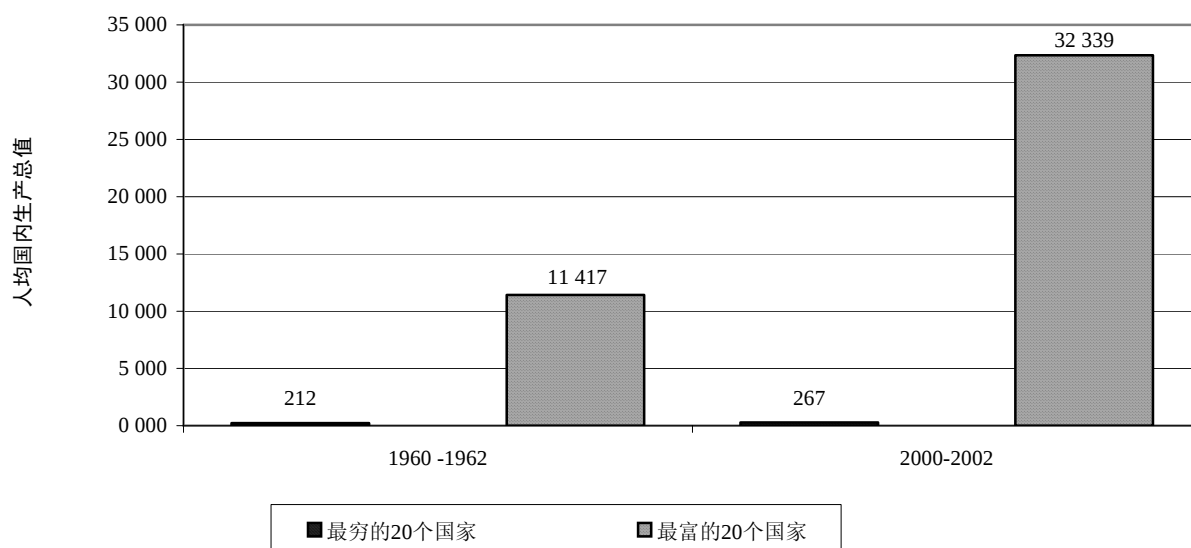


来源：A. Berry and J. Serieux, “Riding the elephants: the evolution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没有发表的论文）。

图三. 2

1960-1962 年和 2000-2002 年最穷和最富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以 1995 年不变美元计, 简单平均数)



来源: 全球化所涉社会问题世界委员会,《公平的全球化: 创造人人可享的机会》(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2004年2月)。

144. 表三. 1 显示世界不同区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它列出每个区域的人均收入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富有的经合组织国家人均收入的百分比, 以及这些比率在过去 20 年的变化。在仔细研究这些数字后发现, 除南亚和东亚以及太平洋之外, 所有发展中区域的人均收入与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相比均有所下降。

145.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较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的人均收入相比持续下降。在 1980 年到 2001 年间, 这一比率下降的情况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从 3.3% 降至 1.9%, 中东和北非从 9.7% 降至 6.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从 18% 降至 12.8%。比率的下降显示的并不是发展中区域人均收入绝对值有所减少, 而是富裕区域的人均收入比贫穷区域的人均收入增长更快, 使不平等差距拉大。

146. 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与相应的非经合组织国家组¹之间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在审查期间有所缩小; 在 1980 年至 2001 年间, 后者的人均收入作为前者的百分比从 45.3% 上升至 59.2%。与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相比, 亚洲仅略有改观, 南亚的这一比例从 1.2% 上升至 1.6%, 东亚和太平洋则从 1.5% 上升至 3.3%。

表三.1

各区域的人均收入在经合组织各国人均收入平均值中所占比率^a

(百分比)

区域	1980 年	1981-1985 年	1986-1990 年	1991-1995 年	1996-2000 年	2001 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	3.3	3.1	2.5	2.1	2.0	1.9
南亚	1.2	1.3	1.3	1.4	1.5	1.6
中东和北非	9.7	9.0	7.3	7.1	6.8	6.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8.0	16.0	14.2	13.5	13.3	12.8
东亚及太平洋	1.5	1.7	1.9	2.5	3.1	3.3
高收入国家	97.7	97.6	97.6	97.9	97.9	97.8
高收入的非经合组织国家	45.3	45.3	48.2	56.1	60.2	59.2
高收入的经合组织国家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来源：Alemayehu Geda, “非洲的公开性、不平等与贫穷：全球相互依赖作用之探讨”，这是在社会发展国际论坛区域研究讲习班上提交的一篇论文，该讲习班于 2004 年 6 月 17 日和 18 日在纽约举行。

^a 以不变值美元计算。

2. 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147. 一些研究认为，在各国内部，几十年来收入分配或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很少，甚至没有变化 (Gustaffson and Johansson, 1999; Melchior, Telle and Wiig, 2000)。对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在 1950 年代、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里，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² 但是，自 1980 年代以来，这一下降趋势已经放缓或者走平，而许多国家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正重新加剧 (Cornia, 2004)。在使用不同套的数据的情况下得出了相似结论，表明过去 20 年里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加剧 (Atkinson, 2003; Harrison and Blustone, 1988)。

148. 对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的数字进行分析显示，在拥有其充分可靠数据的 73 个国家中，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间有 48 个国家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 (见表三.2)。这 48 个国家合在一起，占分析所包含国家全部人口的 59%。在 1980 年代初，73 个国家中有 29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³ 高于 0.35-0.40。这个数值是一个临界值，超过了就会明显感到增长和减贫受到影响；到 1990 年代中后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此之高的国家已增至 48 个。在审查的国家中有 16 个国家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相对没变，但数据显示，在最近几年里其中三个国家的状况有所恶化。在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间，分析所含的国家中仅有九个国家的收

入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这组国家包括巴哈马、法国、德国、洪都拉斯、牙买加、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和突尼斯（Cornia, Addison and Kiiski, 2004）。

表三.2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间接关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趋势分列的各国分类状况

（抽样的 73 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基尼系数趋势	抽样国家在以下各项中所占的份额百分数				
	此组的国家数目	抽样国家总人口	世界人口	抽样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 ^a	世界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 ^a
上升	48	59	47	78	71
不断上升/上升-稳定	19	4	3	5	5
U 字形	29	55	44	73	66
下降	9	5	4	9	8
不断下降	6	3	3	7	7
倒 U 字形	3	2	1	2	1
无趋势	16	36	29	13	12
未列入抽样	—	—	20	—	9
共计	73	100	100	100	100

来源：G. A. Cornia, T. Addison and S. Kiiski, “Income distribution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 in the post-Second World War period”, in *Inequality, Growth and Poverty in the Era of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G. Cornia,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Research, 2004)。

^a 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

149.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而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虽然各国间的数据无法充分可比，但对九个经合组织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演化情况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倾向于认为，可能除加拿大以外，在所分析的全部国家的收入分配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些国家和国家群组，例如芬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过去三十年里基尼系数增加了 10 多个点。研究的经验数据表明，这些数字受到技术变革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但分析确认，收入分配属于极为复杂的现象，任何单一的解释均不足以适用所有国家（Atkinson, 2003）。

150. 欧洲和前苏联的前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国内不平等均有所加剧。在中欧转型期国家中，整个 1990 年代收入仅略有集中，原因可能是保存了福利国家制度（Milanovic, 1998）。在前苏联和东南欧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平均上升了 10 到 20 个基尼点，贫困人口从 1989 年的 1 400 万人增至 1996 年的 1.47 亿人（Cornia

and Kiiski, 2001)。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国营福利制度的突然解体是这一急增的重要因素。

151. 若干南亚和东亚国家一度能公平地实现增长，但近年来收入不平等也大幅度加剧。1980 年代后期，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国家的吉尼系数开始上升；但是，在 1990 年代，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一些情况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似乎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密切相关 (Cornia, Addison and Kiiski, 2004)。

152. 从历史上来看，非洲和拉丁美洲是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地方，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这一情况更进一步恶化。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的一项分析显示，除极少数情况外，该区域各国的吉尼系数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之间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从 0.45 至 0.55 不等 (Sainz, 2004)。在 1970 年代，整个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略有下降，但在 1980 年代，一系列的外来冲击和债务危机影响到收入分配，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均有所上升 (Altimir, 1996)。原先收入分配较为平等的国家受这些事态发展的危害最为严重。在 1990 年代，收入分配趋势进一步恶化，其反映是大多数国家的吉尼系数均有所升高。⁴

153. 将拉丁美洲国内不平等模式与其他区域的模式区别开来的一个特点，就是最富有的 10% 的家庭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 1990 年代，这些富裕家庭在总收入中占 30% 以上，在一些情况中这一比率达 35%，甚至 45%。相反，拉丁美洲最贫穷的 40% 的家庭仅占总收入的 9% 至 15%。到 1990 年代末，八个国家人口中最富有的 10% 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相对比率有所增加，五个国家有所减少，一个国家没有变化。

154. 收入差距最大的是巴西。巴西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 40% 人口收入的 32 倍。该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要属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这些国家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相对人均收入水平比最贫穷的 40% 人口收入高出 8.8 倍至 12.6 倍。虽然没有关于该区域其他国家的可比数字，但其他数据显示，古巴尽管 1990 年代上半期经济严重恶化，但可能仍然维持了与其他国家相比不太显著的递减收入分配 (Sainz, 2004)。

155.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有限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1970 年代以来一直持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在土地高度集中、或极其依赖单一商品出口的国家，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但在像莫桑比克和乌干达这样小型农业很普遍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保持不变 (Bigsten, 2000)。

156.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和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根据对若干亚洲国家数据的分析，1990 年代，中国、印度和泰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就中国而言，1985 年以来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半归因于该国各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异。已观察到泰国出现了类似趋势，而且近来观察到印度也有类似趋势 (Cornia and Kiiski, 2001)。相反，拉丁美洲的数据表明，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在缩小。

3. 贫穷

157. 收入分配的负面趋势意味着世界许多地区金钱上的贫穷已逐渐恶化。随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变得更加明显，贫穷和减贫战略在关于发展的论述中占有日益显著的地位。自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以来，各国政府已经加紧努力来处理贫困问题，订立国家减贫目标，拟定和执行消除贫穷的计划和战略。消灭贫穷的方案不仅注重金钱问题，而且注重尤其是让弱势群体更容易获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社会服务；促进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并采取措施处理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

158. 在全球层面，过去 20 年在减贫方面业已取得了相当大进展，这主要归功于采取了重点更突出的减贫方案和政策。表三.3 显示，从 1981 年到 2001 年，全世界生活在极端贫穷或绝对贫穷的人口（日生活费不到 1 美元）比例明显下降，从 40% 降至 21%。在区域层面，这一期间仅有东亚和太平洋、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下降幅度较大。

159. 总体的减贫统计数据掩盖了国家和区域的较大差异，以及不均衡的进展步伐。中国和印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使全球呈现积极形势。由于这两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38%，其各自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全球的绝对贫穷人口锐减；在从 1990 年到 2000 年之间，这一数字从 12 亿人下降到 11 亿人（国际劳工组织，2004）。仅中国一国，1981 年到 2001 年日生活费不到 2 美元的人口比例从 88% 下降至 47%，而日生活费不到 1 美元的人口从 6.34 亿减少到 2.12 亿。在印度，日生活费不到 2 美元的人口比例从 90% 下降至 80%，极端贫穷的人口略有减少，从 3.82 亿人减少到 3.59 亿人。

160. 虽然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 2001 年全世界仍有 11 亿人每天靠不到 1 美元苦苦维生。在一些区域，贫穷更为普遍，更持续存在。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十年稍多的时间里（1990 年-2001 年），穷人的人口就增加了近 9 000 万人。即使在像南亚和东亚这样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的区域，减贫的步伐充其量也是不均衡的。

161. 在欧洲和中亚，日生活费不到 1 美元的人口总数从 1981 年到 2001 年增加了 1 400 多万人。1990 年代这些区域的贫穷发生率猛升，但到 2001 年，上升趋势减缓下来。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不断恶化的贫困大大加剧了欧洲和中亚自 1993 年以来出现的日益贫穷的趋势。到 1990 年代末，5 000 万人生活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贫困家庭中，独联体有 4 300 万人生活在贫困家庭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1）。在 1990 年代，贫穷和收入不平等在中亚各共和国持续加剧。在塔吉克斯坦，在该国人口增长 14% 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64%，贫困状况急剧恶化。在阿塞拜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经济稳定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但是，经济上的这些成就并没有在人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该国有 49%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吉尔吉斯斯坦 2002 年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

表三.3

世界各主要区域，以及中国和印度的贫穷人口比率

区域/国家	贫穷人口比率（日生活费不到 1 美元的人口所占百分比）							
	1981 年	1984 年	1987 年	1990 年	1993 年	1996 年	1999 年	2001 年
世界	40	33	28	28	26	23	22	21
东亚及太平洋	58	39	28	30	25	17	16	15
欧洲和中亚	1	1	0	1	4	4	6	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0	12	11	11	11	11	11	10
中东和北非	5	4	3	2	2	2	3	2
南亚	52	47	45	41	40	37	32	31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46	47	45	44	46	46	47
中国	64	41	29	33	28	17	18	17
印度	54	50	46	42	42	42	35	35

区域/国家	贫穷人口比率（日生活费不到 2 美元的人口所占百分比）							
	1981 年	1984 年	1987 年	1990 年	1993 年	1996 年	1999 年	2001 年
世界	67	64	60	61	60	56	54	53
东亚及太平洋	85	77	68	70	65	53	50	47
欧洲和中亚	5	4	3	5	17	21	24	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7	30	28	28	30	24	25	25
中东和北非	29	25	24	21	20	22	24	23
南亚	89	87	87	86	85	82	78	77
撒哈拉以南非洲	73	76	76	75	75	75	76	77
中国	88	79	67	73	68	53	50	47
印度	90	88	87	86	86	85	81	80

区域/国家	日生活费不到 2 美元的人数（单位：百万）							
	1981 年	1984 年	1987 年	1990 年	1993 年	1996 年	1999 年	2001 年
世界	2 450	2 480	2 478	2 654	2 764	2 674	2 739	2 735
东亚及太平洋	1 170	1 109	1 028	1 116	1 079	922	900	864
欧洲和中亚	20	18	15	23	81	98	113	9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99	119	115	125	136	117	127	128
中东和北非	52	50	53	51	52	61	70	70
南亚	821	859	911	958	1 005	1 029	1 039	1 064
撒哈拉以南非洲	288	326	355	382	410	447	489	516
中国	876	814	731	825	803	650	627	594
印度	630	662	697	731	770	807	805	826

来源：世界银行贫穷监测（<http://www.worldbank.org/research/povmonitor>。2005 年 2 月 7 日查到）。

162.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口比例总的来说略有下降,在1990年至2001年期间,从11.3%下降到9.5%,但这一期间许多国家的贫困程度有所上升。智利是最主要的例外,该国1990年代的贫困程度大幅度降低。阿根廷的贫困率和失业率上升到空前的水平,但该国自2003年以来经济一直稳定增长。不过,并没有因为这一经济发展而产生更为均衡的财富分配或减轻社会不平等。例如,1994年该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的近20倍;到2004年,这一比例达29:1(南北发展监测,2005)。

163. 虽然全世界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口比例在1981年到2001年期间锐减(从40%降至21%),但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却没有那么大(从67%降至53%)。在东亚和太平洋,2001年仅有15%的人口日生活费不到1美元,但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人口比例却接近50%。尽管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进步,而且对全球趋势有着重大影响,但2001年该国仍有47%的人口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见表三.3)。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人口比例下降较为缓慢,反映的情况是有相当多的人从最低的贫困类别上升到这一略有好转的收入类别。在贫穷类别之间的转移以及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各种发展合在一起,造成从1990年代末以来贫穷人数(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人口)在全球增多的现象(Chen and Ravallion, 2000)。

164. 也许比贫困程度加剧更重要的是,若干国家出现了新的贫穷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有所强化。值得注意的事态发展包括,人们更倾向于在陷入贫困和脱贫方面发生反复,城市贫困程度加剧,农村的脱贫情况没有进展,城市穷人中的非正规工人的比例以及失业的穷人的数量均有所增加。

165. 个人在陷入贫困和脱贫之间反复的趋势自1980年代以来有所增强,表明脱贫的道路往往并不是笔直的。这一现象可能导致一些最不幸的社会排斥,因为在某一时期没有被划为穷人的人可能为社会援助方案所忽视。在非洲许多国家,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能被视为一直是贫穷的;不过,另有多达60%的人在陷入贫穷和脱贫之间反复(非洲经济委员会,2003)。在拉丁美洲,就业和收入的起伏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在陷入贫困和脱贫之间发生反复。在俄罗斯联邦,1992年被视为非常穷的家庭尽一半在一年之后没有被划为此类家庭,表明穷人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的确,1992/93年,即使在总体贫困程度不断加剧时,一些家庭还达到贫困线以上(世界银行,1995)。

166. 贫困的日益城市化以及在改善农村根深蒂固的贫困方面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都对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贫困在传统上一直主要被视作一种农村现象,农村地区的贫困程度仍然更高;但越来越多的城市地区同样也出现了严重贫困。拉丁美洲城市地区的贫困更为普遍。例如,1999年,该区域2.11亿穷人中仅有7700万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余的1.34亿人则居住在城市地区。不过,

农村地区的贫困仍集中得多，穷人在农村人口中占 64%，但在城市人口中则仅占 37%。农村地区的贫困还更为极端（Sainz, 2004）。

167. 在非洲，存在着形式最严重的贫困，非洲农村人口约有 59% 生活在赤贫中，而城市人口中则只有 43%。不利于该区域减贫工作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不熟练劳动力所占比例较大；以及致使劳动力总体水准严重降低的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一流行病。这些状况最终的影响是，在 1990 年至 1999 年间，虽然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增长了 29%，但人均收入却没有变化。

168. 在许多国家，缺乏充足的持续收入增长一直是减贫的一个主要障碍。在拥有其有关数据的 155 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中，1990 年代仅有 30 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达到 3% 以上，71 个国家的增长率低于 3%；总共有 54 个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20 个国家）在此期间的人均收入有所降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169. 人口趋势导致许多家庭、社区和国家更深地陷入贫困之中。较高的生育率加重了贫困，因为家庭会把本应用来储蓄的资源用于消费。这还增加了政府在教育和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培训方面投资的难度，因为必须划拨越来越多的资源来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居高不下的生育率拉升了受抚养人年龄比，表明年幼者（0-14 岁）和年长者（65 岁或以上）与正值黄金工作年龄组的人相比比例偏高。较高的受抚养比率对有限的劳动力的收入造成了更大压力，使即便已就业的一些人也会长期贫穷。国内和国际移民同样与贫穷有着极强的关联；移民始发社区变得更穷，因为它们失去了经济上最活跃的成员，而移民者在接纳的社区可能没有很好地融入，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因此很容易成为赤贫人口。

4. 失业

170. 在国内的以及国家之间的所有不平等中，全世界找工作的人无法就业的越来越多，可能造成最为深远的影响。寻找工作的大多是拥有个人责任和家庭责任的成年人。无法获得适当就业的人，就不会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个人以及家庭的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需求，或者无法攒钱，使家庭成员在经济变化无常时少受影响。失业者是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因此更可能遭受各种形式的贫穷之害。

171. 就业战略都是任何成功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而且推动自由、平等、安全和尊严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适当的工作条件（联合国，2004c）。《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指出，“生产性工作和就业不仅是人类特性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发展的中心因素”（联合国，1995 年，第 42 段）。充分就业被确定为一项核心目标已有十年时间；但是，取得的成绩远远落后于人们的期望。首脑会议参加者希望在确保人人享有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方面迈出大步；但是，过去十年的全球失业水平却已经上升。

172. 据估计，在 1993 年至 2003 年间，失业人数已从 1.4 亿人增至空前的 1.86 亿人，占全部劳动人口的 6.2%（国际劳工组织，2005c）。到这一期间末，有工作的穷人人数已逐渐增加到 5.5 亿人。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失业率从 1993 年的约 8% 下降到 2003 年的 6.8%（见表三.4），而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在这一期间的失业率则停止不动或有所上升。全世界失业率最低和最高的区域在审查的十年间一直相对保持不变，它们分别是东亚（约 3%）以及中东和北非（12.2%）。

表三.4

世界和主要区域的失业率、劳动力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区域/国家组别	失业率			劳动力年 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年 增长率
	1993 年	2002 年	2003 年	1993 - 2003 年	1993 - 2003 年
世界	5.6	6.3	6.2	1.8	3.5
工业化经济体	8.0	6.8	6.8	0.8	2.5
转型经济体	6.3	9.4	9.2	-0.1	0.2
东亚	2.4	3.1	3.3	1.3	8.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9	9.0	8.0	2.3	2.6
中东和北非	12.1	11.9	12.2	3.3	3.5
南亚	4.8	4.8	4.8	2.3	5.5
东南亚	3.9	7.1	6.3	2.4	4.4
撒哈拉以南非洲	11.0	10.8	10.9	2.8	2.9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就业、生产力和贫穷方面的全球趋势，2005 年”（<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trat/download/wr04clen.pdf>；2005 年 2 月 17 日查到）。

173. 在 1993 年至 2003 年间，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部分地区失业率上升了 62% 之多。东亚的失业率总体水平虽然有所上升，但却远远低于其他区域的失业率。东南亚的失业率审查期间增幅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年增 2.4% 的这一较高的增长率以及该区域包括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从 1997/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的速度较为缓慢。数据显示，2002 至 2003 年间，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失业率略有下降，但应当指出，变化相对较小，而且发生在单一的一年里，可能仅反映临时的或周期性的下降。

174.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993 年至 2003 年间劳动力年增 2.8%，失业率则仅略为下降，使整体失业率基本未变。在转型期经济体中，这一期间的失业率上升了 46%。

175. 在拥有其可靠数据的国家中，一半国家报告自 1995 年以来失业率有所降低，另一半国家则报告有所上升（国际劳工组织，2005a）。每一区域的趋势都不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尽管巴西的失业率停滞不动，墨西哥的失业率则有所

下降，自 1990 年代以来的整体失业率却一直在上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5a）。在过去十年，几乎所有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失业率也都有所上升。

176. 在 1980 年之前，中国的就业率一直以约 2.6% 的速度稳步增长，但这一比率在 1990 年代降至 1.1%。印度的就业增长在 1990 年代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反映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增长均有所放缓。在 1993 年至 2000 年间，农村就业率的增长降至 0.67%，这是该国独立以来历史上最低的就业率。但是，印度的失业率仅略有上升，而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失业率则明显增长。

177. 尚未掌握关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可比趋势数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非常高的失业率；1999 年，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南非和坦桑尼亚全都出现了 20% 或更高的失业率。

178. 必须铭记的是，仅失业率一项并不能明确表明劳动力平等或不平等程度。在冰山的这一角下隐藏着若干与就业有关的其他因素，它们包括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和增长、工作质量以及工资水平，可能使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也可能有所改善（见第二章）。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大多并不是失业的。他们打工，但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使他们达到贫困线之上。此外，如上文所述，许多人受到剥削，而且在工作场所缺乏基本权利和保护。

179. 劳工组织认识到这些问题至关重要，提出了“体面工作”议程，此项议程已经成为联合国整体发展议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体面工作议程的总体目标，是促进为妇女和男子争取获得在自由、平等、安全和人的尊严条件下的体面和生产性工作机会。这项议程包含下列四项战略目标：(a) 有机会受雇用从事生产性和有适当报酬的工作；(b) 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工人及其家庭的社会保障；(c) 言论、组织和参与影响到工人生活的活动的自由；以及(d) 男女平等机会（国际劳工组织，2005b）。据认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对融入社会关系重大。劳工组织正在努力保护全体工人的权利，并已确认有意义的就业对消灭贫穷、帮助人们实现个人潜力关系重大（国际劳工组织，2004）。体面工作议程处理了因全球化产生的若干挑战，包括丧失就业机会、惠益的分配不公、以及扰乱如此多的人的生活。要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所有各级的行动者参与。

B. 不平等现象的非经济层面

180. 如前文所指出，以往在讨论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时，几乎完全将其归因于国与国间和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而忽视根本的社会因素。这种现象所涉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得到广泛的承认，否则就无法评估或处理不平等现象。有关保健、教育、（粮食、供水、卫生设施和住房等）基本需求的满足等优先项目的非经济指标、和参政机会同个人、家庭和国家经济地位密切相关。那些教育程度最低、卫生情况最差的国家往往处于最低经济发展阶

段。本节摘要说明保健、饥饿与营养不良、和教育等方面的非经济不平等现象某些层面的模式和趋势。报告内设法表明这些方面的差距同有关全球性不平等现象的讨论中往往最常提起的某些经济不平等现象之间存在何种联系。

1. 保健

181. 近年来在保健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种进展使得许多人的健康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没有能够均沾，国与国间和各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更加恶化。人口中的特权阶层由于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地理位置较佳或是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往往较能利用医疗卫生方面的进展所带来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为它们较缺乏有助于发觉和治疗晚期病症的先进诊断技术、较少利用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等治疗法、并且较缺乏防治疟疾等地方病的药品。贫穷可能影响健康水平，健康情况不佳又可能反过来使贫穷状况继续下去，因此较贫穷的人民和国家往往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从而深化其相对于非贫穷人民和国家的贫困状态。

182. 同保健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包括获得保健服务方面的差距，可能已经成为人们最常提起的非经济不平等指标。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根源、影响和可能的解决办法的讨论是国际舞台上发展问题辩论的一个重点，保健问题也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各国国内，缩短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之间保健和死亡率方面的差距成为政府优先注意的一个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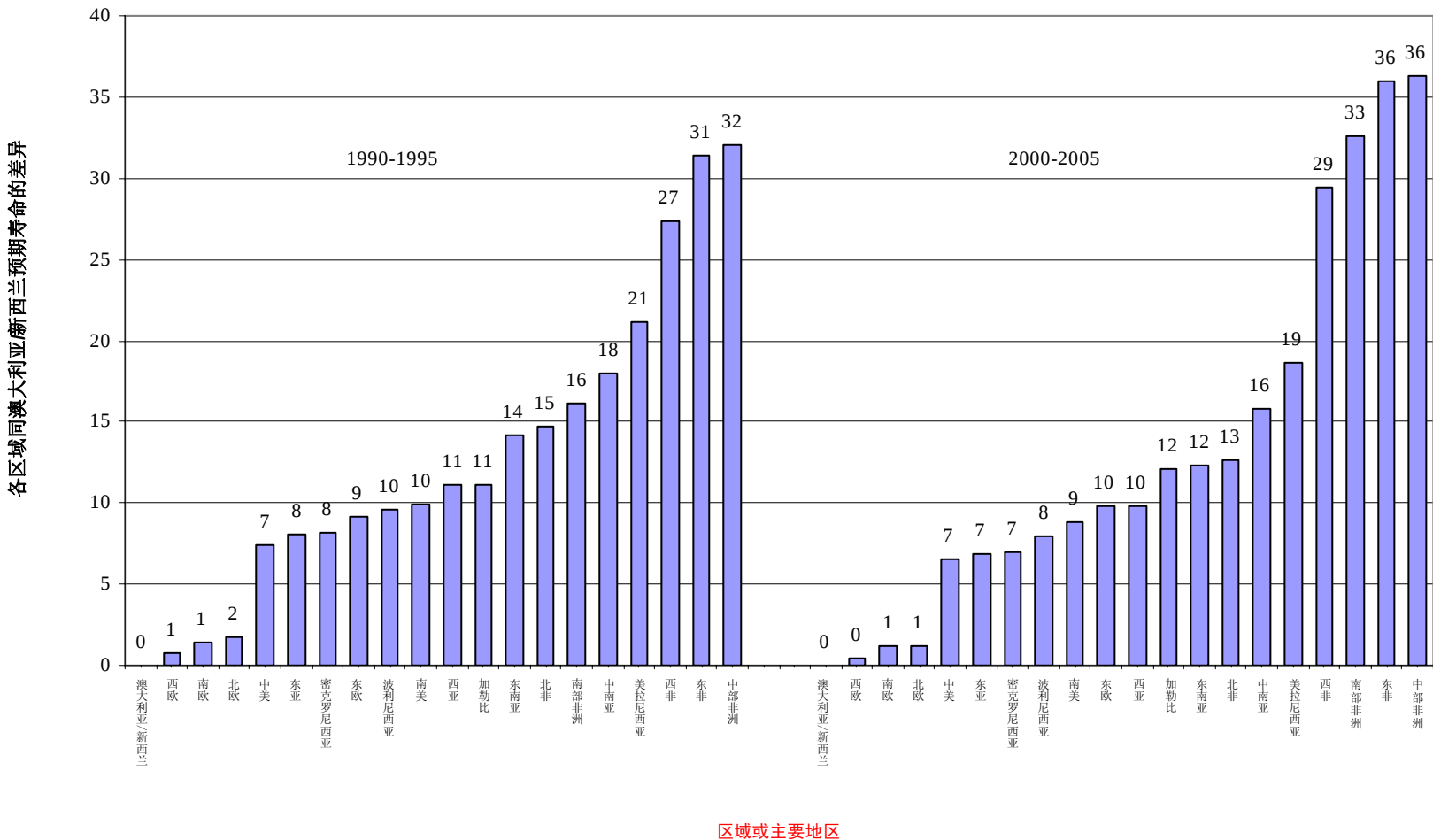
183. 过去五十多年来，全球一级增进健康和延长预期寿命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婴儿和儿童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儿童死亡率降低。较多的妇女能够获得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从而防止许多不想要的怀孕并减少不安全人工流产造成的产妇死亡率。全球保健统计资料表明在上述各方面及其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也掩盖了国与国之间和各区域之间、以及各国国内和各区域内所存在的广泛差异。这种统计资料也模糊了一个事实，也就是重大的科技进展给较贫穷的个人和国家带来的保健方面的利益寥寥无几。不论如何衡量医疗卫生状况，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平等的现象。

(a) 预期寿命

184. 过去五十年世界各国人民的预期寿命从大约 47 岁延长到 65 岁。但是统计资料表明，预期寿命最短和最长的区域之间的差距达到 36 岁之多（见图三.3）。从 1990-1995 年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人享有最长的预期寿命（77-79 岁）；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应数字略低或低得多。

图三. 3

世界各主要区域预期寿命的差距：1990 和 2005 年各区域出生时预期寿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的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XIII.8）内所列数据。

185. 预期寿命不平等情况是根据预期寿命比最高地区要少 25 岁以上的地区的数目来评估的,从这个角度看来,1990 年以来的情况明显恶化。1990-1995 年和 1995-2000 年期间,中部、东部和西部非洲地区是预期寿命比澳大利亚/新西兰要少 25 岁以上的仅有的三个地区。到 2000-2005 年,由于艾滋病的流行等因素,南部非洲也列入这一类别。值得指出的是,到 2000-2005 年,寿命较高地区内和寿命较低地区内的差距有所减少,这表明两类别之间两极化的程度有所增加。四个情况最差地区的预期寿命差距有所减少,但是这些地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更加恶化。

186. 国家一级预期寿命的差距也表明情况最佳国家和最差之间的两极化程度有所增加。1990-1995 和 2000-2005 年期间日本人享有最高的预期寿命。图三.4 表明这两段期间所有国家根据预期寿命低于日本的幅度的标准分布的情况。2000-2005 年预期寿命低于日本的幅度在 10 岁之内的国家的数目比 1995-2000 年要多得多,这表明不平等程度有所减少。但是预期寿命比日本要短 30 至 50 岁的国家(情况最差国家)的数目大幅度增加。中间类别国家(预期寿命比日本短 20 至 30 岁的国家)的数目几乎减少了一半,主要是因为海地和 12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呈现倒退现象。

187. 这种模式符合“俱乐部趋同”的概念,也就是贫穷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往往较低而较富有的国家则趋向较高的水平(Mayer-Foulkes, 2001),也符合最近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即保健方面的进展带来的利益分布不均的程度有所增加(Cornia and Menchini, 2005)。

188. 预期寿命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男女寿命的差距。世界各地女性的预期寿命几乎一律都比男性要长。造成这种差异的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一些因素,除其他外,男性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车祸和烟酒过量等因素,健康较易受到危害,死亡率也可能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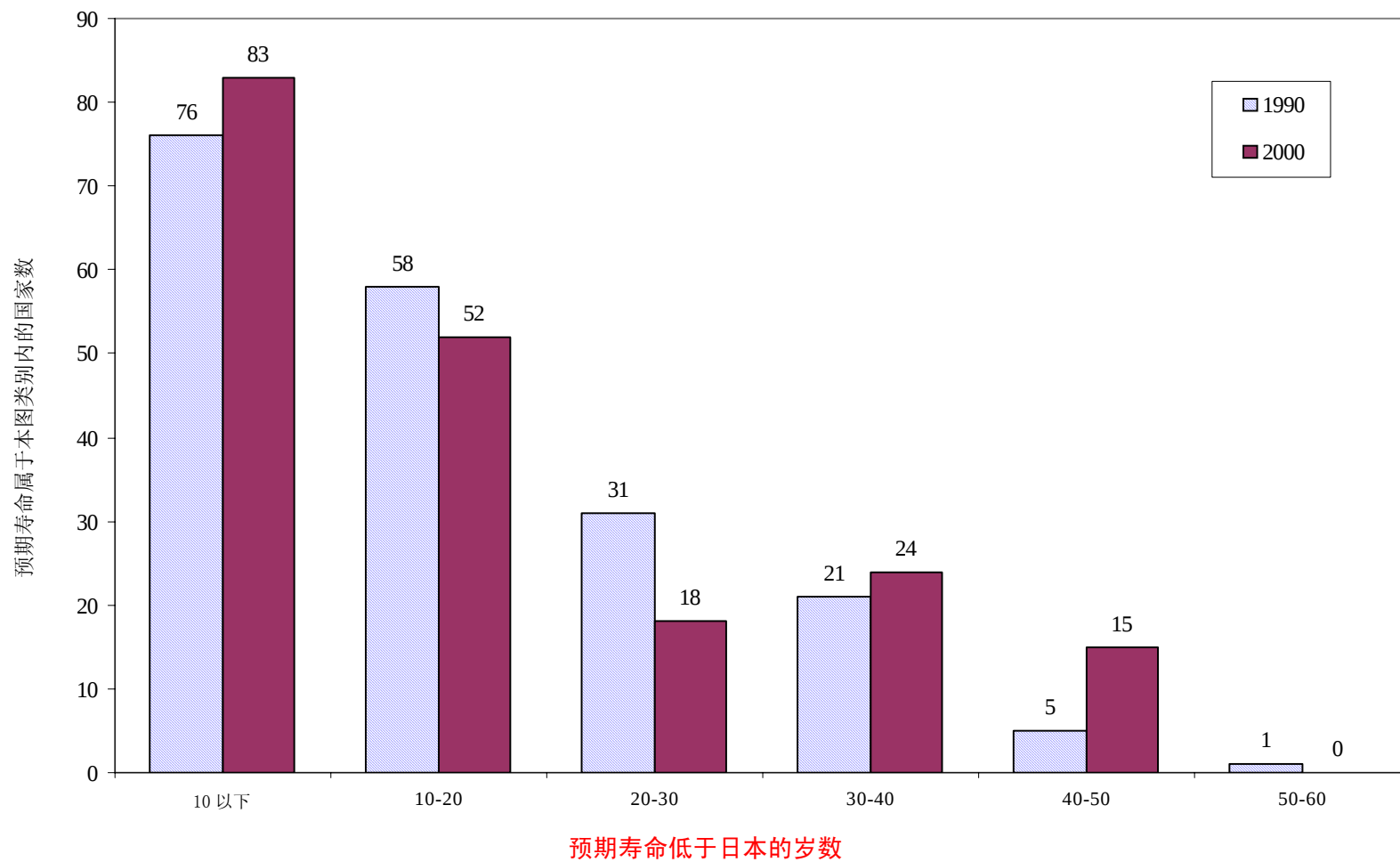
(b) 妇幼保健

189. 1990 至 2001 年期间儿童死亡率下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下降速度较慢。普遍的幼年致命疾病免疫接种大有助于减少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数十年期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等联合国实体协助下,许多国家实施了极其成功的预防接种政策和方案。从 1974 年以来,一岁以下儿童接受白喉、小儿麻痹症、破伤风、麻疹、肺结核和百日咳等疾病免疫接种的比率从 5%提高到将近 75%。

190. 在全球一级明显地呈现这种积极的趋势,但是这种情况掩盖了世界某些地区儿童健康和死亡率情况停滞、甚至恶化的现象。例如从 1990 年的初期以来,新生儿死亡率在撒南非洲有所上升,多数其他地区则见下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b)。这种死亡率上升的情况可能是艾滋病毒抗体呈阳性的母亲的子女死亡率偏高等因素造成的,但是贫困和没有能够使贫民获得保健服务的医疗卫生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因素。

图三. 4.

1990 和 2000 年所有国家根据预期寿命低于日本的幅度的标准分布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XII.8) 内所列数据。

191. 尽管过去五十年更为注意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并作出了干预，国与国之间在这方面持续呈现很大的差异。某些国家的数据表明，2000 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哥伦比亚的每 1 000 名活产 25 名到马里的每 1 000 名活产 229 名不等（见表三.5）。几乎所有撒南非洲国家及柬埔寨和海地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极高（每 1 000 名活产 100 名以上死亡）。表三.6 列有 2002 年全世界比率最高的 20 个国家和比率最低的 20 个国家，和各该国家 1995、2000 和 2002 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这些数据表明，情况最佳的国家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接近零，多数情况最差的国家则每五岁儿童中有一名以上在五岁前死亡。死亡率最高的 20 个国家中，有 19 个是撒南非洲国家，1999 至 2001 年期间该区域死亡率下降的幅度最小（从每 1 000 名活产 186 名死亡减至 174 名死亡，减少的比率仅为 2%）。

192. 多数国家国内五岁以下死亡率的差异也很大。最近人口与健康调查所列数据表明，农村地区的死亡率通常比城市地区要高（ORC Macro, 2005）。有关数据表明，下列国家农村地区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城市地区要高一倍半以上：亚美尼亚（2000）、巴西（1996）、布基纳法索（1998/99）、哥伦比亚（2000）、科特迪瓦（1998/99）、埃及（1995）、加纳（1998）、尼加拉瓜（2001）和秘鲁（2002）。

193. 在所有保健指标中，产妇死亡率反映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一些最大的差异。全球 99% 的死亡产妇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妇，贫穷国家育龄（15-49 岁）妇女多至 30% 的死亡可能是与怀孕有关的因素造成的，发达国家的这种比率则低于 1%。2000 年发展中区域每 100 000 名活产有 400 名产妇死亡，比发达区域的比率高 19 倍。发展中国家产妇生命期死亡风险为 61 人中 1 名，比发达国家 2 800 名中 1 名的风险比率要高 45 倍。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产妇死亡率的差异也很大。区域一级的差别极大：2000 年撒南非洲生命期风险比率为 16 名中 1 名，比西欧 4 000 名中 1 名的风险比率要高 249 倍。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妇女与怀孕和分娩有关的发病率和病症。甚至就安然分娩的妇女来说，没有得到适当产期护理的妇女往往长期受到膀胱阴道瘘、感染、或是分娩期间大量失血引起的长期贫血症等并发症的影响。

194. 国与国间和各国国内与保健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往往是教育、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卫生和营养等基本保健决定因素造成的。例如，儿童死亡率差异是获得专门医疗服务的机会、营养、预防接种和教育等大致准确的决定因素造成的。

表三. 5
某些国家五岁以下死亡率和国家间差距指数

区域/国家	年份	五岁以下死亡率(5q0) (每 1 000 活产)	差距指数 ^a
撒南非洲	2000	88.6	—
加蓬	1999	102.1	13.5
津巴布韦	1999	140.1	51.5
尼日利亚	2000/01	146.6	58.0
坦桑尼亚	2000/01	151.5	62.9
乌干达	2001	160.0	71.4
贝宁	2000	166.2	77.6
埃塞俄比亚	2001/02	168.2	79.6
赞比亚	1999	176.9	88.3
几内亚	2000	188.6	100.0
马拉维	1999	196.2	107.6
卢旺达	1998/99	219.1	130.5
布基那法索	2001	229.1	140.5
北非/西亚/欧洲			
亚美尼亚	2000	39.0	—
埃及	2000	54.3	15.3
中亚			
哈萨克斯坦	1999	71.4	—
土库曼斯坦	2000	94.3	22.9
南亚和东南亚			
尼泊尔	2001	91.2	—
孟加拉国	1999/2000	94.1	2.9
印度	1998/99	94.9	3.7
柬埔寨	2000	124.4	33.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哥伦比亚	2000	24.9	—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9	30.4	5.5
秘鲁	2000	46.7	21.8
危地马拉	1998/99	58.7	33.8
海地	2000	118.6	93.7

资料来源取自：ORC Macro, MEASURE DHS STAT compiler 的五岁以下死亡率方面的数据
(<http://www.measuredhs.com>; 2005 年 2 月 15 日查到)。

^a 差距指数是按某些国家的 5q0 数值减去该区域 5q0 最低国家的数值计算。

表三.6

1995、2000 和 2002 年五岁以下死亡率最高和最低国家的死亡率

死亡率最高国家 ^a	五岁以下死亡率 (每 1 000 名活产)			死亡率最低国家 ^a	五岁以下死亡率 (每 1 000 名活产)		
	1995	2000	2002		1995	2000	2002
中非共和国	180	180	180	瑞典	4	4	3
马拉维	216	188	182	丹麦	7	5	4
赞比亚	182	182	182	冰岛	5	4	4
毛里塔尼亚	183	183	183	挪威	6	4	4
布隆迪	190	190	190	新加坡	5	4	4
科特迪瓦	175	188	191	奥地利	7	5	5
乍得	200	200	200	捷克共和国	8	5	5
尼日利亚	238	205	201	芬兰	4	5	5
卢旺达	209	203	203	德国	7	5	5
刚果民主共和国	205	205	205	希腊	9	6	5
莫桑比克	221	208	205	日本	6	5	5
布基那法索	207	207	207	大韩民国	6	5	5
几内亚比绍	235	215	211	卢森堡	6	5	5
马里	233	224	222	马耳他	11	6	5
索马里	225	225	225	摩纳哥	5	5	5
利比里亚	235	235	235	荷兰	6	6	5
阿富汗	257	257	257	斯洛文尼亚	7	5	5
安哥拉	260	260	260	澳大利亚	6	6	6
尼日尔	295	270	264	比利时	9	6	6
塞拉利昂	293	286	284	文莱达鲁萨兰国	9	7	6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Millennium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millenniumindicators.un.org/unsd/>)。

^a 按 2002 年五岁以下死亡率排列。

195. 众所周知，所有儿童幼年致命疾病全面免疫接种大幅度减少了儿童死亡率，但是国与国间和各国国内免疫接种情况差别仍然很大。表三.7 表明，在各国国内，总得说来城市地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的子女免疫接种率较高。在国与国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别相当大。例如，城市免疫接种覆盖率在柬埔寨、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海地、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等国低于 50%，但是在坦桑尼亚和土库曼斯坦高于 80%，在埃及则为 93%。同样，农村覆盖率在埃塞俄比亚、加蓬和尼日利亚仍然低于 20%，在埃及和土库曼斯坦则为 90% 左右。免疫接种率也随着产妇教育程度而呈现明显的差别；教育程度较低或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同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妇女相比，较不可能使其子女接受免疫接种。鉴于麻疹及其他幼年疾病免疫接种、饮水保护、基本卫生措施以及在较大的程度上依靠口服体液补充疗法和母乳育婴等费用较低廉的预防和补救措施每年可以防止数百万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从政策观点看来，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持续呈现很大的差距的事实令人感到不安。关于免疫接种，令人意外的是，虽然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地区的免疫接种方案已经行之多年，各国国内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

196. 妇幼健康和死亡率方面的差距也同医疗卫生制度根本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获得产前护理、专门分娩护理和紧急产科护理的机会方面的差别密切相关。表三.8 表明国与国间和各国国内妇女分娩时获得专业卫生工作人员照料的机会方面的差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城市和农村地区将近 100% 的分娩都由一名医生或其他专业卫生工作人员照料，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相反，海地、尼泊尔和尼日利亚城市地区 60% 的分娩由一名专业卫生工作人员照料，农村地区的百分比则更低。在一些国家，农村地区的分娩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马里为 19%，在卢旺达为 22%）没有任何人照料，从而可能造成较高的妇幼死亡率。

(c) 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他疾病

197. 艾滋病毒/艾滋病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进一步蔓延。但是欧洲和北美多数地区在防止这种流行病和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种情况正是贫穷与保健方面不平等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写照。各区域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日渐增加，尤其是东亚、东欧和中亚感染艾滋病者的人数急剧增加；撒南非洲 2 500 多万成人和儿童受到感染，成为受这种流行病影响最严重的区域（见表三.9）（UNAIDS, 200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保健和死亡率方面的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因为许多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属于近代史上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今后 50 年的死亡率还可能继续偏高，这种流行病对于发达世界的预期寿命则不会产生可察觉的影响。

表三.7

按国家和某些背景特点分列的 12-23 个月儿童的免疫率

国家	年份	居住地区类型		(城市减农村) 差数	教育程度			(中等以上教育减未受教育) 差数
		城市	农村		未受教育	小学教育	中等以上教育	
亚美尼亚	2000	73.2	69.1	4.1	—	—	71.6	—
孟加拉国	1999/2000	69.6	58.6	11.0	53.8	60.1	72.5	18.7
贝宁	2001	64.4	56.1	8.3	55.7	63.1	75.1	19.4
布基那法索	1998/99	59.5	25.9	33.6	25.7	59.6	63.3	37.6
柬埔寨	2000	46.3	39.0	7.3	29.1	41.4	58.8	29.7
哥伦比亚	2000	54.8	46.0	8.8	26.7	46.9	56.6	29.9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9	30.5	39.6	-9.1	—	29.9	40.3	—
埃及	2000	92.8	91.8	1.0	91.4	92.9	92.6	1.2
埃塞俄比亚	2000	42.0	11.0	31.0	10.2	24.8	45.0	34.8
加蓬	2000	17.8	5.7	12.1	19.3	10.2	17.3	-2.0
危地马拉	1998/99	55.2	62.1	-6.9	52.4	62.1	64.4	12.0
几内亚	1999	47.3	26.7	20.6	29.7	39.1	53.9	24.2
海地	2000	33.6	33.5	0.1	23.2	37.7	43.6	20.4
印度	1998/99	54.8	34.9	19.9	24.7	46.0	61.4	36.7
哈萨克斯坦	1999	74.9	71.7	3.2	—	—	73.1	—
马拉维	2000	78.6	68.7	9.9	64.0	70.8	87.5	23.5
马里	2001	50.3	21.5	28.8	25.1	38.8	62.7	37.6
毛里塔尼亚	2000/01	38.0	27.4	10.6	27.4	39.6	30.5	3.1
尼泊尔	2001	74.9	65.0	9.9	57.0	83.2	90.0	33.0
尼日利亚	1999	31.7	11.3	20.4	6.3	18.1	36.1	29.8
秘鲁	2000	60.4	51.1	9.3	43.8	51.7	61.1	17.3
卢旺达	2000	77.0	75.8	1.2	72.2	76.8	82.1	9.9
坦桑尼亚	1999	80.5	65.5	15.0	49.5	75.1	72.2	22.7
土库曼斯坦	2000	80.1	88.5	-8.4	74.1	100.0	84.9	10.8
乌干达	2001/02	42.1	36.0	6.1	28.3	37.2	51.1	22.8
赞比亚	1999	76.9	67.2	9.7	58.0	70.6	76.3	18.3
津巴布韦	1999	65.0	63.6	1.4	62.9	60.9	67.2	4.3

资料来源：ORC Macro, MEASURE DHS STAT compiler (<http://www.measuredhs.com>; 2005 年 2 月 15 日查到)。

表三.8

调查前三年某些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国内新生儿获得专门医疗服务的
机会方面的差别

国家	调查年份	出生时得到照料			
		医生或专业卫生工作人员		无助产人员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危地马拉	1998/99	67.2	26.1	—	2.0
几内亚	1999	77.1	21.8	2.5	9.0
海地	2000	54.2	12.0	2.8	4.5
印度	1998/99	73.3	33.5	0.1	0.6
哈萨克斯坦	1999	99.1	99.5	—	—
马拉维	2000	81.1	50.5	1.3	2.6
马里	2001	81.7	27.4	5.4	19.1
毛里塔尼亚	2000/01	85.9	29.1	1.6	10.9
尼泊尔	2001	53.7	11.5	4.0	8.4
尼日利亚	1999	57.9	35.3	9.6	12.1
秘鲁	2000	86.5	27.4	0.4	1.7
卢旺达	2000	64.8	18.2	5.5	22.4
坦桑尼亚	1999	82.7	33.5	1.0	8.7
土库曼斯坦	2000	98.4	96.7	0.2	0.1
乌干达	2000/01	81.3	33.4	4.4	15.5
赞比亚	2001/02	78.1	27.1	2.8	8.2
津巴布韦	1999	90.0	64.3	1.0	4.4

资料来源：ORC Macro, MEASURE DHS STAT compiler(<http://www.measuredhs.com>; 2005年2月17日查到)。

表三.9

2004 年全世界和各大区域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成人和儿童

区域	感染艾滋病毒的 成人和儿童	新感染艾滋病毒的 成人和儿童	艾滋病毒在成人中的 流行程度（百分率）	因艾滋病而死亡的 成人和儿童
全世界	39 400 000	4 900 000	1.1	3 100 000
撒南非洲	25 400 000	3 100 000	7.4	2 300 000
中东和北非	540 000	92 000	0.3	28 000
东亚	1 100 000	290 000	0.1	51 000
南亚和东南亚	7 100 000	890 000	0.6	490 000
拉丁美洲	1 700 000	240 000	0.6	95 000
加勒比	440 000	53 000	2.3	36 000
东欧和中亚	1 400 000	210 000	0.8	60 000
西欧和中欧	610 000	21 000	0.3	6 500
北美	1 000 000	44 000	0.6	16 000

资料来源：UNAIDS, AIDS Epidemic Update December 2004 (<http://www.unaids.org/wad2004/report.html>; 2005 年 4 月 13 日查到)。

198. 艾滋病毒/艾滋病产生不平等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涉及病人是否能够获得和负担得起这种流行病的治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费用较高，使得较贫穷的个人和政府无法利用既可减少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又可延长已经受感染者的寿命的治疗法。全球药品市场和国家科技基础设施方面的不平等情况造成这种困境；较贫穷的国家负担不起国外现有的费用高昂的药物疗法，并由于长期存在缺乏制药能力的问题而无法在当地生产价格较低的等效非专利药物。⁵

199.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不断扩大，已超出保健部门和范围，受到最广泛影响的仍是最贫穷的国家。这种流行病同贫穷、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等方面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情况相联系。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最猖獗的国家，这种流行病迅速削弱在减少国与国间和国内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上两性不平等情况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东亚、北美、西欧和中欧，妇女在受艾滋病毒感染的 15-49 岁的人口仅占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在撒南非洲妇女则占这种人口的将近 60%；在后一区域，妇女在受艾滋病毒感染的 15-24 岁人口中占 75% 左右（见表三.10）（UNAIDS, 2004）。

表三. 10
2004 年全世界和各大区域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

区域	感染艾滋病毒的 15-49 岁妇女人数	妇女在感染艾滋病毒的 15-49 岁成人中所占比率
全世界	17 600 000	47
撒南非洲	13 300 000	57
中东和北非	250 000	48
东亚	250 000	22
南亚和东南亚	2 100 000	30
拉丁美洲	610 000	36
加勒比	210 000	49
东欧和中亚	490 000	34
西欧和中欧	160 000	25
北美	260 000	25

资料来源：UNAIDS, AIDS Epidemic Update December 2004 (<http://www.unaids.org/wad2004/report.html>; 2005 年 4 月 13 日查到)。

200. 各地区受艾滋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女性除了感染这种流行病的风险极高以外，还可能必须承担照顾受感染或影响的家庭成员的责任。女孩往往需要承担照顾患病的父母和弟妹的责任、承受辍学的后果、及早加入非技术劳动队伍、可能受到剥削和虐待、从而陷入贫穷和受到社会排斥。艾滋病的蔓延有可能使过去 20 年在缩小两性差距，特别是在受教育的机会上的差距方面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

201. 各国国内与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在人权方面极为明显。受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和影响的人所蒙受的耻辱导致某些最恶劣形势的歧视和在社区内的孤立。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特别容易受到歧视。此外，世界某些地区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待遇往往使得妇女在受感染男性亲戚死后同时失去财产或资源，生活越来越贫困。

202. 一些其他疾病也是造成国与国间和各国国内医疗卫生和死亡率指标差异的因素。在那些疟疾是地方病的地区，因疟疾而死亡的人数特别多。据卫生组织估计，每年至少有 100 万人死于疟疾，疟疾也是造成另 200 万死亡的原因之一。撒南非洲因疟疾而死亡的人数约占全球总数的 90%，其中绝大多数是幼儿，因此该区域为这种疾病付出了极大的人力资源和经济方面的代价。

203. 据估计将近 20 亿人感染结核病菌，但是身体健康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发病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2005)。每年大约增加 800 万新结核病例，将近 200 万免疫系统受抑制的人死于这种疾病。结核病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但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较低层的社会经济群体和感染艾滋病者中也持续存在这种病例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0)。由于没有遵守疗程等因素而出现抗药类型的结核病，妨害了控制这种疾病的努力。抗药类型的结核病世界各地都存在，但是在非洲、中亚和东欧尤为普遍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0)。

204. 疟疾和肺结核除了是带来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外，还可能对于罹患其他疾病以及这种疾病的病情进展或后果产生恶化的影响。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指出，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也会感染结核病，因为抑制了的免疫系统会使他们较易受到机会性感染。因结核病而死亡者多为 15 至 54 岁的人，从而使社区失去生产力最高的成年人。

2. 饥饿与营养不良

205. 二十世纪农业生产力提高以及粮食生产和保存技术发展的结果使得全世界产生了大量的粮食。从 1970 年代初期以来，全球粮食产量增加了两倍，主要谷类价格则下降了 76% 左右。全世界的粮食足可供所有居民之需而有余，大量生产的价格较低的粮食供应品足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的需求。粮食如果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分配，就可供每人每天平均消耗 2 760 卡路里 (World Ecology Report, 2005)。尽管存在上述事实 and 可能性，世界各地仍然存在令人震惊的营养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206. 过去几十年粮食紧急情况显著增加，这种紧急情况可能导致饥荒或危机，在危机中粮食摄取不足引起的饥饿再加上高发病率使得死亡率急剧上升。粮食紧急情况发生的次数从 1980 年代的每年平均 15 次增加到 2000 年以来的每年 30 次以上。多数危机都发生在非洲，非洲每年发生粮食紧急情况的平均次数在 20 年内几乎增加了两倍。截至 2004 年 7 月为止，35 个国家曾经面临需要紧急援助的粮食危机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4)。

207. 世界许多地区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持续营养不良，蛋白质和微营养素摄取不足并且经常受到感染或患病。这种长期的状况很少得到媒体报道，但是死于这种状况的间接影响的人数可能比死于饥荒的人数要多。全世界大约 85 200 万人口受到营养不良的影响，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的 81 500 万人、转型期经济体国家的 2 800 万人、和工业化世界的 900 万人。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中计有 20% 营养不足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4)。

208. 营养不良是影响儿童死亡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发展中世界每年计有 1 040 万儿童死亡，其中大约半数死亡的原因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的儿童即使幸存，

都往往会长期为疾病或残疾所困，幼年时期会影响认识能力和就学情况，成年后又会降低生产能力并减少终身收入。发展中国家所有儿童将近三分之一的身高和体重比同年龄的标准要低得多，表明他们长期营养不足，据卫生组织估计，2000年 370 多万儿童的死因同体重严重不足直接有关。就经济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饥饿仍处于现有水平的每一年，都会由于早亡和残疾对生产能力和收入造成的必然影响而损失 5 000 亿美元左右或以上（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4）。这种代价主要由最承担不起的人，也就是社会上的贫苦人民来承担。

209. 没有任何明确的迹象显示这种趋势很快就会逆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指出，发展中世界营养不足的人数在 1990-1992 年至 2000-2002 年期间减少了 2 700 万，但是在 1995-1997 年至 2000-2002 年期间每年以将近 400 万的比率增加，在很大的程度上抵消了过去几年取得的进展，使得整个十年（1990-1992 年至 2000-2002 年）净减少 900 万人（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4）。

210. 粮食危机和持续营养不良现象所呈现的不平等模式还有一些其他层面。在这些情况下，粮食在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得不到公平分配，妇女、儿童（特别是女童）、和老年人分配到的数量比成年男子要少。对饥荒的各种研究有助于说明可能导致粮食危机的大部分是人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上述情况不论是人为还是自然灾害或是两者的各种混合因素造成的，都表明很大一部分人口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这种情况对人民的影响取决于社会的组织方式（Dreze and Sen, 1989）。有关埃塞俄比亚 Wollo 旱灾引起的饥荒的研究表明，农民从事生计农业，总得说来得以勉强生活，直到日益增加的税额及其他负担使其中许多人陷于赤贫，没有什么资源或储备可供他们应付旱灾（Dessalegn, 1987）。

211. 在粮食供应光谱的另一端，营养过剩（卡路里摄取过量）也成为一个问题。全世界有 10 亿多成年人超重，其中至少 3 亿患有肥胖症（Chopra, Galbraith and Darnton-Hill, 2002）。过去几十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和美国人民肥胖问题严重的程度急剧增加（Flegal and others, 1998）。营养过剩问题将在第四章内进一步讨论。

3. 教育

212. 各国在教育领域仍然存在极其不平等的现象。有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亚、东亚和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北非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朝向实现符合千年发展目标的小学入学率迈进，但是撒南非洲以及南亚和西亚教育方面的进展和成就仍然小得多。许多国家的入学率有所提高，但是有些地区的毕业率仍然很低，特别是就女童来说更是如此。非洲，尤其是撒南非洲，比其他发展中区域要落后，需要加倍努力克服该区域在人力资本方面不利的初步条件。

213. 表三. 11 表明, 某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国内家庭成员的教育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⁶ 该表合并两个单独类别, 列有家庭内未受过教育的男子比例最高和最低的国家、以及各国之间和国内城乡和所有家庭按性别区分的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总得说来, 未受过教育的男性家庭成员所占比率从亚美尼亚的低于 3% 到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 70% 以上不等。更加显著的是各国家庭内的教育程度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城乡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农村居民没有受过教育的可能性大得多。几乎每个国家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女性家庭成员与男性相比都较可能没有受过教育。

表三. 11

按性别分列的所有家庭及城市和农村家庭未受教育人口所占百分率

国家	年份	共计			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		
		男	女	女减男差数	男	女	女减男差数	男	女	女减男差数
未受教育男女比率最低国家										
亚美尼亚	2000	2.8	2.9	0.1	2.1	1.9	-0.2	3.7	4.4	0.7
哈萨克斯坦	1999	4.2	4.9	0.7	3.0	4.0	1.0	5.2	5.7	0.5
吉尔吉斯斯坦	1997	4.2	6.0	1.8	4.1	5.2	1.1	4.3	6.4	2.1
菲律宾	1998	4.2	4.3	0.1	2.3	2.3	—	6.0	6.5	0.5
玻利维亚	1998	4.9	13.7	8.8	2.0	6.6	4.6	10.3	27.4	17.1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99	4.9	6.4	1.5	3.1	5.0	1.9	7.8	9.2	1.4
乌兹别克斯坦	1996	5.7	6.2	0.5	4.8	5.0	0.2	6.2	7.0	0.8
巴拉圭	1990	5.9	7.6	1.7	3.9	5.2	1.3	7.7	10.4	2.7
土库曼斯坦	2000	5.9	7.2	1.3	5.3	6.2	0.9	6.3	8.0	1.7
秘鲁	2000	6.1	12.9	6.8	3.5	7.0	3.5	10.8	24.2	13.4
未受教育男性比率最高国家										
科特迪瓦	1998/99	43.6	57.2	13.6	29.7	42.4	12.7	51.7	66.4	14.7
摩洛哥	1992	43.9	64.9	21.0	25.5	43.4	17.9	60.0	83.1	23.1
科摩罗	1996	44.3	59.1	14.8	31.9	45.9	14.0	49.4	64.2	14.8
厄立特里亚	1995	54.4	67.3	12.9	19.7	36.6	16.9	67.7	80.5	12.8
乍得	1996/97	56.1	77.7	21.6	39.6	57.9	18.3	62.1	83.4	21.3
几内亚	1999	59.8	76.4	16.6	33.8	51.7	17.9	71.9	87.1	15.2
埃塞俄比亚	2000	61.5	76.7	15.2	24.3	39.8	15.5	67.7	83.9	16.2
马里	2001	66.0	77.0	11.0	40.4	55.7	15.3	76.0	85.1	9.1
布基纳法索	1998/99	72.1	83.9	11.8	32.9	45.3	12.4	79.7	90.8	11.1
尼日尔	1998	72.7	83.6	10.9	41.9	54.6	12.7	81.0	90.9	9.9

资料来源: ORC Macro, MEASURE DHS STAT compiler (<http://www.measuredhs.com>, 2005 年 2 月 23 日查到)。

214. 家庭成员教育程度方面的现有差距反映了数十年来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表三. 12 显示世界各区域之间小学入学率的差异。全球一级小学净入学率为 84%，但是这一百分率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中亚、东亚和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北美和西欧的表现要好得多，所有这些国家 2001 年的入学率都达到 90% 以上；全球一级的百分率也没有表明撒南非洲的情况差得多的事实，该区域的净入学率仅为 62.8%。女性入学率总得说来比男性要低。

表三. 12

1998 和 2001 年全世界和各大区域小学入学方面的不平等情况

国家或领土	小学入学情况						小学净入学率（百分率）					
	2001 年		共计		女生		共计		男生		女生	
	学龄人口 (单位: 千)		(单位: 千)		(单位: 千)							
	1998	2001	1998	2001	1998	2001	1998	2001	1998	2001	1998	2001
全世界	648 593	656 538	651 913		47	47	84.2	84.0	87.3	86.5	80.9	81.5
转型期经济国家	14 259	15 930	14 767		49	49	84.6	90.1	85.0	90.3	84.1	89.8
发达国家	67 948	70 406	65 552		49	49	96.4	95.6	96.5	95.4	96.4	95.9
发展中国家	566 386	570 207	569 617		46	46	82.7	82.5	86.3	85.3	78.9	79.5
阿拉伯国家	39 396	34 725	36 252		46	46	78.1	81.1	82.3	85.1	73.7	76.9
中欧和东欧	24 079	25 484	23 677		48	48	86.7	88.8	88.1	89.9	85.3	87.7
中亚	6 627	6 949	6 667		49	49	87.5	94.1	88.0	95.0	87.0	93.2
东亚和太平洋	189 557	219 912	211 108		48	48	96.0	93.7	96.1	93.7	95.8	93.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8 064	78 585	69 660		49	48	94.2	95.7	94.8	95.6	93.5	95.9
北美和西欧	51 664	52 858	49 643		49	49	96.3	95.4	96.3	95.1	96.4	95.7
南亚和西亚	170 874	158 096	160 398		44	44	80.2	79.0	87.5	84.7	72.3	73.0
撒南非洲	108 332	80 406	91 972		45	46	57.6	62.8	61.4	66.4	53.8	59.2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5: The Quality Imperative (Paris, 2005)。

注：区域平均数为加权平均数。

215. 三个情况最差的区域在 1998 至 2001 年期间小学入学人数极大幅度地增加，其中两个区域有极多的学生入小学。仅仅在撒南非洲一个区域，在短短的期间内小学入学人数增加了 1 100 万。较高的入学率有助于缩短受教育的机会方面的差距，但是也给处理有关情况的能力最低的国家的教育制度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许多国家公学教育制度的质量受到影响，从而使那些拥有充分资源而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学校教育的人相对于社会上较贫穷阶层所具有较大的社会和经济优势。

216. 研究结果表明，不平等现象随着平均就学年数的增加而减少，尤其是妇女，从中等教育得到的报偿最大 (Cornia and Court, 2001)。鉴于上述事实，全球中高等教育情况与小学教育情况相比，更令人不安。表三. 13 以主要区域和全世界入学统计资料表明，中等教育不平等程度；有关大学入学率的数据较不完整，从而较难加以比较。该表显示，2001 年中学净入学率比小学要低得多。中亚、中欧和东欧、及北美和西欧中学入学率最高，都达到 80% 以上，撒南非洲的中学入学率低至 21%。2001 年的数据表明，世界各区域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及北美和西欧以外，女孩受中等教育的可能性较低。1998 至 2001 年期间，女孩的中学净入学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显著上升、非洲则略见增加。

217. 一般通常认为教育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手段，在受过教育的人中，确实达到了这一目的；但是教育也会造成分割和最恶劣形式的社会阶层。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时情况往往体现为就业、职业、收入、居住条件和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例如在区域内各国之间和各国国内存在巨大差别的拉丁美洲，各职业类别收入悬殊的现象可以直接归因于不同教育水平的市场报酬 (Instituto de Promoción de la Economía Social, 1999 年)。尽管国与国间存在差异，受过六年教育者的收入平均比没有受过教育者要高 50%，受过 12 年教育者的收入比没有受过教育者要高一倍以上。上述资料所根据的研究报告指出，拉丁美洲国家收入集中的现象有 25% 至 33% 是教育方面的差距造成的。荷兰提供的数据的分析结果又增加了一个代间观点，表明各收入类别存在某种程度的代间流动性，但是教育上的分割往往是世代相传的 (de Graaf and Kalmijn, 2001 年)。

218. 总之，教育方面持续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就业、薪资、保健、权力和融合等方面的不平等情况。为矫正就业失衡，从而减少其所造成和维持下去的不平等情况，必须实施针对弱势群体而又较广泛的着重普遍增进教育机会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和方案。需要特别注意教育方面的两性差距，以确保不偏向任何个性别。此外还需要处理教育质量问题的。

表三. 13

1998 和 2001 年全世界和各大区域中学入学方面的不平等情况

区域	学龄人口 (单位: 千)	中学入学情况(单位: 千)					中学的净入学率(百分率)					
		共计		女生			共计		男生		女生	
		1998	2001	1998	2001		1998	2001	1998	2001	1998	2001
全世界	752 008	424 925	477 586	46	47		51.3	54.9	..	58.1	..	51.5
转型期经济国家	34 524	..	31 272	..	49		..	85.0	..	84.8	..	85.2
发达国家	84 628	87 210	85 816	49	49		87.9	90.0	87.7	89.5	88.1	90.4
发展中国家	632 856	311 079	358 392	45	46		..	48.5	..	52.4	..	44.4
阿拉伯国家	38 975	21 997	24 823	46	46		50.8	55.3	53.5	57.7	48.1	52.9
中欧和东欧	43 829	37 881	38 288	49	48		..	82.7	..	83.4	..	82.0
中亚	11 946	5 754	10 406	49	49		81.6	83.6	82.3	84.8	80.9	82.4
东亚和太平洋	217 947	137 952	149 732	..	47		..	..	..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6 291	41 871	57 159	51	51		52.9	63.8	50.7	61.9	55.1	65.7
北美和西欧	61 486	63 630	63 508	49	50		89.4	89.2	89.5	88.8	89.3	89.6
南亚和西亚	221 771	95 750	107 017	41	42		..	..	..	..	..	..
撒南非洲	89 764	20 358	24 073	44	44		18.0	21.3	19.7	23.1	16.3	19.4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5: The Quality Imperative](#) (Paris, 2005)。

注: 区域平均数为加权平均数。

C. 结论

219. 可能影响国与国和各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因素方面最近的发展好坏参半。尤其是在减少保健和教育方面不平等现象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也在一些方面呈现严重的倒退。形成现有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往往根深蒂固,从造成不平等情况和使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到阻碍处理这种问题的社会文化因素等,不一而足。

220. 本章内所讨论的模式和趋势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关迹象显示,全球一级总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和印度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多数其他国家都没有从这种增长中受惠。各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更加恶化,甚至就工业化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口来说也是如此。有些区域的减贫工作相当成功,但是另一些区域的贫穷状况则呈现停滞或恶化。例如,1981 至 2000 年期间中国每天靠 1 美元以下的收入生活的人口急剧减少,从 63 400 万减至 21 200 万,但是 10 年(1990-2000 年)期间撒南非洲赤贫的人口增加了几乎

9 000 万。在拉丁美洲，1980 和 1990 年代的经济衰退和停滞对贫穷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其他区域的迹象看来情况可以说是好坏参半。

221. 许多国家继续面临妨害消除贫穷工作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障碍和难题。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述起抑止作用的因素包括社会排斥和歧视，两者又体现为缺乏机会和政治权力的情况。在一些国家，疾病和早亡使得家庭和社区失去最具生产能力的成员，使得贫穷状况更为恶化。许多国家减贫方面的进展受到治理失当和不利地理因素的限制，特别对内陆小国来说更是如此。持续的减贫努力还受到经济增长率偏低和增长利益分配不均、失业率偏高、外债额过高、贸易壁垒、收入差距过大、和依靠某些商品等经济因素的阻碍。

222.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对于持续的减贫工作至关重要。例如，自由化政策的前提是经济增长最终可以惠及贫民，但是人们也日益认识到，不论经济如何发展，较可能做到减贫的是那些实施促进平等政策和方案、包括采取行动增进获得资源和收入以及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的政府。

223. 非经济指标也同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现象持续存在和日益深化的情况相联系。世界各区域朝向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取得了进展；但是国与国间和各国国内在受小学和较高等教育的机会方面仍然显然地存在很大的差距，教育质量也高低不一。

224.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蔓延使得经济和非经济不平等现象更为恶化。受到感染和影响的个人和家庭日益脆弱；法律规定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承认和落实，许多人缺乏受基础教育和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撒南非洲的这种情况特别令人震惊；该区域所受到的这种流行病的影响最为严重，在多数经济和非经济指标上的表现都很差，区域内许多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225. 两性不平等现象往往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结构。在受教育和获得象样工作的机会、以及同样工作的报酬方面仍然存在两性差距。过去二十年多数国家的妇女加入劳动队伍的人数和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然而，这些方面两性差距的缩小掩盖了妇女工作条件恶化的事实（Razavi, 2005 年）。妇女从事低薪工作的人数仍然众多，这种情况限制了她们实际的收入和晋升的机会（可能收入）。妇女在全世界的贫民中占特别大的比率，因为她们获得土地和资金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较有限，也较可能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工作或低薪帮佣工作。妇女未能享有平等的经济和非经济机会往往是她们在许多国家的社会地位较低的根源，那些特别脆弱的妇女还可能受到虐待和性剥削，在关系到她们本身福利的问题上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

注

- ¹ 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的非经合组织国家和领土包括：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百慕大、文莱达鲁萨兰国、开曼群岛、海峡群岛、塞浦路斯、费罗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格陵兰、关岛、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恩岛、以色列、科威特、列支敦士登、澳门、马耳他、摩纳哥、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新喀里多尼亚、波多黎各、卡塔尔、圣马力诺、新加坡、斯洛文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维尔京群岛。
- ² 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设立和维持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收集和储存关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收入不平等的资料。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是在 1997 年-1999 年期间编纂的，它扩展了 Klaus Deininger 和 Lyn Squire 在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前主任 Giovanni Andrea Cornia 指导下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开发计划署项目“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与减贫：两者是否一致？”收集的数据。随着将更多的观察数据添加到数据库中，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决定对外开放数据库，以便推动就不平等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辩论（见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第 2.0 版，2004 年 12 月 3 日）。
- ³ 基尼系数是国家不平等的一个通用衡量单位，它评估的是某一特定情况下不同个人之间的差异。基尼系数的数值从 0（绝对平等）到 1（绝对不平等）。
- ⁴ 拉加经委会和世界银行进行的分析都认为区域趋势正在恶化。但分析在确定单独的一些国家的趋势方面却存在差异。世界银行表明，巴西的收入分配在 1990 年代已有改善，但这一趋势却没有得到拉加经委会证实。此外，拉加经委会观察到的乌拉圭基尼系数的改善也没有得到世界银行证实。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拉加经委会和世界银行对该整个区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J. A. Ocampo, “Latin America’s growth and equity frustrations during structural reform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第 18 卷, 第 2 期[2004 年春季], 第 82 页)。
- ⁵ 有些受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蔓延的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其中包括若干最不发达国家）在 2016 年以前无需遵守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多哈公共卫生宣言》中说，各国可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31 条，制造它们所需的药品（所限制的是非专利药的出口）。因此，问题不在于获得生产权而在于缺乏制药能力以及对那些必须遵守世贸组织协议规定的国家（例如印度，该国已颁布新的法律）出口非专利药的限制。
- ⁶ 该表列有为进行国家人口与健康调查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的家庭数据。

四. 不平等与社会融合

226. 不平等和缺乏机会会促使社会解体。许多民众仍然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意见的民众，他们的希望、愿望和关切常常遭到忽视和无视。倾向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顽固政治体系，加剧了这种不平等，阻碍社会融合的实现。

227. 确保机会平等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得到保障，这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增强贫穷人口能力的必要条件。即使贫穷和边缘群体被邀请发表意见，如果没有建立起确保实现这些群体目标的机制，他们的需要和利益仍不可能在政策上受到高度关注。民选机构应该成为确保弱势群体得到有效代表的首要手段。

228. 在最近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消费和生产模式日趋类同。全球化使许多民众的生活品质得以提高；然而，过度消费会给自然资源基础带来巨大的压力，并加剧分配不平等。目前消费和资源使用方面的不平等和被剥夺现象，很可能将在今后的几代继续存在。

229. 一个极不平等和缺乏机会的社会，可能成为暴力和犯罪的温床。广泛系统地杀戮生命，是促进社会融合的努力已经失败的终极标志。这种失败表现为犯罪猖獗、人际暴力频发和武装冲突等多种形式。采取极端暴力的倾向加剧，往往不能以一个简单的原因加以解释；但是显而易见，不平等、特别是横向不平等（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加大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另一个因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无法使青年充分融入社会，特别是在就业方面。今天，近一半的人口未满 25 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空前增加。多数劳动市场无法如数吸纳寻找工作的青年；统计数字显示，青年失业率是成人失业率的三至四倍。青年面对如此阴暗的前景，深感不公，他们往往行动反常，并可能诉诸暴力。

230. 社会融合理念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代表着一种理解，即今世后代有权享有社会公正和平等。今天作出的决定，影响着今世后代的社会融合模式及其产生的机会。代间公平理念认为，每一代人在照顾自身需要的同时，不应使下一代造成不利或损害；不应忽视后代的福祉，也不应使之为先辈早先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付出代价。每一代既是下一代的监护者，又应确保前辈成员年老不能工作时的福祉。每一代都有权享有环境、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

231. 世界各国加大了加强安全、制止暴力的力度，但在解决造成冲突的社会经济根源方面却少有作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往往为增加防务开支而挪用发展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因此，国家和国际两级的社会议程可能受到安全问题的进一步挤压，在公众对实际和感知威胁高度关注之时尤其如此。这种情况使本报告分析的各种挑战和困难更加复杂化，并使包括创造有利环境、加强组织机构在内的社会发展综合战略实施受阻。

A. 代间不平等现象

232. 每个社会的世代之间都具有某种道德义务。代间契约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这种代间社会契约以每一代人应照顾下一代人的假设为基础，并已成为不同社会的中心支柱。有人提出，这种公民之间的契约必须为每个人作出某些规定（Rawls, 1971）。目前，各个社会履行代间契约的方式有所不同。在发展中国家，代间支助多以一种广泛的亲属网络、有时也通过社区互动加以维系；而在发达国家，国家对契约进行不同程度的调解和/或支持。

233. 多数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共识，即国家应该在关键领域发挥主要作用。比如，在许多国家，主要由政府提供教育和保健。公共部门还可以提供社会援助，并为儿童、家庭、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保护。随着全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代间契约和关系的性质也在不断演变。在代间平等和国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和保健的“代价”问题上，人们进行了一定的辩论。

234. 随着社会及其人口组成的变化，应该重新强调世间责任，并使其适应新的现实。在发达国家，目前关于代间问题的辩论主要集中于年轻、工作的一代对于上代和下代的财政义务。有人表示，目前的体系如不调整，将无法满足今后几十年内进入退休年龄的许多民众的需要，并将给今后几代带来无法持续的负担。

235. 代间冲突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因为社会的年轻成员最终可能不愿或无力为老年成员提供支助。这场辩论往往以经济为中心，并围绕养老金的融资、超支、保健费用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展开。但是，在承认人口变化可能不仅需要调整养老金的结构和资金来源、还需要调整各项政策的同时，从代间观点来看，辩论的重点应该是每个国家社会契约的性质。

236. 人们对社会保护老年人的“承受能力”并无共识。有人提出，就欧洲联盟（欧盟）而言，对福利结构进行相对较小的调整，将使支出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而关于承受能力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凝聚力、社会理念和价值而非经济参数的辩论（Cichon, 1997）。还有人提出，日益强调促进自我负责，特别是老年人的自我负责，将会破坏代间团结，导致全面削弱社会凝聚力（Walker, 1993）。

237. 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为老年人提供数额较少的养老金，不仅有利于老年人，也有利于他们的家庭，因为社会中的老年成员在不断地为子孙后代投资，并增加了今世后代的社会资本（HelpAge International, 2004）。不承认和不克服某些政策和方案对代间支助体系的不利影响，可能对代间应对机制造成负面的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最近才开始认识到，众多的祖父母正在为死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父母遗留的孤儿提供照料，许多地区正在采取社会保护措施，以使祖辈能够继续提供照料，或提高他们提供更好照料的能力。尽管如此，许多老年人正在勉为其难，用稀少的资源照料自己家里的孤儿。

238. 围绕养老金和保健资金展开的传统辩论，往往忽视了这一事实，即代间公平问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研究人员正开始调查家庭/社区和宏观两级的代间转移，研究贫穷的传输以及人力、环境、财政、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资本的传输，并探讨社会和经济结构和规范对这种转移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方式（HelpAge International, 2004）。

239. 必须努力在长时间内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确保代间税务负担大体平等、各个年龄组分配资源公平和平等，并为全社会提供基本的商品和服务。政府债务应该保持在合理和可管理的水平上；后代不应为当代的消费习惯付出代价。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应该相辅相成，以确保后代的福祉。

240. 许多发展中国家负有巨额国债，其中大部分债务是在 1960 和 1970 年代积累的，当时的决定继续影响着当今的政策。在几个国家，债务偿还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远远大于 10%（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4 b），严重制约着当前的财政和社会政策，并最终减少了后代的机会。

241. 一些决策者一直在设法减少由国家供资或支助的、增强代间和社会凝聚力所亟需的方案开支，而与此同时人口趋势又显示，在多数社会人的寿命有所延长，并出现了三四代同堂的现象。削减对老人的社会和经济支助，同时又更多地依靠非正式的代间应对机制，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进一步削弱代间契约。

242. 在评估代间契约对每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时，不应仅仅采用狭隘的经济效率模式。代间契约以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准备履行社会承诺的形式给社会带来的价值，必须得到赞颂。政府应该调整政策，支持并维持包容性社会，而不应仅仅设法削减费用，唉叹老人造成的“负担”，忽视老人过去和现在对社会的贡献。

B. 消费、不平等与社会融合

243. 对消费模式进行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个人福祉，这是对完全从收入角度看待不平等的做法的补充。这种消费模式是排斥的一个重要量度，因为它们说明了谁能和谁不能获得资源、商品和服务。这种模式还突出说明了社会某些群体的相对贫穷，这是一个世界各国长期存在的问题。

244. 数据显示，各个地区的家庭消费增长率差异巨大。在过去 25 年中，工业化国家的家庭消费年均增长 2.3%，东亚新兴经济体增长 6.1%；而在非洲，家庭消费水平同期下降了 20%（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8）。

245. 最高收入国家最富裕的 20% 人口，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 86%，而全世界最贫穷的 20% 人口仅占 1.3%。以下数据展示了消费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最富裕的 20% 人口拥有 74% 的电话线，消费 45% 的肉和鱼、58% 的能源、87% 的纸张，而最贫穷的 20% 人口仅拥有 1.5% 的电话线，消费 5% 的肉和鱼、4% 的能源和不到 1% 的纸张（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8）。

246. 上述消费水平意味着，全球发展的大部分物质利益为工业化国家的富人所得。消费差距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缩小，但是由于自然资源有限，目前日均生活费不足二美元的约 28 亿人口将不可能赶上最富裕群体的消费水平。

247. 随着由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组成的新贵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在世界许多地区，随着个人和群体追求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愿望驱使社会各阶层追求更大的物质利益，显阔消费日益盛行。通过消费获得地位，对边缘群体和富裕群体同样重要，而随着各国日益开放受到全球的影响，显阔消费的压力日渐增大（Sanne, 1997）。但是，即使 2050 年预计达到 90 亿的全球人口中仅有一半赶上当今数亿富人的消费水平，也将对土地、水、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破坏性影响。

248. 为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体面生活水准所需作的努力与奢侈品消费之间的反差十分惊人。比如，工业化国家每年在香水和化妆品上支出 350 亿美元，相当于 2004 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一半（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3）。

249. 改变消费模式很可能十分困难，但却极为必要，因为过度消费可能对社会和环境造成削弱性影响。有人指出，“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中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是造成全球环境持续退化的主要原因”（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的继续发展，这种退化将会加快。增加消费和生产的后果对贫困人口最为严重，因为目前的模式常常对社区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并对依赖唾手可得的资源来维持生活的人们的健康和生计构成了威胁。

250.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多数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因此更容易受到环境退化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农业潜力很小，并容易遭受水灾、山崩、旱灾、土壤侵蚀和其他形式的退化。土地盐渍化已经成为土地退化的一大原因，全世界每分钟因此损失至少三公顷可耕地（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0）。

251. 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75% 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并依靠公地维持生计。在印度，部分邦的贫困人口喂养牲畜的饲料 66% 至 84% 依靠共有土地。低收入家庭使用共有牧场和林地等资源挣取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 14% 至 23%，而富裕人口的相应比例仅为 1% 至 3%。在津巴布韦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穷人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环境资源，研究并证实经济较无保障的家庭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更大（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2003）。据估计，有 3.5 亿多人直接依靠森林维持生计；但是，随着农业以及木材和纸张生产对土地需求的日益增加，砍伐森林的速度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尤为严重。森林被砍伐后，大部分土地迅速退化，不再适于长期耕作或放牧（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2003; Roper and Roberts, 1999）。

252. 环境的日益脆弱也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对这种影响的感受尤为深切。1990 年代，有 70 多万人在自然灾害中丧生。虽然这一数字低于过去几十年，但是自然灾害的强度和频率以及受灾人数却大幅度提高和增加。90% 以上的灾民居住在发展中国家。2002 年，肯尼亚 15 万多人因水灾而流离失所；中国遭受百年最大的干旱，受灾人口超过 80 万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2;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3)。

253. 2004 年 12 月东南亚部分地区发生的地震和海啸，显示了社会经济脆弱性不相同所产生的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关于海啸灾害及长期恢复和重建会议上指出，“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自然灾害中遭受损害最持久的总是贫穷人口” (Annan, 2005 a)。

254. 获得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对于人为灾害同样重要。由于许多地区土地退化不断加重，千百万民众无法为自己和家庭生产足够的粮食。这种情况加剧了社会紧张和脆弱，可能引发冲突和大规模移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稀少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导致了暴力冲突，占优势的群体试图压制和排挤生活在肥沃地区的土著民族和部落，强占他们的土地和资源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5 b)。饥荒可能引发内战，1970、1980 和 1990 年代非洲之角旱灾期间的情况就是一例。在长期的敌对行动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冲突使粮食生产进一步减少，使边缘群体更加难以得到资源 (Renner, 1999)。

255.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活品质方面的巨大差异将继续存在，尽管各种趋势和预测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将逐步赶上发达国家。可以作出现实的假设：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许多贫穷人口将会追求发达国家富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了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发达国家必须表明一种有效利用资源、污染较少的生活方式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 (Schölvink, 1996)。

256. 有人提出，消费者作为经济的需求方，他们的喜好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和产出 (United Nations, 1996)。但是，消费者是否具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并无定论。在现代消费社会，个人往往被锁定于一定的消费模式，不仅受到整个市场和商业结构的制约，还受到商业营销对消费习惯的巨大压力 (Sanne, 1997 年)。日益明显的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一定反映出选择自由 (Jackson and Michaelis, 2003)。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饮食变化，证明商业部门在形成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这种变化可能不会对不平等本身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间接的影响也具有社会和经济意义。比如，人们正在把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非必要的食品，这种食品大多营养价值较低。这种饮食变化转而造成非传染疾病逐步增加，给保健系统增加了负担。

257. 特别是肥胖这一健康威胁的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全世界身体超重的成年人已经超过 10 亿，其中 3 亿被认为患有肥胖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a）。在许多国家，由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和收入增加，营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正在逐步走向“饮食类同”，即世界各国的饮食日趋相似（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5 a）。食品贸易迅速增长；2001 年，食品贸易超过石油贸易而占世界贸易的 11%（Pinstrup-Andersen and Babinard, 2001）。

258. 卫生组织证实，由于人们从鱼和蔬菜等传统食品转向高脂肪、高糖、高盐、低纤维的“西方”食品，整个健康水平出现下降，心脏病、糖尿病等工业化国家的常见病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显著增加。据估计，到 2020 年这几类疾病将占全球疾病的三分之二（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259. 年轻一代尤其容易受到这种不健康饮食变化的影响。肥胖儿童更容易患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和糖尿病，这些疾病可能引发冠状动脉疾病（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2）。由于儿童肥胖病例增加，随着人口老化，慢性疾病将日益普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a）。卫生组织预测显示，在今后的 20 年中，发展中国家死于中风的人数将增加一倍。罹患肥胖引起的糖尿病人数也将增加一倍，2025 年将达到 3 亿人，发展中国家的糖尿病患者将占世界的四分之三（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2）。如果预测准确，这些发展将对保健和支助服务的需求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将给经济增加负担（Brody, 2002）。

C. 暴力与不平等

260. 促进社会融合、尊重人权的国家，较不可能发生武装冲突，而更可能实现发展和繁荣。发展、安全和人权具有内在的联系并相辅相成。联合国秘书长曾经指出，“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不尊重人权，我们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除非这些事业齐头并进，否则其中任何一项事业都不会成功。”（United Nations, 2005 c）。

261. 国家和国际安全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近年来日益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问题，不仅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也挪用了发展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目前存在着这一风险，即优先考虑国家安全这一引人注目的政治问题，将使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发展和人权议程进一步受到挤压，并将延迟旨在创造有利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的综合战略的执行。

262. 国际谈判相对公开是 1990 年代国际形势最积极的一面（由于冷战时期的战略安全利益，在 1980 年代中期之前谈判一直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变得紧密，合作得到加强，国际社会得以把社会性别、环境、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社

会发展等举世关注的问题列入了全球优先议程。由此还产生了一种集体责任精神，导致普遍批准 1997 年《禁雷条约》、《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并且，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巩固了各国政府这样一项共同承诺，即应当采取适当的步骤，打击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包括恐怖行为和武装冲突，给世界许多地区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安全感及宗教和民族不容忍情绪，很可能使保护人类尊严所需要的共同责任精神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应对这些威胁；但是，也必须强调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来确保人类的长期安全。

263. 虽然暴力与社会融合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无法立即明确，虽然有事例表明暴力被用来作为社会融合的一种手段，但是可以较有把握地说，暴力往往是社会解体的症状。不论这种暴力表现为个人攻击、武装冲突或自决意愿表示等形式，它只能说明社会未能成功地促进社会所有成员的全面融合。

264. 用暴力解决冤屈、强迫进行改变或维持公共秩序和现状的社会，往往是没有实现融合的社会。普遍促进人权、推动民主进程和宣传非歧视的社会，往往不大需要装备十足的安全和军事部队。尊重多样性、机会平等、团结、安全和全民参与的社会，不大可能依靠暴力来维持公共秩序。

1. 暴力犯罪

265. 贫穷和不平等与暴力之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不平等加剧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并可能使暴力犯罪率增加（Bourguignon, 1999; 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2002）。但是，笼统的概括不能说明巨大的差异和更加微妙的现实。富裕国家内部和富裕国家之间也发生暴力冲突，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在和平中生存。贫穷、不平等和被剥夺不一定导致暴力犯罪增加，也不一定会立即引发起义，而常常被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并对以后的事件产生影响。应以全面的方式实现发展，使安全与无暴力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公正和平等建立起内在的联系，并应在这种情景中分析暴力与不平等和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

266. 《联合国犯罪趋势调查》从 100 多个国家收集的数据显示，1980 年至 2000 年有报告的刑事案件持续增加，从每 10 万人 2 300 起增加至 3 000 多起（Shaw, van Dijk and Rhomberg, 2003）。有记录的总体犯罪率增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增幅最大，阿拉伯国家、东欧和独联体、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增加较慢。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据不足以显示任何明确的趋势。北美的犯罪率从 1990 年代初期以来持续下降（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4），而欧盟 1980 年代以来有纪录的犯罪明显增加，超过了北美。欧盟和北美有记录的犯罪率是世界平均数字的两倍，这表明在其他许多地区人们举报犯罪的意愿很低（Shaw, van Dijk and Rhomberg, 2003）。

267. 在确定犯罪水平时，杀人案件可以较好地代表范围更广的暴力犯罪类别，因为杀人案件的纪录常常多于其他犯罪，因此能够提供相对可靠的比较数字。一般而言，人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杀人案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杀人案件较多的国家（每 10 万人 10 起）不是中等收入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杀人案件较多，并相对稳定（每 10 万人 25 起）。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有较多的杀人案件发生（10 万人 17 至 20 起），但未呈现出明显的总趋势。欧盟的杀人案件相对较少（每 10 万人 3 起），加拿大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美国的杀人案件 1980 年代有所增加，但 1990 年代显著下降，杀人案件从 1991 年的每 10 万人接近 10 起下降至 2001 年的 5.6 起（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4）。东欧和独联体杀人案件的增长最为迅猛，合计水平从 1980 年代中期每 10 万人的 5 起增加到 1990 年代早期的 8 起，其后又略有下降。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趋势显示相对稳定，即保持在每 10 万人 3 至 4 起左右。阿拉伯国家杀人案件数量的波动大于其他地区，但一直维持在每 10 万人 4 起以下（Shaw, van Dijk and Rhomberg, 2003）。

268. 虽然有关犯罪和暴力的数据常常稀少而含混，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但是仍有足够的证据确认，从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比较来看，不平等与犯罪水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联系（Bourguignon, 1999; 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2000）。在经济动荡和衰退时期，犯罪水平与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更为明显（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2002）。

269. 经观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不同的时期，都发现不平等与犯罪，特别是与暴力犯罪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有人认为，这可以用相对贫穷理论加以解释，亦即不平等孳生社会紧张，因为欠富裕者与他人比较时感到匮乏。基本前提是，“相对贫穷是国内暴力冲突的必要先决条件，这种相对贫穷的定义是行为者所感知的，自我价值期待与环境表现价值能力之间的差异。价值期待是人们认为理所当然有权获得的商品和生活条件。……而价值能力……是确定人们感觉到有多少机会得到和保持其理应期待得到的价值的条件”（Gurr, 1968）。一些认为处境不利并受到不公待遇的人，可能会通过任何手段，包括对富人和穷人的犯罪等手段来寻求补偿。

270. 不平等不一定会加剧暴力，也绝不是造成暴力犯罪的唯一原因。但是，不平等确实增加了暴力犯罪和国家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当同时出现其他因素时尤其如此。比如，许多青年参与暴力犯罪和贩毒，这是因为他们在巨大的文化压力下追求致富，以保持一种为其带来理想地位的消费水平（Kramer, 2000）。

2. 武装冲突

271. 虽然不能说贫穷、不平等和剥夺人权是造成攻击、恐怖主义或内战的原因，也不能以此为这些行为辩解，但是显然它们大大增加了不稳定和暴力的风险。穷国比富国更可能发生内战，而发生内战的国家往往变成穷国并/或陷于贫穷之中。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50 美元的国家，预计（五年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为 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00 美元的国家，这种可能性要减少一半，而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 250 美元的国家，这种可能性要再减少一半（至 4%）（Humphreys, 2003）。

272. 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暴力事件更加频繁，因为这种社会往往存在这种现象：稀有的资源和权力被不公平地分配于可按领土、种族、族裔和宗教等因素划分的群体之间。不平等程度愈高的国家，暴力愈为常见。在贫穷和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国家，社会支助和安全网络大多较不发达，教育机会不平等，青年的机会也较少。

273. 虽然人们一致认为，富裕和增长通常与较低的冲突风险相联系，但是人们对某些类型的增长是会增加还是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并无共识。一些人可能提出，不平等是造成某种冲突的主要原因，但是并没有充分的数据来支持或质疑这种说法；一般而言，造成暴力冲突有多种可能的原因。在对不平等水平与有无冲突之间的潜在联系进行调查时，应该铭记在这里最重要的不平等不是人际之间的不平等，而是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横向不平等）。族裔群体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或感知不平等）严重或加剧的国家，往往更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和内战。

274. 一定的不平等水平可能给社会带来压力，但常常会被容忍，特别是当这种不平等长期稳定存在的时候。但是，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可能加剧紧张，如同时缺乏机构能力来解决日益扩大的差异，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加大。族裔、宗教或文化差异，其本身很少导致冲突。但是，这些因素经常构成爆发战争的基础，在诸如社会、政治或经济不平等等其他因素存在时尤其如此。族裔认同已被证明是反叛集团谋求提高合法性、招募新成员和争取支持的一个重要工具。

275. 一般而言，与贫穷、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系统地缺乏机会、无法普遍求助于可信的机构解决冤屈的社会相比，对社会和经济资源进行平等分配的社会，能够更好地管理紧张局势，并减少体制和社会瘫痪的风险（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变动常常导致社会和政治混乱，破坏社会凝聚力，削弱传统的权力结构和机构。经济和政治过渡，将不可避免地加剧紧张，当权力平衡或获得宝贵资源的机会在群体之间发生变化时尤其如此。

276. 受暴力影响的个人人数众多。2002 年，估计全世界有 160 万人死于故意伤害（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与妇女相比，男子更可能引起或死于这种伤害。在全世界，自杀占故意伤害死亡的大多数（873 000），而被武装冲突（559 000）和人际暴力（172 000）夺去的生命却要少得多（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所有地区都显示出这一模式，但非洲和拉丁美洲除外。在这两个地区，人际暴力和战争的死亡人数占故意伤害死亡的大多数。

277. 2004 年，因暴力或暴力威胁造成的难民或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为 1 700 多万，低于 2003 年的 2 180 万。在工业化国家寻求避难的人数，2004 年降到了 17 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05 b)。在 50 个工业化国家寻求避难的人数, 从 2003 年的 508 100 减少至 2004 年的 396 400, 下降了 22%。2001 年以来, 避难申请人数下降了 40%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05 a)。虽然这些数字一般会使人们感到乐观, 但是这些数字的减少可能显示出对寻求避难者的处理方法有所改变, 比如避难申请得到迅速处理和拒绝, 而非显示出寻求避难者原籍国的生活条件有较大的改善。随着安全措施和边防检查的日益严厉, 寻求避难者越来越难以抵达最终目的地并提出申请, 因此产生了寻求避难者人数减少的印象。

278. 尽管如此, 2004 年是难民情况较好的一年。1994 年逃离卢旺达的 320 万人, 多数已经返回家园, 成千上万的难民也在 2004 年间返回安哥拉、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但是, 正当国际社会追忆卢旺达种族灭绝 80 多万丧生者时, 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又有 7 万多人死于暴力, 至少有 180 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以免象邻居那样遭到强奸和杀戮。虽然国际社会在纪念过去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时总是呼吁“决不应该再次发生”, 但是与 10 年前相比, 2004 年国际社会在处理一国内部暴力时仍束手无策。

279. 2003 年, 在 18 个地方发生了 19 起重大武装冲突, 稍好于在 19 个地方发生 20 起重大冲突的 2002 年, 使重大冲突数目降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二个最低水平 (Dwan and Gustavsson, 2004)。其中, 其中只有两起冲突是国家之间的敌对行动。在 1990 年至 2003 年期间, 在 48 个地方发生了 59 起重大武装冲突, 其中只有四起涉及国家之间的战争。应该指出, 虽然许多冲突被划分为国内冲突, 但是都掺杂着国际因素, 因为交战派别得到了邻国的支持。在最近几年中, 这种性质的冲突大多发生在非洲。2004 年, 在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 25 个国家中, 非洲占 23 个, 其中 20 个不是目前正处于冲突之中, 就是最近曾发生过冲突。

280.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就实现国家和国际和平、防止生命和财产大规模损失而言, 主动积极地预防冲突比解决冲突更加有效, 费用更低。据估计, 如 1994 年在卢旺达境内采取预防行动可能需要花费 13 亿美元, 但在发生种族灭绝后对该国提供的援助总共耗资 45 亿美元 (United Nations, 2001)。预防既符合成本效益, 也有可能做到; 多项研究估计, 在 1990 年代后期, 如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全世界的暴力冲突将会增加 25%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5)。但是, 最有效的预防冲突战略, 是旨在减少贫穷和不平等、实现人人充分和体面就业并实现全面社会融合的战略。

3. 青年人口

281. 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过高, 特别是青年人 (年龄在 15 至 24 岁之间) 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过高是造成各类非正规经济活动增加的因素之一。国家无力将进

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纳入正规经济，这对整个国家具有深刻的影响，例如非正规经济迅速增长、国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等，不一而足。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有组织犯罪和暴力反叛集团往往能够从大量失业青年中招募大量人员。

282. 2000 年，100 多个国家出现了青年人口暴增的情况，也就是说，年龄在 15 至 24 岁之间的青年人至少占全国总人口的 40%。出现青年人口暴增的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大多集中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United Nations, 2003）。青年人口暴增，伴随着高失业率、严重的贫穷和不平等状况，增加了发生国内暴力冲突的可能性（Urdal, 2004）。即使在最佳条件下，如果某一年龄段人口明显高于以往水平，就会遭遇体制瓶颈。青年人的失业率达到总人口的二至三倍，工作机会匮乏可能造成青年人严重的失落，如果因教育水平提高致使人们的期望值上升，就更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青年人口暴增，又赶上经济滑坡，国家吸收新增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受到限制，情况就更为严重。

283. 这一说法适用于犯罪活动总体情况。在通常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低，但是，如果失业率较高，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在政治和经济职位的招聘之门紧闭和只有某些群体的特权成员才享有社会变革和社会公正带来的机会的情况下，极度不满现象会特别普遍。

284. 许多青年人在面对社会排斥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没有办法影响或改变自身的处境或整个社会。如若根本无望获得体面且有相当收入的就业，青年人可能会转向暴力活动。青年人若下此决心，会对自身产生可怕的后果，但对社会也会产生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2005 年 2 月，在安全理事会就西非安全问题举行公开辩论时，联合国秘书长指出，“青年人失业率高得惊人和与此相伴的绝望心理使已经摆脱危机的国家面临发生政治和社会动乱的现实风险，即使目前局势稳定的国家也莫不如此”（Annan, 2005b）。

285. 对他人施暴者多为 30 岁以下的男子。历史上的多数战争罪和暴行都是青年男子所为。今天，冲突区发生的暴力和残杀行为大多都是青年男子实施的。青年男子通常是军事部队和准军事部队的基本力量，单独施暴或参与团伙暴力的平民也多数是青年男子。青年人在冲突时期还特别脆弱。他们更有可能被强征入伍，成为战斗人员，也更有可能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和性暴力的目标。此外，他们还被剥夺教育和融入社会的机会。

286. 如上所述，在进行分析时还应该考虑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相对贫穷，这是相对于客观贫穷而言的。单是贫穷可能不会引发不满或冲突，但是当某些个人或群体感觉到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与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或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之间存在差距时，他们会产生强烈的愤懑心理，更有可能实施暴力行为。这种倾向在因具有强烈的族裔、宗教、语言或文化共同特征而容易划分的群体中更为明显。

287. 一代人的态度和行为对另一代人的心理和行为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某一代人的特点、价值观和世界观可能会影响下一代人的选择，也会影响这些选择的后果。机会“传承”已经得到述及，但是代际传承内容还可能包括信仰和原则、养育子女方式、忠贞观念，甚至抑郁、创伤和暴力。这一现象往往会产生社会代价。思想观念常会代代相传，例如，这可能会造成对某些族裔或宗教群体的歧视或对残疾人的歧视加深。对于继承了精神疾病或消极行为倾向的人来说，如要进行康复，会产生实际代价；如果对其漠视不管，又会产生社会代价。继承了上述特征的人付出的代价极为高昂。如果有人在记忆形成期受到消极或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他本人及其子孙将终身难以摆脱。

4. 强奸行为和儿童兵现象

288. 有史以来强奸行为一直伴随着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有时候，随着法律和秩序的瓦解，得势的武装战斗人员欺辱手无寸铁的女性平民，强奸行为随之发生。但是，有时候，性攻击是某个群体或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性攻击一直与宗教讨伐、革命、解放、帝国征战和种族灭绝如影随形。这一手段被用来惩罚敌人，奖赏胜利者。不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平时时期，妇女、难民、少数群体、青年和穷人等最脆弱的社会成员受到的性攻击伤害尤为严重。

289. 在如何保护处于冲突状态下的妇女和女孩免受强奸和性暴力问题上，至多只能说国际社会现在更加认识到必须提供这种保护。“问题的严重程度一如既往”（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05）。自从 1990 年代在巴尔干地区发生引人注目的士兵蓄意强奸行为以来，人们越发普遍地认识到，强奸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战争工具，特别是种族灭绝的工具。尽管如此此种行为仍然是，而且一直是最近发生的几乎每一起冲突的构成元素。

290. 虽然对待强奸行为，尤其是对待强奸行为受害者的社会和文化态度差异很大，但是强奸行为对受害者所处社会的影响明显是大同小异。受侵害者所遭受的生理和心理损害是灾难性的，永远无法真正地衡量。在冲突期间，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攻击行为的实施者对于他们的行为给受害者和整个敌方造成的伤害心知肚明。强奸经常被有意用作摧毁家庭和社区纽带的策略，因此是一种“种族清洗”或种族灭绝工具。强奸被蓄意用来向妇女传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常常让受害者及其家庭包括子女蒙受社会排斥和侮辱，让受害者及其社区在罪孽行为发生若干年之后仍然承受痛苦。由于强奸行为而出生的儿童常常受到社群的侮辱、歧视和排斥。这些情况反映了社会分化的代际层面，即对一代人实施的犯罪后果还要由受害人的后代承受。

291. 冲突中发生的性暴力行为很难消除，这涉及到多方面的根本因素。和平时期的妇女的从属地位在冲突期间常常会加深，使她们更容易受到性虐待。在将行为入绳之以法方面进展甚微，由于为性攻击幸存者提供的服务不足，她们要融入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Human Rights Watch, 2004）。

292. 儿童兵现象是社会无法实现融合的另一直接后果。就像在冲突中强奸被有意用作一种武器或策略一样，使用儿童兵的行为是基于蓄意剥削政策。一般来讲，儿童被视为廉价、听话和得力的战斗人员。人权观察估计，至少在 20 个国家存在着 30 万名儿童兵。虽然人们对解决战争期间使用儿童兵问题的各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有所提高，但是儿童兵的数量近年来仍然居高不下（Human Rights Watch, 2004）。2002 年末和 2003 年初，刚果民主共和国招募（更确切地说是诱拐）儿童兵打仗的现象急剧增加，而随着安哥拉和塞拉利昂战争的结束，数以千计的儿童得以脱离真枪实弹的武装冲突。

293. 随着对儿童兵状况的认识提高，近年来通过了三项重要条约。¹ 这些国际条约基本上得到普遍接受，但是难以执行。针对非国家性质的武装集团执行条约尤为困难，因为很难让他们遵守条约。这些集团对世界舆论无动于衷；由于这些类型的集团或正规政府即便使用儿童兵也不会面临被切断军事援助或招致制裁的真正危险，因此短期内没有理由期望形势会明显改观。

294. 在制止使用儿童兵的同时必须让这些儿童重新完全融入社会。曾经当过儿童兵的人可能没能接受过正规教育，也没能学会赚钱谋生的技能。通过参加冲突，他们往往不仅获得了挣钱的手段，还获得了归属感或兄弟情谊和地位。需要向这些青年人提供替代参加武装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出路，满足他们的全部基本需要。到目前为止，重返社会工作所获得的财政支持少于解除武装和复员工作所获得的财政支持，形成一种不平衡现象，可能导致青年人进一步的失落和进一步的暴力（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05）。

5. 家庭暴力和奴役现象

295. 家庭暴力是缺乏社会融合的另一暗中作怪的症状。虽然男子有时候也会受到家庭暴力的侵害，但是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妇女。家庭暴力是世界范围的一个严重问题。研究表明，全世界高达 69% 的妇女曾经遭受男性伴侣的暴力攻击。暴力攻击常常与心理虐待和性虐待相伴而生，对个人甚至整个社区都有严重影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296. 虽然家庭暴力发生在所有社会经济群体，但涉及最多的显然是贫穷妇女。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研究表明，造成家庭暴力发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有二：一是男女在社会中的政治、社会、经济 and 结构方面存在的不平等，二是两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分工森严，实力地位关系根深蒂固（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an, 2003）。

297. 处于婚姻或同居关系的伴侣之间发生的暴力通常并不像两个陌生人之间发生的暴力一样被认为严重到犯罪的程度。这一观念在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中都十分普遍（Iadicola and Shupe, 2003）。许多国家主要借助于民间社会的努力，引入了法律机制和各种公共和私人方案，以打击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

暴力 (Jelín and Diaz-Muñoz, 2003)。法律和政策改革通常是第一步, 虽然这些措施如果得不到执行, 没有体制文化和习俗变革与之配套,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进展。但是归根到底, 如果男女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和社会上的普遍观念不解决,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就无法消除 (Chopra, Galbraith and Darnton-Hill, 2002)。

298. 国际社会面临的另外一项挑战是现代奴役现象。人口贩运和奴役行为最明显地说明了不平等现象所造成的伤害。² 某些人主张对其他人拥有合法所有权的日子几乎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奴役现象仍然存在, 而且实际上发展速度惊人。人口贩运和奴役行为的规模非常难以衡量, 因为这些行为都属于非法和隐秘性质。据估计, 现在有 1 200 万至 2 700 万人被迫从事强制劳动或受到奴役 (Bales, 2000;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2005)。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债台高筑, 成为债务的人质抵押, 而实际上他们几乎还不清债。这些受奴役者还常常要父债子还。

299. 据估计, 每年有 60 万到 80 万人被跨境贩卖。国际人口贸易额每年可达 100 亿美元, 仅次于毒品和武器非法贸易收入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4;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05)。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各国境内被贩运的人口, 因为这些人更难以查证。联合国人口基金 (人口基金) 估计, 国内和跨国贩运人口可能高达 400 万人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05)。贩运行为的受害者 80% 是妇女和女孩, 大多数最终进入性产业惨遭剥削。儿童基金会估计, 每年有 120 万儿童被贩卖, 大多成为性剥削的对象或家庭苦力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04)。

300. 贫穷/不平等与奴役现象之间的关联非常简单。出身于穷苦家庭的人被当作商品卖掉, 满足某些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贫穷及贫穷产生的脆弱性是关键。人口贩子使用武力、欺骗或胁迫手段诱骗继而剥削受害者, 而受害者多为妇女和儿童。受害者由于遭受暴力手段和暴力威胁、害怕受到政府惩罚 (特别是如果他们被非法贩运到外国)、吸毒成瘾、廉耻之心和家庭义务等原因而束手无策。一旦某个受奴役者不再有利用价值, 就会被抛弃, 轻而易举地被另一个穷人所替代。贩运妇女和女孩是有组织犯罪集团三个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Heyzer, 2002;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9)。人口贩运已经成为风险较低而又获利颇丰的行业, 再加上难以发现受害者和贩运人员, 这明显成为打击这一犯罪的难题。

301.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为预防人口贩运还是可以采取很多行动的, 而且已经采取了若干行动, 包括加强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合作, 重点打击性奴役的需求方, 改革移民法以保护被贩运者并缓解他们被递解出境的恐惧。各国政府越来越把贩运作为一种犯罪, 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加强。但是, 在这一领域要取得任何进展都是非常艰难的。劳工市场上对移民和被贩运者的需求仍然很大, 同样, 廉价的可任意处置的人力的供应量也很大, 可以轻易地通过欺骗、

威逼和武力等手段买到，用于满足这一需求。这一需求来自于社会中较为富裕者，而货源来自于穷人，促成这一等式的驱动力是社区、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相对不平等。

D. 培育民主和社会融合

302. 促进对民主、法治、多样性和团结一致地尊重有助于消除制度化的不平等，因此对于成功地进行社会融合至为重要。有些国家为全体国民提供和平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让他们参与政治进程，影响政策制定、实施和监测，这些国家发生内部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有人说，民主的真正含义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站在市镇广场的中心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担心受到惩处或打击报复。这一说法使民主超越了体制上的定义，扩展到个人和群体层次上的容忍和接受。这也说明民主是不能由外力强加的。如果民主机构不能获得发展，如果公众没有和平表达不同意见的途径，某些群体就会受到排挤，社会分化现象就会处处可见，发生政治动荡的机会就会增加。

303. 民主、透明和负责地施政对于实现社会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民主国家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政治参与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980年，54个国家部分或全部实行了代议制民主，所涉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6%。到2000年，这些数字已经上升到121个国家和世界总人口的68%。但是，有人怀疑在某些区域新建立的民主根基能否得到巩固。1990年代形成的良好势头似有减缓之势，在某些地方可能正在消退（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2）。

304. 民主参政并不仅仅是参加选举投票。“一人一票”的理想经常受到资源和政治权力分配不公现象的破坏。因此，民众的参与动力有下降的危险，具体表现为投票率低、参与民主进程的能力不平等、最终造成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不平等。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并不一定带来参与政治进程或影响政治结果的能力的增加，向民主过渡本身并不能保证人权受到保护或倡导。

305. 公民、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是维持民主社会的根本。这些人权是相互促进的，必须涵盖所有公民，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土著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和参与自由。³ 能否尊重和捍卫人权关系到个人的福祉，也关系到公民的积极参与程度和整个社会的福祉。若要民主蓬勃发展，仅仅将上述自由写入法律是不够的，这些自由必须得到政策和政治意愿的支撑和保障，以确保人人都有机会积极参与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进程。

306. 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必须在各个阶段持续得到国内行动和机构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撑的进程。必须在这样一个假设条件下开展工作，民主是任何国家或区域都力所能及的。同时必须承认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各种文化的同质化。在真正的民主状态下，多样性是丰富和加强的源泉。民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

人人都有权在私下和在参政过程中自由地表达和捍卫不同的观点。鉴于民主体制能使各个层次都获得巨大利益，不应该丧失加强民主体制的机会。

307. 参与乃是发展进程的核心，也是发展进程取得成功和能长期持续的根本。边缘化问题过去常常被忽视，但现在已经成为重新评估减贫战略的一个要素。但是，许多政策规定在制定时仍然没有充分分析这些政策规定可能对穷人造成的影响。包括穷人在内的最脆弱的社会群体仍然处于政治活动和政治影响力的范围之外，被排斥在本来是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境地而进行的政策制定、执行和监测之外。因此，虽然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是减贫方案可能遭受“重城市，轻农村”倾向的影响（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2004）。

308. 在某些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成功地倡导增加用于社会发展的公共资源份额。然而，即便是在通过广泛协商制定了减贫方案的国家中，已经确定的优先事项也不一定与预算机制挂钩，最终方案有可能不会以最贫穷人口为对象。

309. 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度是增强社会能力的手段之一。2003年，妇女在世界各地国家议会中仅占有15%的席位，与1990年相比增长幅度不到两个百分点。北欧国家在实现政治代表性两性平等方面距离目标最近。2003年，这些国家的妇女在国家议员中占40%的比例，比发达国家的整体平均水平高一倍多（United Nations, 2004c）。一半人口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的现状表明，人力资本的使用不当，最终会造成所有层次的业绩欠佳。在妇女参政方面存在的社会经济障碍有，贫穷或财政资源不足，获得教育的机会有限，文盲，（在工作机会和职业选择方面）就业选择机会有限，失业，及家庭责任和工作义务的双重负担。

310. 一个国家为满足妇女和女孩需要而作出的专项预算所占比例往往精确反映该国的优先事项。预算从来都不会不考虑性别因素，近年来，人们认识到计及性别因素的预算办法是许多国家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人权的一项工具（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2001）。

311. 土著民族有史以来一直受到歧视，现在仍然常常被剥夺基本人权，尤其是文化权利和控制自己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权利。他们往往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必须确保他们的参与，这样才能解决他们的关切，在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再迈进一步。

312. 残疾人也一直受到歧视，没有机会积极参与政治进程。研究表明，残疾人受到犯罪侵害的几率是其他人的10倍之多，而犯罪行为人以家庭成员或护理人员居多（Petersilia, 2001）。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的磋商是确保这一群体基本人权得到保护的一个重要步骤。

313. 在关于青年和老年人政策的讨论中，常常低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对他们的需要缺乏了解。为确保实现参与式民主，促进代际平等，必须将这些群体纳入整个政策制定工作。

E. 结论

314. 在许多地方，社会融合仍旧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变革，使世界各地都必须承担巨大压力。贫穷和不平等现象的增加和机会的减少对个人、社区甚至国家的福祉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人们普遍感觉到，社会经济需求没有得到处理，很少有人相信国家机构是以民众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而行事的，许多社区对自身的经济状况不满意。对社区福祉和未来前景的消极感觉让许多人灰心丧气，难以确保社会全体成员参与并投资于发展进程。

315. 自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事件发生以来，全球安全问题已经上升为国际社会的第一议程项目，成为广大民众日益关注的中心。世界经济论坛进行的一项国际调查表明，45% 的答卷人认为下一代将生活在不太安全的世界中，仅有 25% 的人认为子孙后代将会生活在更为安全的世界中（World Economic Forum, 2004）。中东和西欧对未来的安全最为悲观，仅有非洲、中东欧和西亚这三个地区的乐观情绪高于悲观情绪。

316. 在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强的同时，安全保卫私有化得到了发展。如上所述，全球化、放松管制和国家的弱化造成非正规经济的增长，这些因素影响着犯罪黑市和私营安保部门的发展。⁴ 安保日益私有化和暴力现象出现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趋势：民众获得小武器越来越容易，私人安保业扩张，和雇佣军越来越多地参与武装冲突（Klare, 1995）。虽然多数大型武器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低强度冲突中使用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小武器情况却有所不同。估计世界上 6.4 亿支火器中有五分之三是在平民手中（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2003）。

317. 在非洲、东亚、欧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他们对影响自身生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缺乏控制或影响。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关切正在引发严重的焦躁情绪，人们对于国家机构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的能力或决心没有多大信心。近年来经历了深刻变革的国家往往更为乐观（World Economic Forum, 2004）。

318. 人们对政治进程的消极看法说明，必须加紧努力，把社会的各个部分都纳入政治生活之中。人人都必须有同等的机会参与政治进程，这不仅是为了实现公正，而且是为了确保充分利用本国的人力资源，促进和平与稳定。增强当地群体参与自身社区的建设和改善的能力将提高发展项目的效力。让民众参与影响他们日常生活和福祉的决策进程将大大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

319. 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构成和经济方面将发生变化，这可能增加社会融合进程的难度。代际契约关系数百年来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相互供养体系，但将

在未来数十年中受到严峻挑战。许多人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人口迁移会产生不利影响；人们常常把感觉中的社会威胁描述为大劫难，认为这预示着权力之争。虽然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变化对每一个社会来讲都是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规划得当，政策执行得力，就能够创造各种机会，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福祉。

320. 社会融合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经济、环境、政治、安全和人权问题。要创建和平与生产力旺盛的社会，就必须在尊重人权、不歧视原则、机会均等和人人参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融合，同时考虑到今世后代的权利和需要。

注

¹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在敌对状态下征招或使用 15 岁以下儿童的行为是战争罪；《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禁止强行征募 18 岁以下儿童参加武装冲突；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规定 18 岁为参加武装冲突的最低年龄。

² 关于贩运的定义，见《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又称《巴勒莫公约》）。

³ 《2003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广泛论述了这些社会群体的问题。

⁴ 对于区分黑市和非正规市场是否必要或有实际意义，人们存在着疑问，因为这两个市场都不受到监管，一般情况下都处在法律管辖范围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非法的。除这些基本的相似点之外，逃避国家销售税的农产品商贩和向反叛集团提供自动武器的小武器经销商当然是有区别的。

五. 发展与不平等的不断变化的背景

321. 前几章阐述了为什么要注重不平等，强调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强烈对比。因此，在这里探索一下潜伏在这一不受欢迎的现实底下的动态变化是适宜的。

322. 国家和国际事件与情况都为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产生重大影响。全球化显然是在 21 世纪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全球化的不对称，并因此而出现了“赢者”与“输者”。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严重影响到了 1995 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产生的希望。结构调整方案和市场改革所形成的经济和体制环境使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在最近数十年得到扩展。这些变化总的来说对世界各地的个人、群体和社区的福祉都有负面影响，也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323. 由于全球化与市场改革的双重挑战，包括金融和贸易自由化，显然，只有在当前国际环境中的政治和体制要素得到更好的界定，任何不足之处得到确定和处理之后，才能规划出走向社会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治理的质量和在国家框架内制定的政策的质量不是促进社会发展，就是阻碍社会发展。而发展筹资资金问题是一个需要更加密切予以注意的紧迫问题。

324. 经济靠拢理论认为，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的日益一体化将推动收入水平的靠拢和随之而来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的缩小(Barro, 1991; Barro 和 Sala-i-Martin, 1992; Ben-David, 1993)。然而，现有证据显然在驳斥这种假设，有些研究质疑目前形式的全球化是否有助于缩小全世界的的不平等。

A. 全球化：不对称与政策空间的丧失

325. 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局限于一个以自由贸易、知识产权、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及投资保护等问题为主的国际议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个议程中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些项目，如国际劳工流动性、资本收入的国际征税、补偿处于边缘地位国家和社会群体的筹资机制，以及确保工业化国家宏观政策一致和随之减少大国间汇率动荡不稳的机制。不同的国家集团对相同的问题往往会按不同的优先和紧迫程度处理，而市场竞争性会使国家直接发生冲突。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的产品，如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在发达国家得到最高等级的贸易保护，提供大规模补贴就是证明。此外，关于服务业的谈判仍然注重于受发达国家非常关注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包括电信和金融服务，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感兴趣的服务方式，如目的在于提供服务的劳工流动（特别是非熟练劳工流动），则受到忽视 (Ocampo and Martin, 2003)。

326. 较重要的一种不对称涉及到作为当前全球化进程的基础的议程失衡；更确切地说，在高速经济全球化与（基本上由社会发展领域非常差的问责制和执行机

制产生的)相对薄弱的国际社会议程之间存在着反差。人们越来越承认需要在国际体系中为保护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全球公益”提供必要的空间(Ocampo, 2005)。

327. 一如本报告所示,在多数国家,“政策空间”在现有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中多少受到约束。全球竞争压力往往限制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推进社会政策和社会平等所需决定或行动一般被视为不必要费用。简言之,社会发展政策往往被误认为与保持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相冲突。

328. 发展中国家想吸引外资,扩大出口,这种愿望往往导致“赛到底”,为了使本国在国际市场中更有竞争力而忽视或损害劳工保护和环境标准。这意味着,外来的竞争压力限制了一些国家执行某些方面的社会政策的能力,从而破坏了社会发展的进步。¹

329. 注意到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对称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在其2000年2月于曼谷举行的第十届会议上通过了《行动计划》,其中呼吁增强双边和多边努力,保障人口中的弱势阶层,全球化的益处应该更加广泛地共享,并指出,“没有任何程序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自动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靠拢”(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0, Para. 4)。《行动计划》强调了有效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身体健康和接受基础教育是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对减轻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现象也是必不可少的”(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0, para. 9)。

330. 2004年6月在圣保罗举行的贸发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在前一届会议的基础上呼吁加强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经济进程之间的协调一致,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会议强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在实现经济潜力、发展生产性部门和为大多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4 b)。

331. 此外,“辩论集中于贸易如何为发展服务,尤其是国际贸易如何为减少贫穷和世界商品价格的不稳定作出贡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4 b)。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化所涉社会问题世界委员会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些主题,“强调政策的协调在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

332. 贸发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强调“发展是各国的首要责任,但也确认国家的努力应得到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促进,这种有利的环境是以多边商定和实行的规则为基础的”(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4 b)。第十一届会议断言,“为实现健全的全球经济治理,必须加强国家与国际努力之间的协调以及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制之间的协调,以提高它们应对发展

的各项需要的能力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4 b)。

333. 当前国际议程中的某些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特殊挑战。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这里的基本假设是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将增加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但近期有事例表明这个协议实际上可能会限制技术转让,损害穷国利益,保护富国利益。更笼统地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可能会增加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费用,从而缩小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方法范围。

334. 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国家执行的自由化政策使劳动力市场和劳工法与劳工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趋向于更灵活的工资、缩小公共部门的就业、减少就业保障和保护。这些变化导致非正式就业扩大,劳工流动性增加,工作稳定性减弱。工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也更加五花八门,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的重要性下降,谈判力量削弱。

335. 上述这些变化大大助长了工资不平等和国内总体不平等的扩大,在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和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尤其如此 (Cornia and Court, 2001)。鉴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占总收入的 60%至 70%,这种工资不平等的扩大成了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的重要组成部分。

336. 在许多情况下,实际最低工资下降,最高收入剧增。在工业化经济体,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加拿大、美国和联合王国特别明显,在这些国家,1%收入最高者所占份额锐增 (Atkinson, 2003)。在美国,2000 年这一群体所占份额达到总收入的 17%,这个水平上一次出现在 1920 年代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也呈现类似的格局。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贸易自由化造成了工资的下降,特别是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下降,从而扩大了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在 7 个具有可靠工资数据的拉丁美洲国家中,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其中 6 个国家的工资差异,菲律宾和东欧的情况也是如此 (Lindert and Williamson, 2001)。数据表明,在经合组织成员国、拉丁美洲和转型经济体,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中期工资不平等的扩大特别明显,虽然问题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 (Cornia, 2004)。

B. 自由化和稳定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

337. 有种种全球动态变化有助于解释不平等趋势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许多国家在过去 20 年里执行的自由化政策。这些改革在世界各地施行,对不平等趋势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

338. 为提高经济业绩而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许多都无助于更加平衡地分派经济增长的惠益,实际上反而加重了不平等。有可靠数据表明,经合组织成员国,

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实施最严格的制度的，近几十年来国内不平等扩大的程度也显得最大（Weeks，2004）。

339. 过去 20 年里执行的自由化和调整政策在好几方面助长了不平等的扩大。以下几小节将概述这些政策的某些组成部分，剖析这些政策对有关国家内部及整个世界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审查将注重这些政策中两个较突出的要素：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

340. 当前的国际经济方针是在 1980 年代演变起来的，作为市场导向的发展观点而占主导地位。一如前几章所示，这一发展方针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市场力量将导致对资源作效率最高的分配，从而加快经济增长，最后达到提高总体发展的目的。

341. 1990 年代的金融危机及随后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联邦发生的经济衰退表明，无节制的、有时是高度投机的国际资本流动，伴之以亲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会造成社会破坏。这些危机对人的影响——在许多国家包括失业、贫穷与不平等的加剧及社会凝聚力的瓦解——突出了促进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342. 结构调整方案的实施暴露了以社会政策为代价追求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弊端。分析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后发现，衰退期间贫穷加剧了（Easterly，2001）。如第一章所述，政策制订者逐步意识到需要改变做法，从而最终导入了世界银行的减贫战略文件和货币基金组织的减少贫穷促进增长贷款机制。

343. 除了制订和采用具有有助于扶贫和增长的方案措施的减贫战略，并辅之以更平等的政府预算分配和增加财政灵活性外，减少贫穷促进增长贷款机制的一个新特点是在重大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时使用社会作用力分析，虽然内部审查表明将这种分析系统地纳入方案设计仍然是极需改进的一个领域（例如见 world Bank，2004 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2003）。

344. 对减贫战略文件和减少贫穷促进增长贷款机制举措所作的外部审查表明，鉴于事实证明结构改革对贫穷具有负面影响，民间社会组织高度关切对结构改革所施加的条件。还有人批评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没有以实际执行行动来支持它们明示的对贫穷与社会作用力分析的承诺。例如，北欧政府对减贫战略文件进程的审查揭示，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措施与减贫仅有名义上的联系，而且在采用实际政策时没有依靠经验证据（挪威发展合作机构，2003）。这些调查结果使世界银行承认在规划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一个“执行差距”，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说要将社会要素（特别是减贫）纳入经济方案与实际行动之间脱节（World Bank，2004 c）。

1. 金融自由化

345.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步骤，使本国的银行和金融部门自由化，并向国际资本流动开放本国市场。众多研究表明，这些进程是贫穷率上升和收入分配进一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的分析显示，金融危机对工资分配有不利影响，这种效应即使在经济复苏之后仍继续存在（World Bank, 2000）。另一份研究表示，在拉丁美洲，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实施对工资差异产生了最强的破坏平衡作用（Behrman、Birdsall and Szekely, 2000）。

346. 金融自由化加重了不稳定的程度和金融危机的频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Caprio and Klingebiel, 1996）。例如，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家更易受资本外逃的影响。一国金融体系自由化之后资本的流入往往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而这经常与实际利率上升有关联。利率上升往往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由此造成的信贷膨胀会触发消费与进口兴旺或投机性的资产价格泡沫。“如果需求扩大造成的对外平衡扩大不能持续，或者泡沫开始破裂时资本逃离经济体，需求扩大就将是短命的”（Taylor, 2004）。简言之，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本国汇率与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这继而又严重限制了它们执行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Ocampo, 2002 a）。

347. 信息不全和信息缺乏问题使放松管制后的金融制度不能有效运作，使贷款人作出不良的投资，宝贵资源分配失误。由于短期投机性流动在这些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源减少，从而形成了对发展政策的新的制约。

348. 在重大经济发展中发生的危机有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损失。对在 1975 年至 1994 年期间经受过金融危机的国家所作研究显示，在每次危机之后的最初五年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下跌 1.3%（Stiglitz, 1998）。

349. 经济危机还加重了一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这种危机期间，由于工作稀缺，造成劳工需求减少，这驱使工资下跌，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跌。这种情形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更普遍地说，导致特别是工资下跌幅度大而又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不平等的扩大。众多研究在分析了 1970 年代以来 60 个国家中金融危机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后都用经验示明了这一点。例如，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危机后工资不平等程度分别增加了 62% 和 73%；但这种危机后影响在芬兰、挪威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并不明显（Diwan, 1999; Galbraith and Jiaqing, 1999）。

350. 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导致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对就业和增长的影响有利有弊（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这种投资使某些国家受益，技术和专门知识的转让帮助了经济发展。然而，这些国家先前已经具备一些重要条件，包括各类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培训机构、技术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能支持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当地企业能够吸收和受惠于所转让的技术和技能。没有这些条件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经济的联系薄弱，很少能受惠于这种投资。虽然投资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增

加了，但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高度集中在特定地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

2. 贸易自由化

351. 如前所述，自由化政策和市场改革产生了许多不对称。就贸易自由化而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转变为世贸组织是关键性的事件，扩大了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的范围，使之不仅限于关税削减和对制成品贸易的其他直接障碍。许多其他问题，因被视为阻碍国家间货物与服务的自由流动，而成了世贸组织的工作范围。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国家政策包括社会政策，凡认定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不符的，都要受世贸组织规则的限制。任何一方，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权益或企业，都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对另一个成员国的地方和国家法规提出挑战（Guimarães, 2004 年）。

352. 即使是市场经济最坚定的倡导者也同意，贸易自由化不能确保，没有国家的直接支持或者通过某种法规形式提供的支持，所有行为者也都能成功，在新兴经济体尤其如此（Lowi, 2001）。与不平等这一国际贸易新体制的特点相关联的一个更为棘手的挑战是，不适当地优先突出自由贸易的地位有损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353. 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协议的扩散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国家间的不平等（World Bank, 2004 a）。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一项范围宽泛的全球贸易协议可以使全球收入到 2015 年增加 2 630 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占 1 090 亿美元。然而，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与重大贸易伙伴，即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订立双边贸易协议，全球收入将仅增加 1 120 亿美元，占前一估计数的一半还不到。另外，这 1 120 亿美元的增加是最富有国家收入增加 1 330 亿美元和发展中国家相应减少 210 亿美元的结果（World Bank, 2004 a）。

354. 贸易自由化与消除贫穷之间的关系最近受到了国家组织和学术界两方面的密切审视。例如，贸发会议审查了 66 个发展中国家在五年（1990-1995 年或 1995-2000 年）期间贸易自由化的经历，结论是贸易自由化与消除贫穷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直截了当的。² 同样，审查有关的学术研究后没有发现对于这两者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简单、普遍的结论（Copeland and Taylor, 2004）。但是，贸发会议确实指出，与开放得既猛又快的国家和对其他国家保留最多贸易限制的国家相比，逐步开放的国家往往呈现较好的贸易-贫穷关系。

355. 关于非洲贸易自由化的经验文献查明了贸易在投资构成、家庭福利、收入分配和当地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影响非洲大陆的途径（Geda, 2004）。大多数跨国倒退事例表示，开放与收入不平等成正相关关系（例如见 Spilimbergo、Londoño and Skezely, 1999; Fischer, 2000）。

356. 在工业化国家，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助长了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扩大。产业向低收入国家的转移压低了在较传统的制造业从事低技能工作者的工资，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同类工作的提供。近年来，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也影响到其他类别的工作，包括高技术部门的工作。

357. 贸易自由化政策既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也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减贫前景。由于约四分之三的贫穷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只有当农业生产率能持续增长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才能减少。已经很低的农业收入的恶化是农村贫穷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原因。虽然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可能减少穷人的消费费用，但它也意味着农民的收入减少，农民对其他商品和农村地区的服务的需求减少。

358. 人们承认，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做法和农业补贴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和收入低下的重大因素。对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进口平均征税 1%，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美国征税 9%，欧盟征税 20%，它们对纺织品征税则分别为 8.9% 和 7.9%。这种不对称性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该地区对（主要来自工业化国家的）非农业进口征收 8.5% 的关税，但它们自己的农产品出口到工业化国家时被征税 20.4%。由于发达国家施加的进口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出口每年损失达 400 亿美元以上。这个数额相当于成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预测财政需要的很大一部分（Guadagni, 2004）。

C. 为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筹资

359. 筹资是进行新的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和国际为扭转目前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进行协调一致努力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提供财政资源本身不能确保产生积极结果，但此类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已对资助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方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许多国家已承诺提高其官方发展援助的水平和质量。对移民汇款和国内融资问题，以及将和平红利用于社会发展的方式，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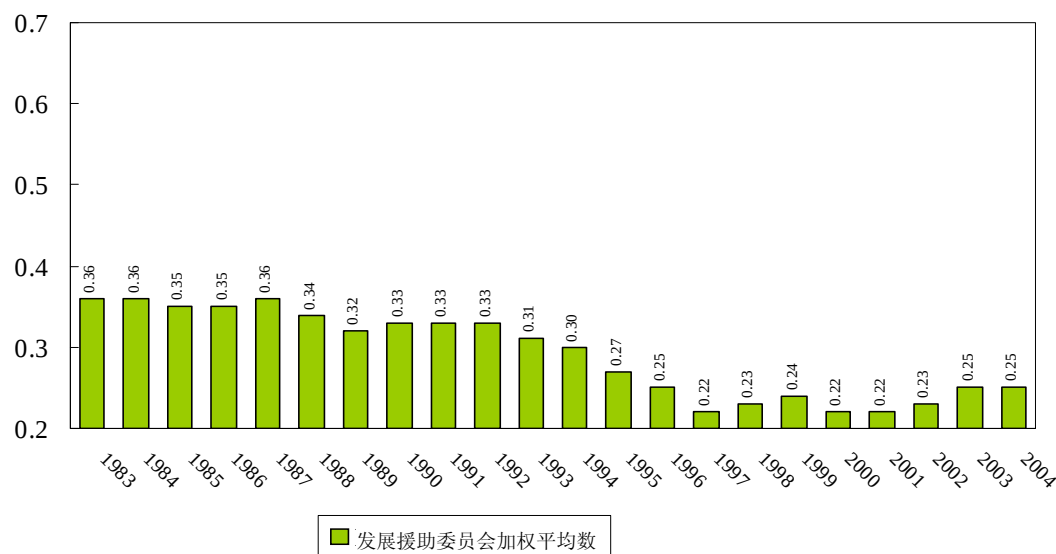
1. 官方发展援助

360. 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召开了国际发展筹资会议。在会议通过的《蒙特雷共识》中，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采取行动，促进发展筹资。会议标志了政府、民间社会、工商界和机构利益有关者四方第一次会聚在一起，就全球经济问题交流看法。

361. 作为调动国际援助的努力的一部分，一再呼吁尽快提高目前官方发展援助的水平，以增加可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流量。发展援助委员会 22 个捐助国按照其合计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计算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整体水平，由 1987 年的 0.36% 减少到 2001 年的 0.22%。虽然官方发展援助额最近开始回升，从 1990 年代的最低点增加到 2004 年的 0.25%（见图五.1），但仍然大大低于大会 35 年前要求的 0.7% 的国际商定指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a）。

图五.1

发展援助委员会所有捐助国的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至 2004 年的长期趋势



资料来源：iDevelopment Initiatives, “Briefing on aid in 2004” (www.devinit.org/dagfigs2004brief2.pdf; 2005 年 5 月 20 日查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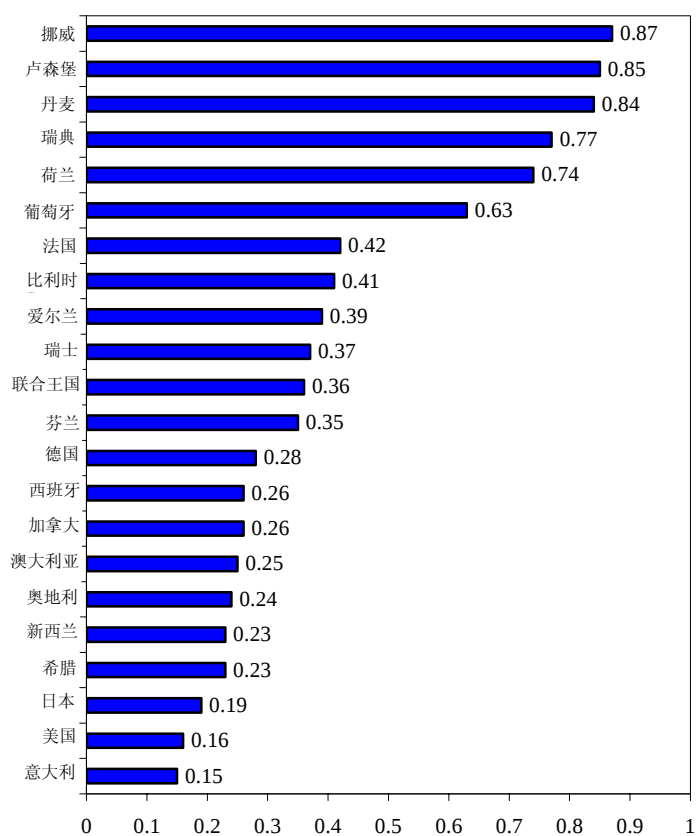
362. 只有挪威、丹麦、瑞典、卢森堡和荷兰达到并超过了联合国关于官方发展援助为 0.7% 的指标。2004 年的数字表明，这五个国家与其他 17 个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只有葡萄牙例外，它接近达到这一指标）。如图五.2 所示，七国集团大多数国家³ 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部分仍然大大低于联合国的指标。

363. 在国际发展筹资会议上，主要捐助国承诺提高发展援助水平。如果捐助国信守其在蒙特雷作出的承诺，到 2006 年，援助流量将从 2004 年的 786 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水平）增加到 2006 年的大约 880 亿美元（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b）。这些事态发展似乎显示了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联合国秘书长强调，为了在 2015 年达到 0.7% 的指标，还需要大大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呼吁尚未制定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时间表的发达国家制定这一时间表，首先应至迟于 2006 年大幅度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到 2009 年达到 0.5% 的水平。还必须采取行动加强官方发展援助的质量、透明度、问责制和可预测性（United Nations, 2005c）。

图五.2

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

捐助国援助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资料来源: iDevelopment Initiatives, “Briefing on aid in 2004” (www.devinit.org/dagfigs2004brief2.pdf; 2005年5月20日查索)。

* 2005年4月11日获得的初步数据。

364. 援助流量起伏不定，这将影响其成效。官方发展援助伴随着捐助国经济周期的起伏而增减，并受捐助国政策变化和对受援国政策的评估的影响。援助的减少通常将导致代价很高的财政调整，包括增加税收，削减开支，进而加剧了减少援助的周期性影响。援助流量激增也会带来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在金融部门欠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吸纳能力往往很低。援助流量激增将导致汇率上升，如果持续下去，会引起货币估价过高（United Nations, 2005d）。

365. 官方发展援助通常集中于特定国家。由于捐助国往往偏向某些受援国，1980 年代以来，双边发展援助净额的一半以上提供给不过 20 个国家。这种集中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捐助国对援助效率的看法（United Nations, 2005d）。

366. 近来增加的官方发展援助均用于紧急援助、债务减免、技术援助和向捐助国出于政治或安全理由认为重要的国家提供援助，这就大大减少了向贫穷国家提供的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United Nations, 2005c）。紧急援助虽然很重要，但它无补于长期发展，也不代表发展援助有任何实际增加。因此，尽管捐助国的援助基金增加了，但官方发展援助实际分配给受援国发展方案筹资的部分很有限。换句话说，尽管捐助国的援助近来有所增加，但官方发展援助作为发展中国家预算资源的来源却萎缩了，这就限制了它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为支持这些目标，在呼吁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时，必须特别提到现金的实际增加（United Nations, 2005d）。

2. 新资金的来源

367. 正在考虑一些新的建议，以通过创新性的发展筹资，补充现有的官方发展援助机制，提高发展援助流量的可预测性。1995 年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五年期审查再度激发了关于替代性发展筹资来源问题的辩论。近来的研究工作探讨了发展支助的若干潜在选择，就短期和长期机制提出了建议（Atkinson, 2004）。这些机制的采纳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可行性以及有关伙伴的共识。一个替代来源是国际融资设施，作为一个短期机制，它根据捐助者作出的新的长期援助承诺，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先行筹得资金。这将大大增加当下可使用的发展资金，加强发展流量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另一个短期机制是为发展目的使用特别提款权。这一手段有可能用于补充各国现有的官方储备，在危机期间提供应急资金。

368. 潜在的长期筹资机制包括全球彩票和全球税收，所得收益可用于发展。就货币交易、军火销售和产生温室气体的燃料消耗建议征收的税，可筹集足够的资金用于应付世界范围的贫困和饥饿。据估计，实施货币交易税每年可筹集 168 亿到 354 亿美元。排放温室气体税可成为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同时遏制有害行为。根据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排放每吨征收 21 美元税款，如果在全球实行，每年可筹集 1 300 亿美元，如果仅在富国实行，可筹集 610

亿美元。军火销售税每年可筹集 25 亿美元到 80 亿美元，同时会减少将经费用于军费开支的意愿 (Atkinson, 2004)。

369. 为资助发展在全球征税应由国家实施，在国际范围协调，以免被视为侵犯了参与国家的财政主权。在实行全球税收制度时，应避免建立新的国际官僚机构。不需要普遍参与，虽然参与越广泛，资源就越多，还可以减少搭便车的现象 (Atkinson, 2004)。

370. 通过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安排移民工人汇回其收入，是为发展积累资金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可作出共同努力，便利外国工人更好地利用银行机构的服务，并争取受援国当地金融机构的支持，进一步降低汇款费用。

3. 移民汇款

371. 经济的全球化、自由化和日益加强的一体化，意味着人员，而不仅仅是工作机会和资本，日益大量而频繁地跨国界流动 (United Nations, 2003b)。国家之间持续存在且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不断扩大的人口差距，加上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和便宜，造成国际移民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2000 年，全世界估计有 1.75 亿人(或每 35 人中有 1 人)生活在出生国之外(United Nations, 2004d)。越来越多的移民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寻求就业和更好的经济机会。这些移民在其目的地，往往能赚取更多收入，改善其生活条件。发展中区域之内，移民流量也很高，在这些区域，强制移民和严重的难民潮往往给有限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372. 虽然最近有许多移民因家庭团聚的理由获准进入若干发达国家 (SOPEMI [Continuous reporting system on Migration], 2003)，但国际移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因为移民输出国和接收国之间机会明显不均。从历史上来看，移民群体的组成往往反映出起源国人口中技能较高的那一部分占较高的比例，但由于许多发达国家出现劳动力短缺和新的劳动力需求，这一偏向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国家为解决低技能劳动力供应的短缺，容忍无证迁徙和违反签证规定的行为，虽然政府往往普遍不承认这一点 (United Nations, 2004d)。

373. 移民大量流出发展中国家对输出国和接收国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在输出国，迁徙往往导致本已有限的熟练劳动力大量减少，以致经济改革更难出成效。来自税收的财政收入也有可能减少，因为移民往往是些高收入者。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移徙释放了输出国的就业位置，可能为那些原本失业者提供机会 (United Nations, 2004d)。

374. 移民收入构成了劳动力输出国一个相当重要的汇款来源，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增加，尽管外国工人在东道国有时面临朝不保夕的经济境况。汇款数据不够完整，几乎必然会低估从非正式渠道流入的资金。然而，现有数据表明，2002 年，汇款总额达 1 300 亿美元，其中有 790 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在越来越多的国

家中，汇款额超过了官方发展援助，目前构成了仅次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资金来源（United Nations, 2004d）。

375. 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定地区。数额最高者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其次是东亚和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仅占总额的 1.5%。欧洲联盟是汇款的最大来源，其次是美国和中东国家（United Nations, 2004d）。

376. 汇款与减贫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正相关，“平均说来，国际汇款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每增加 10%，贫穷人口所占比例即减少 1.6%”（Adams and Page, 2003）。国际移民本身对减贫也有明显的统计影响，国际移民在一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每增加 10%，每日靠不足一美元维持生活的人口所占比例即下降 1.9%。

377. 工人汇款的去向及其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也受到了极大关注。大体说来，移民似乎“精打细算地”使用其收入，收益通常超出了移民成本。汇款主要是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然而，这些钱往往还用于儿女和青年人教育，或改善住房质量，这些显然是投资。即使将汇款用于消费，对社区也有间接影响，因为消费刺激了当地经济增长（Skeldon, 2002）。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汇款是否可能被用来在起始和接收端的穷人中起“银行的作用”，即将资金用于更具生产性的用途，例如投资于中小企业，或针对移民家庭和接受汇款家庭采取金融储蓄和其他投资策略。

378. 很难衡量汇款对不平等现象的影响。汇款可能加剧财政和社会不平等，因为那些移民者往往来自社区的“较富裕”家庭。但整体来说，情况有好有坏。例如，在巴基斯坦的研究表明，移民和非移民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了，但也发现，汇款分布在相对广泛的群体和区域。在泰国的研究表明，贫穷家庭收到的汇款对减缓贫穷有较大影响，尽管人均数额大大低于较富裕家庭收到的汇款（Skeldon, 2002）。

379. 汇款对移民家庭的经济影响往往很巨大，那些没有移民的人目睹汇款给移民家庭带来的好处，可能会羡慕甚至产生怨愤情绪。根据在印度进行的移民研究，此类怨愤情绪促使非移民家庭一致仇视移民收入带来的富足景象，引发了暴力冲突（Allen, 2003）。要维持汇款的积极贡献，就需要适当节制和正视非移民家庭这种怨愤和被排除在外的情绪。显然，移民和汇款对输出国和接收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社区和国家层面的社会成本利得也各有不同。

4. 国内筹资

380. 随着自由化政策的推行，采取了对消除不平等有直接影响的一些措施，例如累进制税收和公共开支水平和构成的变化，这些措施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少再分配的性质。例如，对 36 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调查表明，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期间，整体的税收累进程度和直接税在总税收中所占份额都下降了，税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平均下降了一个百分点（Chu, Davoodi and Gupta, 2000）。拉

丁美洲税收制度的变化实际将税务负担由富人转嫁到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 (Morley, 2000)。在经合组织国家对自由化政策的推行最是始终贯彻, 其用于普遍享有的社会方案的开支减少了, 导致公共预算减少了向低收入家庭的转移 (Weeks, 2004)。

381. 在许多情况下, 公共财政改革将公共部门的社会筹资和监督责任转移给私人部门。这一转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服务的提供方面最为明显, 在这些国家, 社会服务传统上是由公共部门以补贴费率的方式提供的, 如今, 一些服务实行了私有化, 或外包给私人承包商。新的主导观念奉行成本回收和有偿服务的方针, 使许多服务与穷人无缘。推行保健和教育收费制度导致了社会排斥加剧, 随之而来, 社会援助减少了, 保健方案的规模也收缩了。国内和国家间在教育和保健等领域非经济性不平等的加剧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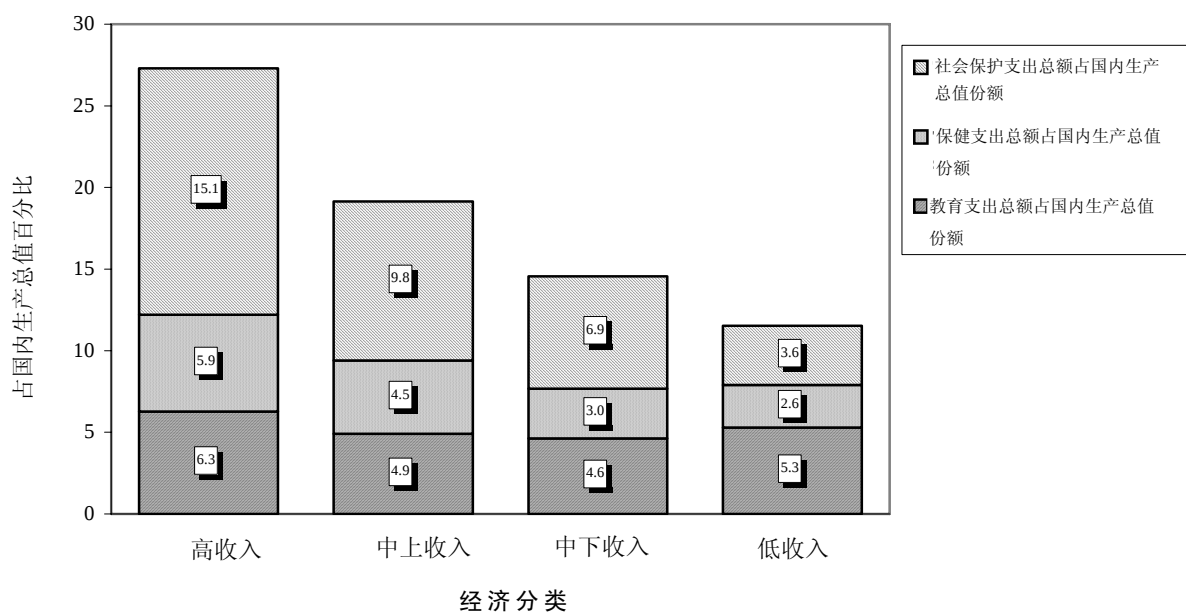
382. 非经济性不平等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归因于政府对经济事务和国防领域开支给予高度优先考虑, 而不是将钱用在保健、教育、社会保护和其他社会部门方案上。近来的一项研究试图查明政府如何分配资源, 并将研究重点放在资源在社会部门和其他优先领域之间的分配, 以及公共开支模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Kelly and Saiz-Omeñaca, 2004)。

383. 研究结果指出, 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类的不同国家组之间, 公共部门开支情况有很大差异。高收入国家平均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27% 用于社会部门, 中上和中下收入国家分别为 19% 和 15%, 低收入国家则为 12% (Kelly and Saiz-Omeñaca, 2004)。总体说来, 富国用于其公民保健、教育和福利的国民财富平均为穷国的两倍半 (见图五.3)。

384. 在社会部门中,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最大差异体现在社会保护领域, 其次是保健, 再其次是教育。平均而言, 高收入国家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用于社会保护, 例如养恤金、失业和残疾人补贴以及意外事故和医疗保险, 中上收入国家和中下收入国家分别为 10% 和 7%。最令人震惊的是, 低收入国家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4% 用于社会保护, 或大约为高收入国家的四分之一。

385. 保健开支在各个经济群体间也有很大不同。高收入国家平均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6% 用于保健, 比低收入国家的 3% 高一倍以上。考虑到保健对人口福利的重要性, 更不用说其与减贫的联系, 较贫穷国家仅将少量资源用于医疗保健令人很不安。

图五.3
按收入分类的各国社会部门支出



资料来源：P. Kelly and V. Saiz-Omeñaca, “1990-2001 年世界各国政府开支分配”，未发表文件（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2004 年 11 月）。

386. 就国家开支的相对配置而言，教育是社会各部门中的一个亮点。虽然高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教育的比例仍然较高（6.3%，收入较低国家则为 5.3%），但这一差距大大低于在社会保护和保健部门的情况。此外，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教育的部分实际上高于中上或中下收入国家。许多低收入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确实值得赞扬，投资于教育的趋势应当维持下去。然而，单凭教育，不足以减贫和提高生活水准。应在所有社会部门，包括保健和社会保护领域适当投资，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387. 社会部门方案的筹资与税收有直接联系，因为税收是国家财政资源的基本组成部分。许多政府不是通过征税为社会方案筹措额外资金，反而认为必须降低公司税的平均税率，以吸引和留住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前 30 个最富裕的国家，公司税的平均税率由 1996 年的 37.6% 下降到 2003 年的 30.8%（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对高收入者的税收也存在类似现象，而这些人也是流动性较强的群体。在许多情况下，为补偿这类减税，政府日益依赖间接税，

例如销售税（尤其是增值税）或对相对不流动（或流动性较弱）的要素，例如劳动力的税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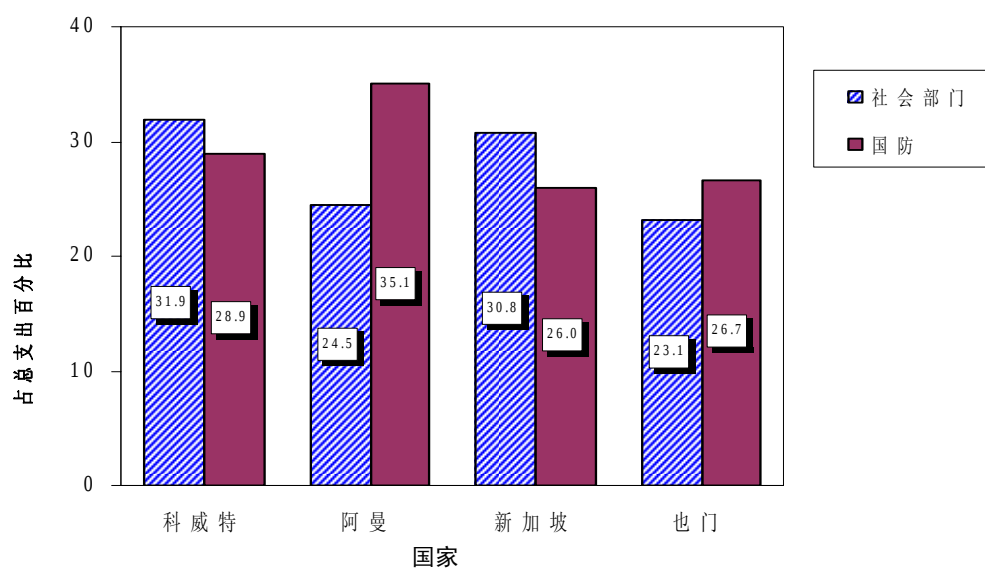
5. 和平红利

388. 发展筹资还将受益于削减军费，因为节省的公共资源可转用于社会发展投资。根据最近对世界各国政府 10 年期开支进行的一项研究，国防部门在公共支出总额中所占份额最高的国家，分配给社会部门的国家预算份额往往最低（见图五.4）。同样，如图五.5 所示，社会部门开支水平最高的国家，国防开支往往最低（Kelly and Saiz-Omeñaca, 2004）。

389. 过去几年来，没有出现将资源从国防转拨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世界军事估计开支⁴连续五年下降，由 1993 年的 7 620 亿美元减少到 1998 年的 6 900 亿美元，此后开始上升（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3; United Nations, 2004b）。到 2002 年，国防开支据估计增加到 7 840 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 1993 年的水平。2003 年，世界军事开支达 9 560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2.6%（United Nations, 2004b;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4），2005 年，很可能超过 1 万亿美元（United Nations, 2005b）。这一数字目前几乎是发展援助的 20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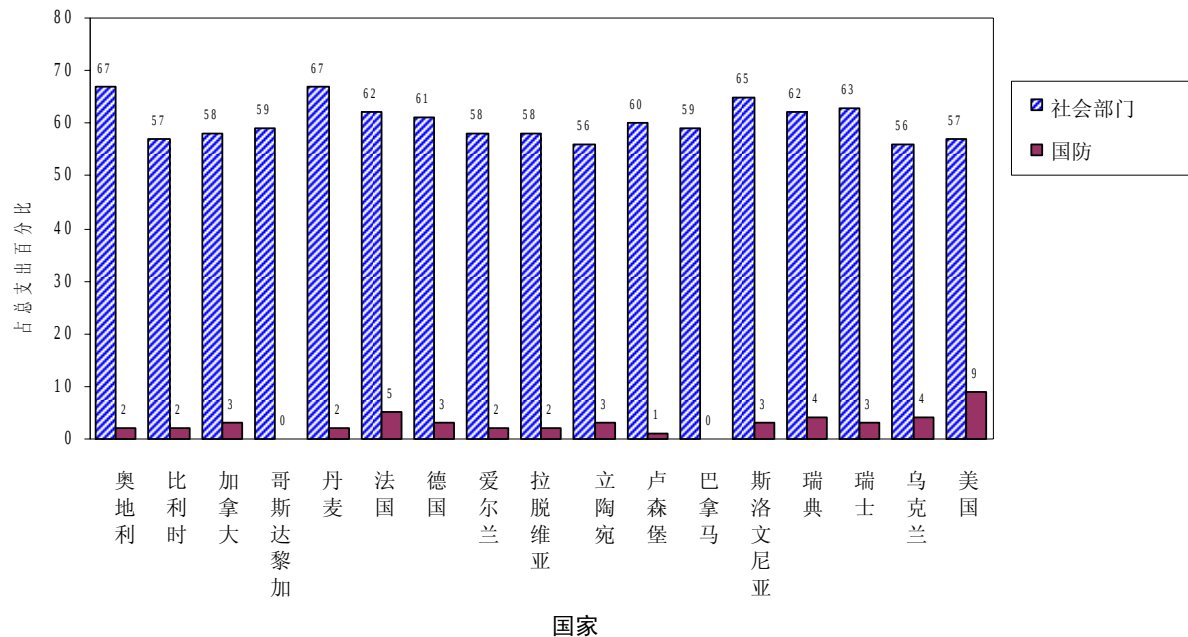
图五.4

国防开支最高国家的国防和社会部门支出



资料来源：P. Kelly and V. Saiz-Omeñaca, “1990–2001 年世界各国政府开支分配”，未发表文件（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2004 年 11 月）。

图五. 5
社会部门开支最高国家的国防和社会支出



资料来源：P. Kelly and V. Saiz-Omeñaca, “1990-2001 年世界各国政府开支分配”，未发表文件（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2004 年 11 月）。

390. 如上所述，1990 年代全球军事开支下降的趋势已经急剧扭转。这些数字与目前官方发展援助的水平以及 2006-2010 年的预测水平形成鲜明对照。据称，如果官方发展援助增加到 1 500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将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 2005d）。这一数额仅相当于世界目前每年花费在军备和其他毁灭性手段上的 9 000 亿美元的一小部分（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Project, 2005）。将与国防有关的开支转拨给社会发展，要求国际社会作出一致努力，实现将足够资金用于社会方案和减少武装冲突和暴力的双重和平红利。

D. 国家和民间社会的作用

391.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实现经济自由化的趋势激起了人们的反应，要求确保在经济和结构调整政策中考虑社会层面的问题。这一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呼吁的结果，在这一段时期，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数目和影响力都大大增加了。民间社会的活跃还促进了对权利的自我意识和对人与人之间相对不平等的意识，近年来，全球范围对人权更多关注和获取信息机会的增加，都加强了这类意识。

392. 过去 10 年来，人们日益关心改善各个社会群体的地位，对土著人和残疾人权利以及对老年人贫困和青年人失业问题的极大关注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似乎较少有人注意制定政策，促进平等分配收入和财富问题。许多政治斗争的焦点由后者转向了其他差异和不平等，尤其是基于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并特别关注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393. 过去 20 年来，个人和社会群体推举其代表在国内、国际维护其权利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直到 20 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工会不仅在就业和工资问题上，而且在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其他许多问题上，例如养恤金、保健和社会保护等等，代表了民间社会的利益。工会似乎因为会员人数相对而言的长期下降趋势受到影响，这一点是根据工会‘密度’，也即属于工会的工人所占比例来衡量的”（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7）。

394. 随着工会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下降，其他类型的民间社会组织和非营利团体层出不穷。社会环境有利于非政府行动者，助长了日益加强的伙伴关系趋势，通过这种方式来履行在此之前完全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民间社会组织在国内和国际舞台的参与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实体维护了本来可能完全没有发言权的一些群体的利益。民间社会组织从其积极参与 1990 年代重大世界会议开始，“提出了新的观念和建议，争论、谈判、抗议并施加政治压力”（Cardoso, 2004），在此过程中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公共空间。

395. 对宗教组织的贡献也不应低估。这些组织一向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保健和教育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在一些国家，宗教和/或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方面的参与达到了极大规模，以致这些国家始终能够抵制近几十年来市场改革驱动的私有化浪潮。宗教组织扩大了其作用，包括加强宣传，在政治方面获取更直接发言权。这些团体目前比以往更倾向于在国际辩论中采取积极行动，并试图影响社会领域中的重大决策。其活动范围目前不仅包括教育和保健，还包括环境、人权和民主治理。

396. 国际组织乃至私人自愿组织最近开始自行制订劳动标准和环境规则，这一趋势受到了欢迎，与此同时，据认为，这也是对显而易见的“竞相逐低”的可能影响作出的反应，在这种竞争中，市场力量不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2000 年 7 月发起的《全球契约》，以及 2002 年 10 月起草并于此后有越来越多投资银行采纳的《赤道原则》，是一些值得注意的自愿方案，由于它们的出现，使人们相信“触底竞争”已经发生，推动了采取行动，抵制这一趋势。

397. 《全球契约》关于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的 10 项普遍原则，意在促成更负责任和可持续的企业做法，体现了联合国机构、劳工和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公司权益不断加强的共识和趋同。必须指出，这些承诺是可喜的，但与此同时，它体现的只是一整套承诺，因为并没有执法机制监督私人部门行为者遵守《全球契约》的原则。17 项《赤道原则》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框架，以评估和处理项目筹资

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并在全球所有工业部门执行有关程序和标准（Equator Principles, 2004）。框架整体源于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制定的政策和准则（Equator Principles, 2004）。许多组织采纳了《赤道原则》，据估计，2003 年，适用该原则的 25 家金融机构中的 23 家银行批准了 551 亿美元的项目贷款，相当于该年度这一组银行批准的 735 亿美元项目贷款的 75%（Dealogic, 2004）。

398. 应当强调，一些传统的社会代表形式的衰落，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进一步削弱。近年来，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过去十年来意识形态左右摇摆，“国家仍然应在管制事务上承担主要责任，并在整合不同的生产、社区和社会部门方面发挥作用”（Cardoso, 1995; World bank, 1997; United Nations, 2004c, para 47）。

399. 伴随过去十多年来实行的结构调整和转型政策，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削弱国家作用的趋势，然而，1990 年代末，这一趋势开始扭转，因为各国的经验表明，将国家职能大规模私有化是一种愚妄。人们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有其重要作用，其职能不能完全由私人部门接管，或在公/私框架内或公家/民间社会伙伴关系基础上履行。

400. 按照目前的发展方针，人们承认，公共管理和国家主导的政策仍然对发展进程起到独特、必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Guimaraes, 1996）。国家的根本重要性超越了市场力量的逻辑，尤其是在伦理、平等、社会正义和维护公民的固有权利方面，市场体制和机构对此都是陌生的。国家的作用必不可少，因为资本积累的根本逻辑要求提供“公益物”和“优值物”，这些物品不能在市场上自发产生，或生产的数量不足。⁵ 涉及风险、脆弱性、社会排斥、匮乏和不适于进行微观经济计算的其他许多问题尤其是需要将后代人（按照定义，他们不参与当今市场）考虑进来的问题，由国家处理更为有效。

401. 政府和非政府行为者各自的和联合的职能都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履行这些职能的方式同样也很重要。过去 20 年来，国家和民间社会的作用和职能以及它们各自采纳的方针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并非始终有利于缩小不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人们再度意识到国家必须参与促进发展和减贫，这是扭转以往削弱国家在确保社会正义方面作用的趋势的一种可喜现象，但与此同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促成累进制税收和其他再分配措施，以缩小不平等。同样，主要是由于民间社会组织数目越来越多，影响不断加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平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已被列入公共议程，在此情况下，宣传的重点似乎从平等分配收入和资产转向了更为一般化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一事态显示了当今考虑不平等问题的政治和体制背景。

E. 结论

402. 如《千年宣言》中所述，“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全球化成为一股有利于全世界所有人民的积极力量。因为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大机遇，但它所

产生的惠益目前分配非常不均，各方付出的代价也不公平……只有以我们人类共有的多样性为基础，通过广泛和持续的努力创造共同的未来，才能使全球化充分做到兼容并蓄，公平合理（United Nations, 2005, para.5）。

403.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必须作出努力，确保市场驱动的改革、世贸组织体现的多边贸易制度以及国际经济的其他方面或部分不会起干扰作用，影响实现社会发展的累进再分配目标的可能性。积极推进此种可能性不仅是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促进就业和加强社会融合（当今社会发展议程的主要优先事项）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一种道义和伦理上的必须。

404. 在发展背景下，增长的数量（物质产出或经济增长的单纯增加）始终是一个主要重点。然而，情况越来越明显，在这一新的千年，世界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是提高增长的质量（增加福利水平，缩小社会经济不平等）。基于这一事实，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措施“必须辅以必不可少的分配政策以及矫正和补偿性政策，以消除以往的不公正和失调”（Ricupero, 2001）。

405. 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应当旨在加强全球治理和有关机制，促进更为均衡和包容广泛的全球化。如联合国秘书长曾经讲过的，“全世界有千百万人体验到，它（全球化）不是推动进步的因素，而是一股干扰性甚至破坏性力量，还有更多的人完全不能享有它的好处”（Grumberg and Khan, 2000）。

406. 虽然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技术以及市场的扩张和整合，但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而是人所驱动的一个进程的结果。因此，需要对全球化加以控制，使之服务于人类，这就意味着需要主权国家在国家一级，并通过国际一级的多国合作进行审慎管理”（Grumberg and Khan, 2000）。需要妥善管理伴随当前全球化浪潮而来的多方进程，具体说来，“迫切需要根据日益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针对发展问题采取开放、宽容和务实的方针，使经济政策再度用于促进社会正义和稳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3）。

注

¹ 但是，应当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的民间社会组织）的压力，多国公司已经开始推进较高的社会和环境标准。

² 在这 66 个国家中，51 个国家在五年期间出口增加。进一步分析这 51 个国家的人均私人消费后表明，其中 22 个国家（不到一半）经历了“合情理的贸易效应”，即在所涉五年期间出口扩大的同时人均私人消费增加；11 个国家经历了模糊贸易效应；18 个国家经历了致贫贸易效应，即在出口扩大的同时人均私人消费减少（见贸发会议，2004 年，第 10 页）。

³ 由主要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联合王国和美国。

⁴ 按 2000 年不变值美元和市场汇率计算。

⁵ “优值物”往往在关于福利经济学的文献中提及，又称为“有社会价值的产品”。“公益物”强调消费者与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优值物，或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概念则强调社会向所有公民提供某些产品的决定。虽然在福利经济学中，应当对这些概念作出区别，但经济和政治分析中通常使用“公益物”一词涵盖二者（见 Ocampo, 2005, pp. 11-20）。

六. 前进之路：减少不平等的政策¹

407. 本报告设法极力主张重视不平等困境，因为这种情况危及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发展的追求；正是为了这些追求，促使世界领袖十年前在哥本哈根聚集，举行了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并亲自作出承诺，采取具体行动，实现人类的社会幸福。

408. 为了解决不平等的困境，必须采取多方面的规范和政策办法，以人为发展的核心，这种办法把经济成长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唯一的目的；这项办法的最终目标是增加、保护和实行改进今世后代的生活素质。有关办法必须能够在社会上能够持续，减少贫穷和不平等，促进社会正义。它必须在文化上可以持续，同时维护价值观、惯例和身份象征，因为这些象征逐步形成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身份。有关办法应当在政治上能够持续，同时深化民主、透明度和问责制，从而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参与公共决策。最后，有关办法应当在环境上能够持续，同时考虑到自然资源的取得和使用，并维护生物多样性。

409. 这项办法依据的事实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种发展同样重要，并互相充实；两者同时并进，缺一不可。不能为人人提供教育机会、适当保健和体面就业的社会注定要失败。如果不考虑到后代的需要和权利、如果妇女享受不到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如果社会内部分崩离析，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在目前和过去，这种社会的例子不胜枚举。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将来能够提供大量积极榜样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全面的发展观占主导地位。

410. 1995 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商定的、2000 年在日内瓦和 2005 年在纽约重申的全面社会发展远景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哥本哈根宣言》构想的有利环境目的是为实现社会发展而为人民创造条件。宣言内包含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尺度特别重要。与有关消灭贫穷、促进全面就业和社会融合的承诺相伴随的，是在确信人民福祉应成为国家和国际舆论关注重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建议。² 宣言的执行应当主导和影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议程，以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并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A. 纠正全球不对称情况

411. 全球化步伐与如今盛行的调控框架之间缺乏平衡，带来许多需要纠正的不对称情况。在政治和制度方面，应重视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里公平分配利益，并采取行动促进所有国家和人民民主地参与决定国际关系的决策过程。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将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摆在最优先位置的办法。为了实现这些至关重要的政策目标：

-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从政治和制度上支持发展中世界各国的能力建设，尤其要在社会服务私有化给个人和集体实际行使教育权、健康权及其他公民社会权利带来新挑战或新困难的领域，恢复公共机构的调控能力；
- 市场力量与公共利益之间必须建立必要的平衡，国家尤其要对企业权力和市场力量进行适当的调控和监督；
- 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灵活，使国家政策能够消除全球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为此，需要将就业和扶贫目标纳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方案的主流。鉴于国际贸易带来的竞争压力产生种种限制，这一步骤就变种尤为重要。对外国直接投资也应采取具体措施，以促进国内生产联动和创造就业机会；
- 必须制定有关社会保护的全球最低标准，以便稳定收入，将全球化收益分配给所有人，并支付拓展新的能力。以本报告分析的所有倡议为基础，经协调后制定国际标准，可防止各国在“恶性赛跑”的过程中被迫通过忽略或限制社会规则或条例来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有关全球金融机构改革的提议必须转化为行动，加大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督和调控，为发展中国家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提供适当操作空间，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努力；
- 必须调整国际上的种种社会及经济管理制度，使之更加连贯和综合，特别是将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定与社会领域的其他多边协定协调统一；
- 必须引进能确保有充足和稳定资金来实现重大国际目标的创新想法，为发展创造新的资金来源。在这方面，大会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应作出政治决定，将审议中的一些建议推进一步。

412. 为了改革社会部门以促进平等和社会融合，需要有政治诚意、高效的国家和充足的财政资源。为了支持这个进程，可能需要提供援助，力求加强国家的管理、行政和财政能力（联合国 2003a）。这项战略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使公共教育制度民主化，改进公共教育制度内的初级和中级教育的覆盖范围和质量。

413. 对货币交易、军火销售和制造温室气体燃料的消费征税的建议，可以产生足够的资金与全世界的饥饿与贫穷作斗争。其他的倡议可以包括拟议的国际融资机制、使用特别提款权（SDR），³ 设立一项抽彩给奖法，利用抽彩收入作为发展援助。此外，应减少汇款的汇兑费（Atkinson, 2004）。

B. 加强消灭贫穷的综合战略与政策

414.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以减少和消灭贫穷为目标的决策的拟定方式应当直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纯粹假设其他政策的涓滴效果能够促进经济成长和发展。

为此，必须实施具体的政策和行动，确保将平等的内容明确纳入减贫政策和方案之中；此外，还必须采取具体的补充措施，确保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获得资产和机会，尤其是在教育、土地、资本和技术方面的机会。

415. 《千年发展目标》讨论了社会发展、包括贫穷、两性平等、教育和保健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得到了全球更大的关注。然而，虽然目标产生凝聚的作用，但不能代替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议程。至迟在 2015 年把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减半这个国际目标已经成为一个评估发展进步的公认基准。然而，减贫战略需要采取一项全面的办法，包括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机会和取得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情况以及争取体面的工作。为了支持这项构想，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十周年审查会议强调，《千年宣言》和《哥本哈根宣言》应当是互相充实的（联合国，2005a）。

416. 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扩大。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非洲的边缘化和该区域缺少发展连带产生的人类苦难是不能接受的。

417. 国际行动的重要领域首先是承诺按照明确的量化指标预拨技术和财政援助，确保在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框架内，为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建立有利的环境。

418. 必须加强国家的社会发展机构。为促进此一目标，必须将机构建立工作列入发展和减贫战略，包括减贫战略文件之中；必须更加重视对减贫战略文件的自主权；政策拟定和发展进程也要更有效地动员民间社会的参与。

419. 多数政策规定的拟定和执行基本上没有经过充分的分析，以确定这些规定如何影响到社会上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在很多国家，这些群体发现自己仍然被排除在规划进程和旨在减缓他们困境的具体行动之外。必须设法把被排斥者和长期贫穷者纳入那些伴随抚贫方案的拟定和审查的协商和参与进程。

C. 确保人人都有就业机会

420. 联合国秘书长曾说过，“最佳的除贫方案是就业。而通往经济授权和社会福祉最佳的道路是找到体面的工作”（安南，2004）。为了以持续的方式减少贫穷和促进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必须着重扩大和提高就业机会，对就业机会的质和量给予同样的重视。

421. 以促进平等、安全和尊严条件下的体面工作为目标的就业战略应当是任何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应作出调整，将创造就业机会引入宏观经济政策之中。就业战略还需要进行就业影响分析，作为其他领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决策的基本标准。此外，它还需要采取具体措施，将非正式行业纳入社会保护方案，并建立奖惩机制，通过将投资引入生产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促进创造就业机会，以期推动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422. 为了推动这项战略，至关重要的是对人民、包括人民的教育、技术培养、终生学习、保健和安全等投入资金，并改进非正式生产者的市场准入。目标是把工人和经济单位纳入主流，让他们得到法律和体制框架的保护（国际劳工组织，2002a）。此外，为了降低企业的开办和经营成本，必须改善政策和法律环境。具体的措施应包括拟定和执行简化的登记和发照程序，制定适当的规则和条例和公平、合理的征税制度。应当推动一些政策，劝阻一些企业勿从正式经济部门转移到非正式经济部门，并使新企业能够进入正式经济部门和维持劳工标准。扩大的正式经济部门不但能够为其参与者提供利益，还能够帮助国家征收税收（国际劳工组织，2002a）。

423. 光是经济增长是不够的。为了减少一般的贫穷状况，特别是工作穷人的贫穷状况，必须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就业。世界上凡是能够长期做到提高生产力和为其日益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区域，在减少总的贫穷状况方面做得最为成功。如劳工组织指出，获得体面就业的机会不但解决贫穷的收入环节的问题，还增强有关工人的能量，让那些能够取得体面工作并依法获得适当报酬、福利和保护的工作表达他们的心声，更积极地参与工作环境中的决策，并能够为他们从事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尊重（国际劳工组织，2005c）。

424. 与发展专家的预料相反的是，在过去 20 年，非正式经济部门不但没有因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衰退，反而还扩大了。因此，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概列的关于非正式经济部门和包容性发展的政策规定对于实现发展和减少不平等的工作仍然有效。

425. 应当通过取得负担得起的信贷、了解关于市场和新技术的信息和建立取得技术和管理技能的能力，把非正式企业纳入正式经济部门。其他的努力应该包括将劳工标准和社会保护扩大到非正式经济部门，但不能损害这个部门产生就业的潜力（联合国，1995）。

426. 各国政府应加强它们在青年就业领域的努力。这点变得日益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大批青年正进入劳工市场，但无法找到工作。由于市场无法吸纳他们，在青年当中造成一种挫折和不公平的情绪，因此增加了冲突的可能。

D. 推动社会融合与凝聚

427. 应当考虑制定明确的政策，消除全球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市场驱动改革带来的新威胁。必须采取周密行动，确保在国际协定以及国家和地方法律中明确保护文化、宗教及族裔特性和权利，并将这种保护落实为一项本国公司和跨国公司以及在国家管辖下运营的私人企业的可以执行的行为守则。迫切需要扩大参与决策进程的机会；特别是必须确定那些尚未纳入参与式机制的具体公共政策的拟定领域，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对一般公民取得信息不实行任何法律限制，并为更公开地审查政府政策制定机制。

428. 虽然选择目标可能是实现平等的一项有用办法，但不能代替全面覆盖面。同社会包容和增强力量的角度来看，社会成本可能抵消选择目标带来的经济利益。选择目标除了可能产生受轻蔑的感觉外，另一个危险是非选择目标群体对于那些得到援助的人可能产生不满。在某些情况下，标的群体的需要与非标的群体的需要可能相差无几。根据选择目标的办法，确定谁获得援助、谁不获得援助的标准可能根据各式各样与个人或群体的需要程度无关的外在因素，包括捐助者的倾向、方案设计、政治考虑或地理位置。

429. 如果采用选择目标的办法，较为可行的一种方式是以社区为选择目标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社区使用自己挑选的资格标准直接参与确定受益者。社区一级的民众可能比方案管理员更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情况，而参与式进程本身可能增强社区的力量，因为该进程能够增加当地对方案的监督。以社区为选择目标是一项受欢迎的选择，原因有二：它借镜当地知识，因而增加准确性；它让受益者直接参与决策进程，从而促进平等（Devereux, 2002）。经验证明，最有效的目标明确的方案是那些得到特定机构的支持、动员社区参与和获得充分资源支助的方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0b）。

430. 尽管如此，从各国得来的证据表明，选择目标可能造成反效果。选择目标方案的特点常常是覆盖面差和成本高，并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妨碍储蓄，不利于创造就业和鼓励人们过早退出劳动市场（Mesa-Lago, 2004）。通过一项更普及的提供社会服务办法，可以避免选择目标连带引起的很多问题。这项办法是把穷人和其他群体一起列入社会主流，从而推动社会包容性。普及社会服务和福利另一项好处是在政治上更易于接受。如果阶层更广的民众获得利益，就比较容易获得必要的支持，确保划拨充足的资源实行普及保护方案。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要推动这项普及办法，最大的挑战是资源有限。

431. 对土著民族来说，贫穷与歧视和失去他们对传统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控制密切相关；因此，为这些群体制定的扶贫方案不但要促进社会保护和社会融合，还要解决土地和资源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将土著历史和文化列入教育课程对于减少偏见可以发挥一项重大作用。

432. 自联合国创立以来，残疾人已从接受他人他们生活界定的框框变为积极肯定自己的力量和信心，证明他们自己有能力过自力更生和独立的生活。在这个进程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联合国的努力也促进了这种转变。为了拟定《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公约》进行的协商工作，进一步证明大家对残疾人问题的重视。为残疾人制定的方案必须强调机会平等，既进行个人复健，又实行消除社会和人身障碍的机制，以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

433. 各国政府应考虑它们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如何可能影响到后代，并通过遵守代间契约的固有条款，确保任何一代的生活不得以牺牲另一代的生活为代

价。又应采取步骤，确定和执行适当的措施，解决发达国家老龄人口增长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青年人暴增等人口转变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434. 养老有关费用常常由私人和国家提供的综合资源偿付。在国家提供养恤金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依靠年青一代账款转给年老一代的国家，由于缴费者的相对比例显著下降，在今后数十年内，会出现很大的短缺（世界银行，1994；Chand 和 Jaeger, 1999；Bongaarts, 2004）。为了确保能够维持符合代间契约的养恤金制度，各国应避免耗尽专用于后代养恤金和老龄健康保险的资金。这个进程的第一个步骤是平衡国民预算。

435. 近年来，安全问题和有关武装冲突的关注主导了国际议程。由于冲突的一个根本起因是社会发生瓦解，各国政府必须认识到社会融合是建立和维持和平社会的一项关键条件。只有确保所有群体充分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才能实现社会融合。青年失业的可能性比成人高出两三倍，因此，青年面对的难题和族裔群体之间的横向不平等情况是两个特别的关注领域。必须让年青人有机会获得体面工作和参与政治进程；也必须执行抵制横向不平等的政策。最有效的长期解决办法是普及教育。强制执行反歧视立法也很重要。

436. 最后，包容性的发展包括创造有利的环境，能够促进更平等地获得收入、资源和服务，以及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以促进持续的经济成长和创造就业。平等原则应继续主导社会和经济决策，以确保经济成长有利于社会发展、稳定、公平竞争和道德行为（联合国，1995）。如果采取了这项行动方针，不平等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困境了。

注

¹ 本章大量取材自向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的“审查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进一步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E/CN.5/2005/6，见联合国，2004c）。

²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十周年审查会议也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办法（见 E/CN.5/2005/L.2；联合国，2005a）。

³ 如第三章指出，国际融资机制将利用新的长期捐助承付款项在资本市场上发放公债，而在危机时期，特别提款权可能特别有用，因为它们可以补充现有的官方准备金，并可以作为应急筹资机制帮助各国克服周转问题，在它们设法建立准备金或资助发展时，能够避免按偏高的市场利率贷款（Atkinson, 2004）。

附件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十项承诺

在 1995 年 3 月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 各国政府通过了《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 把消除贫穷、促进普遍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定为建立有保障的稳定公正社会的最优先事项。十项承诺是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首脑会议商定的《哥本哈根宣言》的核心, 是全世界努力争取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体现。下面是这十项承诺:

承诺 1: 为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我们承诺创造一个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

承诺 2: 消除贫穷

“我们承诺, 作为人类在道义上、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必须采取的行动, 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 达成消灭世界贫穷的目标。”

承诺 3: 促进普遍就业

“我们承诺促进普遍就业这一目标, 将其作为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优先事项, 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职业和工作, 享有有保障的持久生计。”

承诺 4: 促进社会融合

“我们承诺建立稳定、安全和公正并基于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以及基于不歧视、容忍、尊重多样性、机会平等、团结、有保障和所有人包括处境不利和易受伤害群体和个人都参与的社会, 以此促进社会融合。”

承诺 5: 实现男女平等

“我们承诺促进对人的尊严的充分尊重和实现男女平等和公平, 承认并加强妇女在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发展方面的参与和领导作用。”

承诺 6: 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良好教育和基本保健服务的目标

“我们承诺促进和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良好教育、在身心健康方面有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和人人享有基本保健服务的目标, 特别努力纠正同社会条件有关的不平等现象, 而不论种族、民族本源、性别、年龄或残疾程度; 尊重并且促进我们共同的和特有的文化; 努力加强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 维护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并且致力于充分发展人力资源和致力于社会发展。这些

行动的目标是消除贫穷、促进充分的和生产性的就业和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融合。”

承诺 7：加快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

“我们承诺促进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力资源的开发。”

承诺 8：确保结构调整方案中有社会发展目标

“我们承诺确保在议定结构调整方案时应包括消灭贫穷、促进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和扩大社会融合等社会发展目标。”

承诺 9：大量增加和/或更有效地利用分配给社会发展的资源

“我们承诺大量增加和/或更有效地利用分配给社会发展的资源,以期通过国家行动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达成首脑会议的目标。”

承诺 10：改善和加强促进社会发展的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合作架构

“我们承诺本着伙伴精神,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改善和加强促进社会发展的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合作架构。”

文献目录

- Adams, R.H., Jr., and J. Page (200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17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ecember.
- Allen, J. (2003). Voices of migrants in Asia: a panorama of perspectives; voices, experiences and witness accounts of poor economic migrants in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Poor Policy Choices in Asia, Dhaka, 22-24 June.
- Altimir, O. (199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quity: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summer/fall).
- Annan, Kofi (2004). A fair globalization: implementing the Millennium Declaration. Address given on 20 September.
- _____. (2005a). Reducing risks from tsunamis: disaste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brief. Available from <http://www.undp.org/bcpr/disred/documents/tsunami/undp/rdrtsunamis.pdf> (accessed 18 April 2005).
- _____. (2005b). Remarks at a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cross-border problems in West Africa, New York, 25 February.
- Atkinson, A.B. (2003). Income inequality in OECD countries: notes and explanations. Mimeo. Oxford.
- _____, ed. (2004). *New Sources of Development Financ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Studi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les, K. (2000). *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rro, R. (1991).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2, pp. 407-443.
- _____, and X. Sala-i-Martin (1992).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p. 100.
- Behrman, J., N. Birdsall and M. Szekely (2000). Economic reform and wage differentials in Latin America. IADB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35.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Ben-David, D. (1993). Equalizing exchang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converg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8, No. 3, pp. 653–679.
- Berry, A., and J. Serieux (2002). Riding the elephants: the evolution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1980–2000).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oronto: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 _____. (2004). All about the giants: probing the influences on world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and 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vol. 50, No. 1/2004, pp. 139–175.
- Bigsten, A. (2000). Globalis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gan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olicy Dialogue on the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 Paris, 30 November–1 December 2000.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Birdsall, N. (2002). A stormy day on an open field: asymmetry and converg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2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Living Standards and Inequality: Recent Progress and Continuing Challenges, Sydney, 26–28 May. Available from <http://www.rba.gov.au/PublicationsAndResearch/Conferences/2002/Birdsall.pdf> (accessed 31 January 2005).
- _____, D. Ross and R.H. Sabot (1995). Inequality and growth reconsidered: lessons from East A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3 (September), pp. 477–508.
- Bongaarts, J. (2004).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rising cost of public pens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0, No. 1, pp. 1–23.
- Bourguignon, F. (1999). Crime, violence and inequitable developmen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28–30 June.
- _____, and C. Morrison (2002).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No. 4 (September).

- Brody, Jennifer (2002). The global epidemic of childhood obesity: poverty, urbanization, and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Nutrition Bytes*, vol. 8, No. 2, article 1.
- Caprio, G., and D. Klingebiel (1996). Bank insolvencies: cross country experi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62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ardoso, F.H. (1995). Estado, mercado, democracia: ¿Existe una perspectiva Latinoamericana? *Socialismo y Participación* (Lima), vol. 71 (September), pp. 85–94.
- _____. (2004).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United Nations — Civil Society Relations, New York, 2–3 June, p. 3.
- Carr, Marilyn, and Martha Alter Chen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how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impact on the working poor. Working Paper on the Informal Economy, Employment Sector, No. 2002/1.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p. 2, 6, 7 and 9.
- Castro-Leal, F., and others (1999). Public social spending in Africa: Do the poor benefit?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4, No. 1, pp. 49–72.
- Chand, S. K., and A. Jaeger (1999). *Aging Populations and Public Pension Schemes*. Occasional Paper, No. 147.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Charmes, Jacques (1998). Informal sector, poverty, and gender: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Background paper commissioned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hen, Martha, Renana Jhabvala and Frances Lund (2002). Supporting workers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policy framework. ILO Working Paper on the Informal Economy, Employment Sector, No. 2002/2.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p. 2, 3, 11, 13, 25 and 39.
- _____, Jennifer Sebstad and Leslie O’Connell (1999). Counting the invisible workforce: the case of homebased worker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3, pp. 603–610.

- Chen, Shohua, and M. Ravallion (2000). How did the world's poorest fare in the 1990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Series, Paper No. WPS 240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 Chopra, M., S. Galbraith and I. Darnton-Hill (2002). A global response to a global problem: the epidemic of overnutrition.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 80, No. 12.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Chu, K., H. Davoodi and S. Gupta (2000).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ax and government social spending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Working Paper, No. 214. Helsinki.
- Cichon, M. (1997). Are there better ways to cut and share the cake?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t the crossroads. Issues in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3.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5). *Our Common Intere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Africa*. March. Available from http://www.commissionforafrica.org/english/report/thereport/english/11-03-05_cr_report.pdf (accessed 20 April 2005).
-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2003). *Human Security Now: Protecting and Empowering Peop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03.III.U.2; published with 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Inc., Washington, D.C., p. 17.
- Copeland, Brian R., and M. Scott Taylor (2004).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the evidence so fa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LII, No. 1 (March), pp. 72-115.
- Cornia, G.A. (2004). Inequality, growth and poverty: an overview of chang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In *Inequality, Growth, and Poverty in an Era of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G.A. Cornia,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1.
- _____, T. Addison and S. Kiiski (2004). Income distribution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In *Inequality, Growth and Poverty in an Era of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G.A. Cornia,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and J. Court (2001). *Inequality, Growth and Poverty in the Era of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Policy Brief, No. 4. Helsinki.
- _____, and S. Kiiski (2001). *Trend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89. Helsinki.
- _____, and Leonardo Menchini (2005). The pace and distribution of health improvements during the last 40 years: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Draf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DP–French Government Sponsored Forum on Human Development, Paris, 17–19 January 2005.
- Dealogic (2004). Analytics and Market Data/ProjectWare. Available from <http://www.dealogic.com> (accessed 4 June 2004).
- Deininger, K., and L. Squire (1998). 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7, No. 2 (December), pp. 259–287.
- Dessalegn, R. (1987) *Famine and Survival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from Northeast Ethiopia*. Food and Famine Monograph Series, No. 1. Addis Abab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Devereux, Stephen (2002). *Social Protection for the Poor: Lessons from Recen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142. Brighton, Sussex, United Kingdom. January, p. 11.
- Diwan, I. (1999). Labour shares and financial crises. Preliminary draf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Dreze, J., and A. Sen (1989).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wan, Renata, and Micaela Gustavsson (2004). Major armed conflicts. *SIPRI Yearbook, 2004: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asterly, W. (2001). The effect of IMF and World Bank programs on povert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Development Conference on Growth and Poverty, Helsinki, 25-26 May.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03).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03: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3.II.K.1. Addis Ababa.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7). *The Equity Gap: Latin America, the Caribbean and the Social Summi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7.II.G.11. Santiago de Chile.

_____ (2000a). *Equity, Development and Citizenship*.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1.II.G.89. Santiago de Chile.

_____ (2000b). The equity gap: a second assessmen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Regional Conference in Follow-up to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antiago de Chile, May.

_____ (2005a).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9-200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0.II.G.2. Available from <http://www.cepal.org/publicaciones/DesarrolloEconomico/2/LCG2102PI/lcg2102iChapterVI.pdf> (accessed 18 April 2005).

_____ (2005b).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0 years after the Social Summit: a regional overview. Paper submitted to the Panel Discussion of Regional Commissions on the Follow-up to Copenhagen during the forty-third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9-18 February.

The Economist (2004). In the shadows. 17 June, p. 92.

Equator Principles (2004). The Equator Principles: an industry approach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determining, assessing and managing environmental & social risk in project financing. Available from http://www.equator-principles.com/documents/Equator_Principles.pdf (accessed 18 April 2005).

Fajnzylber, P., D. Lederman and N. Loayza (2002). Inequality and violent crim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5, No. 1, pp. 1-4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Farrell, Diana (2004). The hidden danger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McKinsey Quarterly*, No. 3.
- Feige, Edgar L. (1989). *The Underground Economies: Tax Evasion and Information Distortion*. Cambridge,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4).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and the currency enigma. In *Public Finance and Irregular Activity*, Werner W. Pommerehne, ed. *Supplement to Public Finance/Finances Publique*, vol. 49, No. 46, pp. 119–136.
- Fischer, R. (2000).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after trade liberalization. Discussion draft. Universidad de Chile.
- Flegal, K.M., and others (1998).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valence and trends, 1960–199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and Rel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vol. 22, No. 1, pp. 39–47.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0). *Global Network on Integrated Soil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Use of Salt-Affected Soils*. Land and Plant Nutrition Management Service. Available from <http://www.fao.org/ag/AGL/agll/spush/intro.htm>. (accessed 7 April 2005).
- _____. (2002). The developing world's new burden: obesity. Available from <http://www.fao.org/FOCUS/E/obesity/obes1.htm> (accessed 7 April 2005).
- _____. (2004).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4: Monitoring Progress towards the World Food Summit an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ome.
- _____. (2005a).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4*.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5.LI.4.
- _____. (2005b). *State of the World's Forests, 2005*.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5.II.E.10.
- Frey, Bruno S., and Werner Pommerehne (1984). The hidden economy: State and prospects for measurement.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30, No. 1, pp. 1–23.
- Galbraith, J.K., and L. Jiaqing (1999). Inequality and financial crises: some early findings. University of Texas Inequality Project Working

- Paper, No. 9.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LBJ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García, A.B., and J.V. Gruat (2003). Social protection: a life cycle continuum investment for social justi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ersion 1.0).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Geda, A. (2004). Opennes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Africa: exploring the rol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regional studies, held on 17 and 18 Jun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quity, Inequalities and Interdependence, held in New York on 5 and 6 October.
-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eglobalfund.org/en/in_action/events/worldtbday/2005/ (accessed 19 April 2005).
- de Graaf, Paul M., and M. Kalmijn (2001). Trend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atus. *Acta Sociologica*, vol. 44, pp. 51-66.
- Grumberg, I., and S. Khan (2000). *Globaliz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Dialogue; Finance, Trade, Poverty, Peace-Building*.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 Guadagni, Alieto Aldo (2004). Comercio, desarrollo y pobreza. Available from <http://www.eclac.cl/prensa/noticias/comunicados/1/14671/GuadagnipresentacionCEPAL040504.pdf>, pp. 22-25.
- Guimarães, Roberto (1996). ¿El leviatán en extinción? Notas sobre la reforma del Estado en América Latina. *Pretextos* (Lima), No. 9 (November), pp. 115-143.
- _____. (2004) Waiting for Godo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overnance i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10, Nos. 3-4 (September-December).
- Gurr, Ted Robert (1968).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ivil violence.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2, pp. 245-278.

- Gustaffson, B., and M. Johansson (1999). In search of smoking guns: What makes income inequality vary over tim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4, pp. 586-605.
- Harrison, B., and B. Blustone (1988). *The Great U-Turn*. New York: Basic Books.
- HelpAge International (2004). *Age and Security: How Social Pensions Can Deliver Effective Aid to Poor Older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London: HelpAge International.
- Heyzer, Noeleen (2002). Combating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a gender and human rights framework. Plenary address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Rights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Asia-Pacific-US: The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Honolulu, 13-15 November.
- Human Rights Watch (2004).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4: Human Rights and Armed Conflict*.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 Humphreys, Macartan (2003). *Economics and violent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 Iadicola, Peter, and Anson Shupe (2003). *Violence, Inequality, and Human Freedom*, 2nd editi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154-155.
- Instituto de Promoción de la Economía Social (1999). *IPES 1998/1999: Facing Up to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2004). Over one billion people lack access to basic financial services. IFAD Press Release, No. 38/04. November.
-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2005). *A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Forced Labour: Global Report under the Follow-up to the 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2005*. Report I (B),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93rd session, Geneva, 31 May-16 Jun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97). *World Labour Report, 1997-98: Industrial Relations, Democracy and Social Stabilit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p. 237-238.

-
- _____ (2002a). Conclusions concerning decent work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90th session, Geneva, 3–20 Jun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Provisional Record* (Geneva), No. 25, para. 9.
- _____ (2002b). *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tatistical Pictur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Employment Sector.
- _____ (2003). Working out of poverty: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Paper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at its 91st session, Geneva, 3–19 Jun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 73.
- _____ (2004).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 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aras. 262–264.
- _____ (2005a). Database on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 Available from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trat/kilm/kilm08.ht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05).
- _____ (2005b). Decent work — the heart of social progress. Available from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decent.htm> (accessed 2 May 2005).
- _____ (2005c).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2004–05: Employment, Productiv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 24.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2003).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HIPC) Initiative —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Washington, D.C.
- Jackson, Tim, and Laurie Michaelis (2003).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 Repor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London.
- Jelin, Elizabeth, and Rita Díaz-Muñoz (2003). Major trends affecting families: South America in perspective. In *Major Trends Affecting Families: A Background Docu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 119.
- Johnson, Simon, Daniel Kaufmann and Andrei Schleifler (1997).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 Activity*, No. 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p. 159–239.
-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2004). *AIDS Epidemic Update, December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unaids.org/wad2004/report.html> (accessed 13 April 2005).
- Jomo, K.S. (2003). Globa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East Asia. Overarching Concerns Paper, No. 3.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July.
- _____ (2004). Growth with equity in East As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regional studies, held on 17 and 18 Jun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quity, Inequalities and Interdependence, held in New York on 5 and 6 October.
- Kelly, P., and V. Saiz-Omeñaca (2004). Th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 the world, 1990–2001. Unpublished paper. November.
- Klare, Michael T. (1995). The global trade in light weap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Lethal Commerce*, Jeffrey Boutwell, Michael T. Klare and Laura W. Reed, ed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 Kramer, R. (2000). Poverty, inequality and youth viole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67, No. 1 (January).
- Lindert, P., and J. Williamson (2001). Does globalisation make the world more equal? NBER Working Paper, No. 8228.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3–6 May.
- Lloyd-Sherlock, P. (2000). Old age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policy challeng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12, pp. 2157–2168.
- Lowi, T. (2001). Our millennium: political science confronts the global corporate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2, No. 2, pp. 131–150.

- Mayer-Foulkes, D. (2001). Convergence clubs in cross-country life expectancy dynamic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 2001/134. Helsinki.
- Melchior, A., K. Telle and H. Wiig (2000). 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 Studies on Foreign Policy Issues, Report 6B. Oslo: Royal Norweg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 Mesa-Lago, Carmelo (2004). Models of development, social policy and reform and Latin America. In *Social Policy in a Development Context*, Thandika Mkandawire, ed.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pp. 175–204.
- Milanovic, B. (1998).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Morales-Gomez, D. (1999).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Available from http://web.idrc.ca/en/ev-27516-201-1-DO_TOPIC.html (accessed 17 May 2005).
- Morley, S. (2000).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in an era of structural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olicy Dialogue on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30 November–1 December.
- Narayan, Deepa, and others, eds. (2000). *Voices of the Poor: Crying Out for Chang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 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003). *Review of Nordic Monitoring of the World Bank and IMF Support to the PRSP Process*. Oslo, p. 23.
- Ocampo, José Antonio (2002a). Developing countries' anti-cyclical polic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s: Essays in Honour of Lance Taylor*, Amitava Dutt and Jaime Ros,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_____ (2002b). Re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agend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6, No. 3, pp. 393–407.

- _____ (2005).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first annual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18–19 October 2004. Also in *Items and Issues*, vol. 5, No. 3, pp. 11–20.
- _____, and Juan Martin (2003).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Perspective*.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Santiago de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ORC Macro (2005). MEASURE DHS STATcompiler. Available from <http://www.measuredhs.com> (accessed 15 February 2005).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 *The DAC Guidelines: Helping Prevent Violent Conflict*. Paris.
- _____ (2003). Final ODA data for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19/52/34352584.pdf> (accessed 12 May 2005).
- _____ (2005a).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istics (IDS) online. Available from www.oecd.org/dac/stats/idsonline.
- _____ (2005b).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creases further — but 2006 targets still a challenge. 11 April 2005. Available from http://www.oecd.org/document/3/0,2340,en_2649_201185_34700611_1_1_1_1,00.html (accessed 20 April 2005).
- Petersilia, Joan (2001). Invisible victims: violence against person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ur*, vol. 28, No. 6 (December), pp. 655–694.
- Pinstrup-Andersen, P., and J. Babinard (2001).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nutrition: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the po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frican Journal of Food and Nutritional Sciences*, vol. 1, pp. 9–18.
- Ravallion, M. (2004).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looking beyond averages. In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Prospects for Pro-Po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thony Shorrocks and Rolph van der Hoeven, ed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Studi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table 3.1, p. 69.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zavi, S. (2005). Women, work and social policy. *UNRISD News* (Geneva), No. 27 (March), p. 6–7.
- Renner, Michael (1999). *Ending Violent Conflict*. Worldwatch Paper, No. 146 (April).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 p. 40.
- Ricupero, Rubens (2001). A face visível da desigualdade. *A Folia de São Paulo* (8 July). Available from <http://www.jornal.ufrj.br/newsletter/anteriores/news138.html#28> (accessed 20 April 2005).
- Rodrik, D (2002). Globalization for whom? Time to change the rules — and focus on poor workers. *Harvard Magazine*, vol. 104, No. 6 (July–August), p. 29.
- Roper, J., and R.W. Roberts (1999). Deforestation: tropical forests in decay. Forestry Advisors Network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FAN-CIDA). Available from <http://www.rcfa-cfan.org/index.html> (accessed 9 February 2005).
- Sahn, David E., David Stifel and Stephen Younger (1999). Inter-temporal changes in welfar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nine African countries. Cornell Food and Nutrition Policy Program Working Paper, No. 94.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_____, and Stephen Younger (2000). Expenditure incidence in Africa: microeconomic evidence. *Fiscal Studies*, vol. 21, No. 3, pp. 329–347.
- Sainz, P. (2004). 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volution in the nineti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regional studies, held on 17 and 18 Jun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quity, Inequalities and Interdependence, held in New York on 5 and 6 October.
- Sala-i-Martin, Xavier (2002). The disturbing “rise” of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890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pril.
- Sanne, Christer (1997). Lifestyle and consumption: prospects of cutting consumption in wealthy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Global Eth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Melbourne, Australia, 1–3 October, pp. 1–8.

- Schneider, Friedrich (2002). Size and measurement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11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July.
- Schölvinck, Johan (1996).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area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Procee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Settlements and Habitat, 31 March-2 April 1996*, Dolores A. Wozniak and others, eds.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pp. 2-8.
- Sen, Amartya (1995). *Inequality Re-examin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Random House, Inc.
- Shaw, M., J. van Dijk and W. Rhomberg (2003). Determining trends in global crime and justice: an overview of results. *Forum on Crime and Society*, vol. 3, Nos. 1-2.
- Skeldon, R. (2002). Migration and poverty.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vol. 17, No. 4 (December). Bangkok: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SOPEMI (Continuous Reporting System on Migration) (2003).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nual Report, 2002 Edition*.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South-North Development Monitor (2005). Argentina: economic growth doing little to reduce rich-poor gap. No. 5773 (5 April). Available from <http://www.sunsonline.org/contents.php?num=5773> (accessed 20 April 2005).
- Spilimbergo, A. J., L. Londoño and M. Skézely (1999). Income distribution, factor endowments and trade opennes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9, pp. 77-101.
- Stiglitz, J. (1998).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Annual Lecture, Helsinki, 7 January. UNU/WIDER Working Paper, No. 215.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3). *SIPRI Yearbook, 2003: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4). *SIPRI Yearbook, 2004: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L. (2004) External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lsewhere. In *Inequality, Growth, and Poverty in an Era of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G. A. Cornia,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mmer P.C., and A. S. Timmer (2004). Reflections on launching three books about poverty,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WIDER Angle*, No. 1, p. 3.
- Trebilcock, Anne (2004). Decent work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Paper submit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Unlocking Human Potential: Linking the Informal and Formal Sectors, Helsinki, 17-18 September, organized by the Expert Group on Development Issues (EGDI) and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UNU/WIDER), p. 20.
- United Nations (1995). *Report of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Copenhagen, 6-12 March 1995*. Sales No. E.96.IV.8. (联合国(1995)。《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哥本哈根，1995年3月6日至12日。销售品编号C.96.IV.8。)
- _____. (1996). Changing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E/CN.17/1996/5. 30 January. Submitted to the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its fourth session, New York, 18 April – 3 May. (联合国(1996)。消费与生产模式的改变：秘书长的报告。E/CN.17/1996/5。1月30日。提交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纽约，4月18日至5月3日。)
- _____. (2000).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5/2. 18 December. (联合国(2000)。《联合国千年宣言》。大会12月18日第55/2号决议。)
- _____. (2001). Prevention of armed confli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55/985-S/2001/574. 7 June. (联合国(2001)。预防武装冲突：秘书长的报告 A/55/985-S/2001/574。6月7日。)

- _____. (2003a). Improving public sector effectivenes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E/CN.5/2004/5. 3 December. Submitted to the 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t its forty-second session, New York, 4-13 February 2004. (联合国(2003a)。提高公共部门的效力：秘书长的报告。E/CN.5/2004/5。12月3日。提交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纽约，2004年2月4日至13日。)
- _____. (2003b).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Social Vulnerability: Sources and Challenges*. Sales No. E/03/IV/10. (联合国(2003b)。《世界社会状况报告—社会脆弱性：根源与挑战》。销售品编号C/03/IV/10。)
- _____. (2003c).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联合国(2003c)。《世界人口前景：2002年修订本》。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 _____. (2004a). *Human Rights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York and Geneva: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联合国(2004a)。《人权与减贫：构思框架》。纽约和日内瓦：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 _____. (2004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rma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ntext: not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A/59/119. 23 June. 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its fifty-ninth session. (联合国(2004b)。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秘书长的说明。A/59/119。6月23日。提交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
- _____. (2004c). Review of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outcome of the twenty-fourth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E/CN.5/2005/6. 1 December 2004. Submitted to the 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t its forty-third session, 9-18 February 2005. (联合国(2004c)。审查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的进一步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E/CN.5/2005/6。2004年12月1日。提交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2005年2月9日至18日。)
- _____. (2004d).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4*. Sales No. E.04.II.C.3. (联合国(2004d)。《2004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销售品编号C.04.II.C.3。)

_____ (2005a). Declaration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CN.5/2005/L.2. 9 February. Draft submitted by the Chairperson of the 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t its forty-third session, 9–18 February 2005. (联合国(2005a)。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十周年宣言。E/CN.5/2005/L.2。2月9日。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在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提出的草稿,2005年2月9日至18日。)

_____ (2005b). Discussi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Disarmament* Affairs. May. (联合国(2005b)。讨论情况。联合国裁军事务部。5月。)

_____ (2005c). In larger freedom—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59/2005. 21 March. 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its fifty-ninth session. (联合国(2005c)。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秘书长的报告。A/59/2005。3月21日。提交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

_____ (2005d).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5*. Sales No. E.05.II.C.1. Chap. 4. (联合国(2005d)。《2005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销售品编号C.05.II.C.1。第4章。)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01). *A Decade of Transition*. Regional Monitoring Report, No. 8. Florence: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_____ (2004). Factsheet: trafficking. Available from <http://www.unicef.org/protection/files/trafficking.pdf> (accessed 8 February 2005).

_____ (2005).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5: Childhood Under Threat*. Sales No. E.05.XX.1, p. 5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2). *Agenda 21*, para. 4.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0).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on its tenth session, Bangkok, 12–19 February. TD/390. 21 September 2000. (See also: Plan of Action. TD/386. 18 February.)

_____ (2003).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Sales No. E.03.II.D.7.

_____ (2004a).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 2004: L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Poverty Reduction*. Sales No. E.04.II.D.27.

_____ (2004b). *UNCTAD XI — The Spirit of Sao Paulo*. TD/L.382. 17 June.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at its eleventh session, Sao Paulo, 13–18 Jun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2001). *Gender Budget Initiatives*. New York. Published with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Lond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ttawa, p. 1. Available from <http://www.gender-budgets.org/uploads/user-S/10999516661ACF31B2.pdf> (accessed 2 March 2005).

_____ (2003). *Not a Minute More: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 17.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Changing Today's Consumption Patterns — for Tomorrow's Human Development*. Sales No. 98.III.B.4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verview, p. 2.

_____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 Sales No. E.99.III.B.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200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epening Democracy in a Fragmented World*. Sales No. E.02.III.B.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

_____ (200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 Compact among Nations to End Human Poverty*. Sales No. E.03.III.B.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2004a). Draft country programme document for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2005–2009).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4 annual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Geneva, 14–23 June.

_____ (2004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Cultural Liberty in Today's Diverse World*. Sales No. E.04.III.B.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5). *Education For All, 2005: The Quality Imperative*.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Pari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2).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les No.

E.02.II.G.48. Published with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antiago de Chile, pp. 147–148.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05a). Asylum levels and trend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2004: overview of asylum applications lodged in Europe and non-Europea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2004. March.

_____ (2005b). *Refugees: 2004 Year in Review*, vol. 4, No. 137 (January).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Project (2005). *Investing in Development: A Practical Plan to Achieve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New York, p. 263.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05). Trafficking in human misery. Available from <http://www.unfpa.org/gender/trafficking.htm> (accessed 5 February 2005).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05). Executive summary. *Gender Equality: Striving for Justice in an Unequal World*. Paris, p. 1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04).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rime Data Brief*.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November.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4).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June 2004*.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0). Public health: trends in tuberculo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No. GAO-01-82. Washington, D.C. October.

Urdal, Henrik (2004). The devil in the demographics: the effect of youth bulges on domestic armed conflict, 1950–2000. Social Development Papers: Conflict and Reconstruction Paper, No. 14.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July.

Walker, A. (1993). My mother and father's keep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features of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Finnish Welfare State at the Edge of Change. Jyväskylä, Finland, 26 May. Helsinki: 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for Welfare and Health.

- Weeks, J. (2004). Trends in inequality in the developed OECD countries: changing the agend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regional studies, held on 17 and 18 June in preparation for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quity, Inequalities and Interdependence, held in New York on 5 and 6 October.
-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2004a). Fact shee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Available from <http://www.wiego.org/aom/fact3.shtml> (accessed 14 December 2004).
- _____ (2004b). Fact sheets: home-based workers. Available from <http://www.wiego.org/main/fact4.shtml> (accessed 14 December 2004).
- _____ (2004c). Fact sheets: wo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vailable from <http://www.wiego.org/main/fact2.shtml> (accessed 14 December 2004).
- World Bank (1994).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 Washington, D.C.
- _____ (1995). *Poverty in Russia: An Assessment*. Report No. 14110-RU. Human Resources Divisio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Country Department III. Available from http://www-wds.worldbank.org/servlet/WDSContentServer/WDSP/IB/1995/06/13/000009265_3961019104239/Rendered/PDF/multi0page.pdf (accessed 18 April 2005).
- _____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4a).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5: Trade,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p. 13. November.
- _____ (2004b).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Breaking with History?* Washington, D.C.
- _____ (2004c).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Bank Operations: Results and Way Forward*. Washington, D.C., p. 17.
- _____ (2005). Board presentations of PRSP documents. Available from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RS1/Resources/boardlist.pdf> (accessed 29 April 2005).

World Economic Forum (2004). Voice of the people, 2004: survey on trust, 2004. Available from <http://www.weforum.org/site/homepublic.nsf/Content/Surveys%5CVoice+of+the+People+2004> (accessed 21 April 200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Geneva, p. 89–91 and 100.

_____ (2003).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3: Shaping the Future*. Geneva.

_____ (2004).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4 — HIV/AIDS: Changing History*. Geneva.

_____ (2005a). Obesity and overweight. Global Strategy on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publications/facts/obesity/en/> (accessed 12 April 2005).

_____ (2005b).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Making Every Mother and Child Count*. Geneva.

World Information Transfer (2005). *World Ecology Report*, vol. XVII, No. 1 (spring).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3). Severe weather events on the rise. *Vital Signs*, 2003.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